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大趋势 我国建设创新强国新担当 路甬祥 (005)

关于中美关系、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思考 张晓强 (010)

借鉴国际著名智库发展经验 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张大卫 元利兴 (017)

• 国际经济 •

中国的海外消费：特点、原因及对策 毛中根 武优勳 (031)

建立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思路与对策 朱福林 (042)

• 宏观经济 •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政策、问题与对策 吴维海 (055)

• 产业发展 •

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及创新 杜振华 (074)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及趋势展望 夏友仁 (091)

欧洲软件业与贸易的发展态势、影响因素及趋势展望
肖汉雄 杨丹辉 (104)

• 新书推介 •

推动创新设计 迈向制造强国

——王晓红等著《创新设计引领中国制造》推介 书 讯（115）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7）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4）



CONTENTS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changes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 s building an innovation power *Lu Yongxiang* (005)

On Sino – US relations, China’ 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Zhang Xiaoqiang* (010)

L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amous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Dawei and Yuan Lixing (017)

China’ s overseas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Mao Zhonggen and Wu Youmeng (031)

Establishing free trade port and promoting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Zhu Fulin (042)

Theory, polic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Wu Weihai (055)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in India *Du Zhenghua* (074)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softwar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Xia Youren (091)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tre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end of software
industry and trade in Europe *Xiao Hanxiong and Yang Danhui* (10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7)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大趋势 我国建设创新强国新担当

路甬祥

摘要：党的十九大确立建设科技与制造强国目标，本文就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大趋势、中国建设制造强国新优势新担当、改革创新教育与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进行了论述，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实体经济，制造业是支柱和核心，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工业文化是制造强国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中国教育必须传承弘扬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创新创业的梦想、自信、技能和协同创新能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吸收融汇全人类的优秀文明。

关键词：科技创新 产业变革 制造强国 新担当 大趋势

作者简介：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建设科技与制造强国目标。本文就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大趋势、建设科技与产业强国新担当、建设制造强国新优势新目标、改革创新教育与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谈几点认识。

一、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大趋势

科学创新知识，技术创新方法与工具，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变革。创新创业人才是根本。科技与产业创新永无止境，引领人类社会文明进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网络信息、材料能源、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科技日新月异。学科间深度交叉融合，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创新相互促进，70% 以上的基础前沿研究与制造业创新紧密相关；知识技术通过设计制造服务和业态创新转化为应用和实现，产业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探索创新的同时，对于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战略高技术，选择支持或参与国际合作建设大科学装置合作研究，或组织重大科技专项工程实现突破；大学、国立研究所和国家实验室在知识传播、基础前沿研究、人才培养、共性和战略高技术创新方面继续发挥骨干作用的同时，设计制造、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企业成为工程技术与产业创新的主体，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成为有效途径；信息网络成为共创分享新平台，大数据成为最有价值可分享的创新资源，创新链、产业链成为国家工程技术创新生态优势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在大企业继续发挥技术与产业创新支柱作用的同时，中小创新企业成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突破引领新兴科技产业与业态创新成为新常态；新一代信息网络、清洁能源体系、新能源网联汽车、快捷共享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医药与大健康、生态环境监测保护、国防与公共安全等成为带动工程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万物互联、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免疫与基因科技应用创新、网络平台等将变革现有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服务方式、公共与国防安全格局，并为人类免疫保健和个性化精准普惠医疗、地球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支撑，也将带来网络数据安全、国家主权、个人隐私、社会伦理和生态安全等新挑战。

二、建设科技与产业强国新担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宏伟目标，将科技视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吸引创新人才和创新环境，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 年我国研发投入 1.7 万亿元，列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13%。发表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数量质量快速提升，中国高铁、能源电力、北斗导航、中国航天、超级计算、量子通讯等创新发展举世瞩目，华为、小米、阿里、腾讯等创新企业快速崛起，我国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科技与产业创新大国。但也必须看到，从影响世界的重大科学原创、基础核心前沿技术创新、引领世界的产业技术创新等衡量，我们还不是创新强国。

实现科技与产业创新强国新的历史担当，必须改革创新科技体制，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创新资源和市场信息网络优势。提升对基础前沿研究投入的比重，稳定支持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自由探索和知识技术创新，支持科学技术与工程基础理论、基础数据、科学方法、新技术标准与先进测试方法、科学仪器与医疗诊断治疗设备技术创新。

支持中国科学家提出主导或参与的引领世界的大科学工程和多学科实验研究平台建设。聚焦重要科技领域和战略高技术目标，组建规模更大、更加综合的国家实验室，组织实施一批战略目标明确、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工程。大幅提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规模质量和水平。厚植科学知识和前沿技术基础，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原创性知识技术源泉和前沿性、突破性、颠覆性、引领性创新技术支持。必须改革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成果评价、处分和收益分配政策法规，更严格地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执法监督，提高违法成本。激励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金协同的工程技术创新，提升知识技术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效率。这样，才能承担起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工程与产业创新变革，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时代中华民族科技与产业创新贡献的历史担当。

三、建设制造强国新优势新目标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制造快速发展，已形成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的现代制造业，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华为、中兴通信、中铁轨道交通、中国能源电力、海尔格力家电、华为小米手机、联想电脑等享誉国际市场。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 220 种产品产销位居全球第一，为世界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但高端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操作系统和设计软件等仍严重依赖进口。基础核心技术与创新设计能力薄弱，缺乏引领世界的制造企业和著名品牌。我们还不是制造强国。

党的十九大开启中国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适应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对中国制造提出新要求。传统产业将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加快升级，将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对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实行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优惠，降低企业交易、用能、物流和融资成本，支持“专精特新”中小制造企业发展。推出互联网+、大数据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发展战略与规划，促进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着力推进强基提质、绿色智能和服务型制造，突破基础核心技术，鼓励支持创新设计，全面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为加快向中国创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转变注入强劲动力。

我国已具有全球最现代化信息网络、超级计算与数据中心和快捷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具有最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和巨大的内销和外贸市场，具有全球最丰富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人才储备，每年有百万件专利申请，京、沪、杭、深成为国际瞩目

的创新城市等。我国法律政策环境不断完善，政府监管服务更加规范高效，市场更加开放公平，必将继续成为全球制造服务最具活力的投资和创新合作新高地。

万物互联、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增材制造（3D 打印）等创新应用快速发展。网络促进创新要素全球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云计算、云服务成为协同创新平台新业态。大数据成为最有价值可分享的创新资源和设计制造服务创新的数据基石。人工智能将发展到基于大数据、网络计算系统智能，拓展到终端/云端协同的全球网络智能制造。3D 打印等将使设计制造更加自由精益快捷。制造业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设计、规模定制、网络协同制造服务转变。网络大数据也将促进全产业链、全社会绿色制造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将拓展到设计制造服务营销的全过程。制造业呈现绿色低碳、网络智能、开放融合、合作共赢的新特征。

德国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 等都是适应制造产业新变革的国家战略，反映出中国制造面临的新挑战，也将为中国制造创新发展与全球合作提供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共商共建共享，新工业标准国际合作制订，网络与数据安全共同应对，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分享，将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创新合作拓展新空间、提升新水平。中国与全球科技与产业合作将共创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四、创新教育，凝聚人才

建设世界科技与产业创新强国，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希望在青年。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视为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程，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增加教育投入，自 2017 年，教育投入超过国民收入的 4%。全国范围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已超过 90%，在校高中生人数 2366.6 万，在校大学生人数 2695.8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35%，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已有 1.96 亿。在校研究生人数已达 191.1 万，仅次于美国。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教育普及和均衡水平持续推进，国民素质快速提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创新动力，成就举世瞩目。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和教育仍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协调问题。如片面追求高学历和升学率，教育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前沿科学、工程技术和技能型应用人才短缺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并存；重视全日制学历教育，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终生教育体系不健全，还不能适应农村人口转移、城镇人口就业以及由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面临职业变更，社会对就业创业者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结构要求快速提升变化。产学研协同办学、民办和国际合作办学、网络教学等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资源共享水平还不高，制约了教育多样化、创新

合作活力等。我国教育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还不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强国建设的要求，不适应人民不断提升的对教育质量和多样化的需求。

教育理念必须与时俱进，教育体制内涵方式的改革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终生教育和多元多样的办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适应信息网络时代全球知识和教育资源共创分享，网络化、国际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使我国教育供给结构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强国建设的需求，适应人民不断提升的对高品质和多样化教育的需求。

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传承知识与文明，更在于立德树人、提升国民素质、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人才基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着力培育受教育者健全的人格，使其在德、智、体、美、能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国教育必须改变过分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观念，更需要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和创造永无止境。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已有知识总是有限的，只有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是无限的。只有鼓励不断探索和创造，才能认知世界和客观规律，才能创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实体经济，制造业是支柱和核心，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工业文化是制造强国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中国教育必须传承弘扬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创新创业的梦想、自信、技能和协同创新能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融汇全人类的优秀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民族合作共赢、共创共建。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人皆可成才的人才观，社会需要和谐协调、开放合作、共创分享、珍爱自然、绿色发展的理念。确立以德才和实绩为依据的选用评价和人才待遇的制度标准和工作机制，坚持在真理、法律、制度、教育、绩效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男女性别年龄差异，不论学位资历高低，不问国外引进还是国内培养，都一视同仁。既需要关注培育精英高端人才，更需着力培育成千上万的优秀科技与工程人才、企业家、金融投资人才、应用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数学数据和计算人才、人文艺术人才，以及千千万万胸怀人生梦想、敬业精业的技工技师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为建设科技与产业强国提供数量宏大的高质量人才和人力资源支持。人的天份、成长环境有差别，兴趣爱好有不同，业务技能有专攻，但职业无贵贱。只要热爱祖国、心怀梦想、诚信为人、善于学习、勤奋工作，都能成为创新创业有用人才，都会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关于中美关系、对外开放 与利用外资的思考

张晓强

摘要：当前，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遇到很大挑战。中国仍将推动中美这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必须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相向而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已全部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从世界发展大势与经验、从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出发主动确立的。中国近些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企业更多面对的是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管理等方面的挑战，“公平”开放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方式。中美经贸的互利共赢基础没有本质性改变，双方应共同努力，积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矛盾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中美关系 对外开放 利用外资 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张晓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一、关于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遇到很大挑战。有些专家认为，美国使用 301 条款并非为了解决对华贸易逆差，而是为打击中国制造 2025、阻挠中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2017 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2018 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提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价值观的战略对手；2018 年 3 月以来，美国发起贸易战，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派国务院高官访台、美国

国务院宣布允许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美军舰艇再次进入南海中国岛屿 12 海里。这一系列举措综合在一起，使一些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已在进行大的战略调整，开始将中国作为战略遏制的最主要对手，而不只是一时的局部战术动作。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已进入新时代，确定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为此，要加强党的领导，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加快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同时，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方多次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特朗普总统就任后，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 4 月访美时提出，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实际利益，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当时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 4 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提出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此后，启动了中美经贸方面的“百日计划”。2017 年 6 月美国牛肉时隔 13 年又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都是“百日计划”的早期成果。2017 年 11 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进一步上升。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引领者，应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愿意同中方发展公平、互惠、强劲的经贸关系。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是有限的，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这次访问的一大亮点是双方企业签署了涉及多个领域、双向贸易投资总值达 2535 亿美元的大单。笔者认为，中国仍将按以上原则使中美这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必须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相向而行。

二、关于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到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作出全面阐述。明确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就对外开放提出了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四方面措施，并要求尽快落地。4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了汽车、飞机、船舶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的具体时间表。中国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下调了 187 项消费品关税，平均税率从 17.3% 降至 7.7%；下调关税 3 个月来，一般贸易进口的相关货物达 345 亿元，同比增长 20.1%，按新的低税率征收关税额为 8.8 亿元，比原税率减征了 16.8 亿元。当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关键标志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此，笔者想谈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加入 WTO 的承诺已全部兑现。这不是由中国自己或美国某机构、某几位专家来评价的，是 WTO 专门组织全面评价后的正式结论。比如，在金融、汽车、电信等领域，当时的协议就是有条件开放，包括汽车进口整车关税降到 25%，汽车整车厂中方控股，基础电信由中方控股，外资收购中资银行合计占股不超过 25% 等等。认为中国未兑现承诺是违反基本事实的，反而是美、欧、日等有违 WTO 协议“十五条”。随着发展，中国已主动采取了一些超出承诺水平的扩大开放措施，在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产品新协议中都有更大开放。从 2013 年启动的自贸试验区的多项举措、2017 年国务院关于积极利用外资的文件，到 2017 年底特朗普总统访华时宣布的新的扩大金融开放措施，再到 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开放的水平已大大高于 WTO 协议。其中，2013 年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得到联合国及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积极支持。美国、日本 2017 年 5 月也派代表参加了高峰论坛。2018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中国还将继续推出若干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从世界发展大势与经验、从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出发主动确立的，不是因为美国或别国的施压。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成效明显，开放度日益提高。这是在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为

主，多边双边并进不断推进的。因此，对经贸领域出现的摩擦与问题，把 WTO 等国际规则抛在一边，搞单边主义的保护措施，中国是不接受的。2018 年 4 月 25 日，《华盛顿邮报》称，美国已向 WTO 表示同意就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问题进行磋商，但美国立场不会变。希望这成为回到正常解决矛盾轨道的开端。以“大棒”当头，甚至用“枪”指着中国的脑袋要中国让步，中国就更不会妥协、让步。中国领导、有关部门最近已多次阐明了这些基本立场。从客观条件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外汇储备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粮食安全有保障。中国占世界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4.85% 升至 2017 年的 15%；2005 年 GDP 2.3 万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的 17.5%，2017 年 12.2 万亿美元为美国的 63%。然而，从人均水平、科技水平、综合国力等方面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毕竟是世界人口第一、市场第一的大国。现在中国被“逼上梁山”，为了捍卫国家利益、捍卫多边利益，奉陪到底的实力和信心是有的。同时，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现在不得不应战反制，反制的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不是美国人民。

总之，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会动摇，而且会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愿意合作开放的各方都是肯定的。

三、关于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 40 年，总体看，应充分肯定利用外资对中国发展、改革的积极作用。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看，2001 年、2011 年分别为 469 亿美元和 1160 亿美元。2017 年在全球 FDI 下降 16% 的情况下，中国增长 7.9%，达到 131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连年居世界前列。2018 年一季度 FDI 合同金额达 971 亿美元，增长 28%；实际使用外资 345 亿美元，增长 2.1%。这是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外商投资环境是否恶化的有力回应。根据中国美国商会 2018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新年度报告调查显示，近 75% 的美国企业实现盈利，60% 的企业把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1/3 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10% 以上，但也提出了在审批复杂、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不足。笔者最近与美国各界人士接触较多，有的美国前政要说，美国工商界多年来是推动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在有变化，很多工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恶化，外企受到更多歧视，因此支持美国政府对华施压。笔者理解，希望“施压”也是想在中国有更多发展空间，获取更多利润，而不是希望走美中对抗之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18 年 4 月 12 日报道，目前反对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计

划的美国商业联盟规模已达 107 个贸易组织，比一个月前激增一倍。零售商、农场主、通用电气、IBM、高盛、凯雷集团、苹果、耐克等行业巨头均向白宫提出了反对意见。笔者集中分析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

（一）知识产权（IPR）保护

原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先生称，美国不得不把其创新技术拱手让与中国。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先生称，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不满于被迫向中方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要根据美国《贸易法》301 条款对中国窃取 IPR 的问题开展调查。此次美方发起贸易战，主要理由就是 IPR。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及相应举措是缺少事实根据和无理的。

第一，中国近些年在 IPR 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包括加大执法及惩处力度，成立 IPR 法院等等。客观地看，中国的 IPR 保护水平比 5 年前、10 年前已大幅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不断缩小。

第二，“拱手相让”依据为何？中国科技近些年的快速进步绝不是美国拱手相让的。中国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从 2000 年的近 900 亿元增至 2017 年的 1.7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从 0.89% 升至 2.12%，超过欧元区创始 15 国 2.1% 的强度；中国近两年的科技论文、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已居世界前列；2017 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 130 万件，居世界第二位；2017 年中国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 9.8 件，是 2010 年的近 5 倍。中国骨干电信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分别占年营业收入比重的 12% 和 8% 以上。中国在特高压输电、高速铁路、公路桥梁建设、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4G 及 5G 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量子通信、北斗卫星、载人航天这些领域能走到世界前列，主要是靠企业及科技人员的开拓进取、人才培养、大量资源投入。这其中肯定有引进技术的作用，有市场换技术的作用，包括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引进的技术，但输出技术、品牌的一方也获得了巨大利益，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拱手相让”！至于说是靠“偷窃”，就更没有道理可言，甚至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第三，关于强迫美国企业向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的 FDI 近 75% 是外商独资，美国在华企业也大体如此。约 3/4 的投资根本不存在“合资伙伴”，不知莱特希泽先生是否知道这个基本事实。是否采取合资方式，除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的产业，其他均是企业自己决定。是否转让技术，转让什么技术，作价如何，都是

合资双方的商业行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卡特彼勒公司、戴尔公司、惠普公司在中国都有不少独资企业，康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基本都是独资。笔者从 1995 年国家计委等部门正式发布第一个《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时就参与起草工作，那时的限制类、禁止类有 200 多项。在前些年不断减少限制的基础上，过去 5 年两次修订《目录》，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性措施削减了 65%。现行的 2017 年版只有 63 类，其中禁止类 28 项，有股比要求等的限制类只有 35 项了。而且 2016 年发布“十三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前在全国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不看进步成效，不顾基本事实来施压，实在让中方无法接受。

（二）“营商环境恶化”

近几年，企业反映的较多，但世界银行连续两年的评价则是中国营商环境提升了 18 位。中国美国商会最新报告提到的审批复杂、劳动力成本上升、专业人才不足、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 IPR 保护不够等，这些是中国企业也同样面临的，是中国政府在积极努力加以改善的。关于企业利润不如前几年，这应从中国的大环境分析，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转型升级、新常态的相对困难时期（有美国专家曾几次宣称中国经济要“崩溃”），大批中国企业面对严峻挑战。笔者介绍两类数据：一个是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和营业收入利润率，从 2013 年的增长 9.7%、利润率 6.6%，连年下降至 2016 年的增长 6%、利润率 5.9%，至 2017 年才回升为增长 6.6%、利润率 6.5%；另一个是商业银行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其利润 2013 年比上年增长 10%，此后连年下降，2016 年仅增长 0.2%，至 2017 年才有所好转，也只增长 3%。这既是因为中国在经历痛苦的转型，外需不足；也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比以往更为激烈。曾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天津夏利汽车、深圳酷派手机濒临破产；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快递市场，不论是国有的中国邮政 EMS，还是美、欧大公司的份额都在下降，民营公司的份额则大幅上升。目前，中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2017 年销售近 2900 万辆，比美国多近 1200 万辆（销售新能源车近 80 万，是美国的近 4 倍）。外国公司及品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2015、2016 年销售分别比上年增长 3.5%、7.1%，2017 年又增长 4.4%，在华销售 404 万辆汽车，占全球销量的比重达到 45%。而福特公司因为自己的产品推出、营销战略等原因，2017 年在华销售是 -6.3%（全球 -1.3%）。宝洁公司是最早在广州开发区投资的美国企业，1998—2013 年在华营业额提升近 6 倍，最高峰时占中国高端洗护发市场 50% 的份额。但近几年日本、韩国、欧洲和中国企业更加努力，而宝洁在华每年只

增加两三个新品种，也不发展电子商务，其销售收入从高峰的 400 亿元降至近几年的 200 亿元。上述例子说明，企业更多面对的是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管理等方面的挑战，主要困难不在于所谓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不欢迎或歧视。

（三）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企业家讲必须“对等”开放，中国则讲“公平”开放

坦率地讲，在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两个大国，讲“对等”开放实际是做不到的。美国允许私人办电视台、私营公司办基础电信，可以开设赌场，这些在中国是不允许的。简单地讲，美国对外资开放哪些领域，中国对外资也必须开放完全一致的领域，根本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方式。更何况中方对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存在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对华为、联想等企业运用政府力量予以打压等做法意见极大。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不透明机制，使一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被否决，这在半导体、5G、光伏发电、基础设施等领域都存在。这使人感觉美国政府的限制投资类别虽然明文列出的不多，但实际很多，并不比中国的少。

中美经贸关系多年来被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推进器。近日有个别专家表示，现在的双边经贸关系已经成为恶化双边关系的助推器了。但从客观实际和发展前景看，中美经贸的互利共赢基础并未有本质性改变。笔者也相信中美企业界和人民仍然致力于发展健康可持续的双边经贸关系。我们应共同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积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矛盾的有效建议。以实际行动证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可以克服困难、相互尊重、对话协商，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为两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的和平、进步及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 蕊

借鉴国际著名智库发展经验 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张大卫 元利兴

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政府科学决策参与程度低、智库行业主体单一、缺乏权威性评价标准体系、智库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研究分析国际著名智库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导致各国在智库行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不同，但在智库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共性。借鉴国际智库发展经验，我国智库建设应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加强完善智库内部管理机制，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关键词：国际智库 发展经验 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

作者简介：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改革目标。201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中宣部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2016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了“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2017 年 10 月举办了“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研讨会。我国智库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智库建设步伐日益加快。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应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发展经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一、世界发达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特点比较分析

智库发展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管理机制、人才队伍、资金实力与学术成果等多方面的影响。经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著名智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研和反复比较，可以择要梳理出它们的一些特点。

（一）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不同，造成智库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同时，国家政治体制也影响了智库体系构建的性质。

美国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和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智库体系的多元化结构，形成既贴近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的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使美国智库独具特色的“旋转门”机制能够顺利实施，通过这种机制深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在政府决策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英国属于君主立宪制，由女王任命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实权在内阁。在这种体制下，英国的文官系统较少依赖外部资源进行政策咨询，英国智库的党派属性非常明显，政党和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通过其政党实现。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温和多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德国政府认为，客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公众与政客对智库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做出最好的判断，并将“只接受政府资助”作为保持智库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因此，60%的德国智库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烙印，而是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准则。

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权模式，既有总统制特点，又有议会制特点，国家决策有依赖专家委员会的传统。总统在提出重大决策前，一般成立由政府官员、议员、专家和相

关行业代表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因此，政府和主要党派自身直接或间接组建的智库机构是法国智库的主力军。

俄罗斯智库主要脱胎于前苏联时期的官方智库体系，传承了前苏联时期良好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机制。近年来，俄罗斯上层政治固化制约了智库发展，在“可控民主”思维下，政府主导色彩明显，官方半官方智库占主导，独立性弱，大多数智库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强，以政府委托或大型国企委托为主。

日本属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常都会以“咨询会”“审议会”“恳谈会”等形式做详细的调研论证。这是与日本决策层联系最密切、比较制度化、较高层次的智库形态。日本智库存在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但总体上具有浓郁的企业特色，多数大型综合智库都以企业形态出现。

韩国与新加坡智库的发展均源于集权体制，智库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很少需要依靠“外脑”，智库主要由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组建。两国略有差别，新加坡智库虽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智库多位于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韩国是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体，企业附属研究机构为辅助的智库生态体系。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资金来源多以政府财政拨款或委托研究项目经费为主。

（二）各国智库行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国智库市场主要表现为多元构成的行业形态。目前，发达国家的智库在隶属形态上表现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社会智库三个大类，但这三个类型在各国智库行业的比重和作用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智库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以独立于政府的智库为主；日本智库大多以企业形式存在；而法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智库以政府主导或者依赖于政府的智库为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我国智库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社会智库发展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

各国智库行业管理体系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世界各国通常以行业协会机构负责智库行业的管理，包括智库行业标准制定、管理措施，甚至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制定，同时作为行业的自律性机构，对行业进行规范和协调。例如，美国设有咨询协会，英国设有管理协会，德国设有咨询协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智库行业评价模式。美

国对智库行业采用以市场尤其是政策市场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德国采用第三方评价为主导的模式，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日本和韩国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例如，日本一般会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代表国家的利益对智库活动进行监管和评价。韩国的智库评价则全部归属于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管理，NRCS 是韩国政府设立的智库管理机构。因此，日韩的智库评价模式实际上由政府主导。

各国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差异较大。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 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的数据为例，2015 年美国智库数量达到 1835 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 26.8%，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排名前 10 的智库年度运营费用均在 3000 万美元以上。美国智库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一些大型智库人员多在 200 人左右，人数最多的兰德公司达 1800 人，研究领域包括了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英国智库数量为 288 家，全球排名第三，大型智库研究人员均在百人以上，年度经费超过 1000 万英镑，其中费边社成员总数超过 1000 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智库类型最全、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德国智库规模约为英国的 50%，共有 195 家智库，大型智库约 12 家，雇佣研究人员约 30~80 人，年度预算为 500 万~1400 万欧元。日本共有 109 家智库，其中两家跻身全球百强智库。新加坡智库有 12 家，其中三家跻身全球前百强智库。从国家层面上看，智库行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三）国际著名智库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具有共性

一是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从智库资金渠道与筹资能力上看，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多元化的复合融资能力，社会委托、政府资助、项目外包、财团支持、会员会费甚至外国政府资助等都可以成为其筹资渠道，不同性质的智库收入构成有所区别。英国智库运营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或政党支持，但两者间并非直接隶属关系，智库按照规定全权安排和使用资金。德国和新加坡两国智库发展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自政府，并且都倾向于依托高等学府，选择采取以政府为主的支持方式是为了更有利地保持研究的自由和独立，而不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法国与韩国智库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中央预算，独立智库的资金则主要来自企业赞助与政府委托项目。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如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经费大部分源于政府，企业类智库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企业财团与委托研究费用。

二是人员构成高端化、多元化。在世界著名智库中，核心研究人员能力和水平较高，多为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这三个标准，其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大多数人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另外，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研究的自主性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繁琐事务的干扰，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著名智库，我国智库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尽管我国智库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方面水平差距不大，但是智库人员在经济实际管理、国际事务、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与国际智库研究人员差距较大。

三是普遍采用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智库作为独立实体，其运转需要合适的管理体制，其具体形态依赖于所在国家的法律，并受政治体制与相关文化因素的影响，因宗旨不同各国智库具体的管理机制有所差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智库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设置与分权管理，充分保证研究空间、质量与专业性。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理事会由重要捐助者组成，成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等，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美、英、德、法等欧美智库重视通过发展会员扩大智库资金来源与社会影响。日、韩、新加坡等国的会员组织成熟度要低于欧美国家，如日本只有一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智库发展会员制。

四是具有严格的成果质量管理机制。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将其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并将其融入到核心价值观中。例如，兰德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分析之源”，核心价值观是“高质量和客观性”；布鲁金斯学会追求“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正是在追求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的价值观指引下，国际著名智库大都制定了严格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评价管理机制。例如，兰德公司在1997年制定了《高质量研究与分析标准》，并不断完善修订。另外，一些国际智库建立成果质量管理部门或组织机制（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等），实施内外部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与监督，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五是智库传播平台体系比较广泛。美国智库具有完善的传播平台体系，主要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等刊物，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面向政府和大众传播智库观点。英国、法国与新加坡智库成果传播方式与美国基本相似。对政府决策方面上，德国、韩国、日本的智库则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接触

政府官员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而较少借助公众或媒体。日、韩的智库则更像是主办者的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发声的效果明显弱于欧美系智库，其成果首先对本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影响后，通过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影响政策制定。长期以来，我国智库注重于对成果内部汇报，而忽视了对外传播，因此，造成我国智库传播平台缺乏和传播能力不高，阻碍了我国智库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二、国际著名智库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启示

（一）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 and 要求的智库体系

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智库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崛起的中国需要建立能够代表大国软实力的智库。发达的智库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智库作为第四种或第五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决策环境和条件异常复杂，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政府决策面临过去不曾有过的挑战。现代社会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基本保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国崛起参与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内在需要。

建立和完善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智库体制机制。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与其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智库决策咨询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国理政”的国家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运用国家制度有效实施“治国理政”的能力。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当前实现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支撑作用，所以要充分认识我国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建设与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智库体制机制。

建立促进智库快速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从发达国家的智库管理体制看，均已经出台了有关智库的法律制度，包括从财税政策到政府决策程序都是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同时，法律制度决定了智库组建的形式和运营模式，例如大部分国家的著名智库多以政府研究机构、社团、企业形式出现，性质上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在各国也都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通过规范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发挥智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二）把握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培育智库行业市场

完善智库行业顶层设计，加快智库总体布局 and 选择。从发达国家智库行业发展来看，多数智库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政府布局 and 市场化运行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政府对智库产业进行战略布局有利于打造服务于国家利益 and 战略的智库结构，能够在总体上调控制智库行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保证智库市场活力的有效机制，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智库找准自己的行业定位 and 发展方向，保证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对智库行业 and 体系进行总体布局，在运作方式上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智库采用市场 or 行政性的管理机制。

创造国际化、网络化的智库发展环境。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 and 方向，发达国家的智库已逐步实现其国际化布局，增强全球影响力。智库全球化呈现出研究领域国际化、研究视角国际化、人才队伍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和机构网络全球化等特征，为此，应逐步推动中国智库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研究网络、成员网络 or 合作网络，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智库网络体系。

（三）加强人才、资金和成果等内部运营管理机制建设

战略定位事关智库的发展方向。纵观国际著名智库，大多具有明确的研究定位 and 指向，专业性强，服务对象明确。当前，国际著名智库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长期性和实效性的趋势。因此，我国智库可以结合自己人员、资源等情况，发挥自身特长，找准战略定位，瞄准重点领域，加强对国家重大经济、社会 and 政治等方面重大问题长期性、系统性、实用性的跟踪研究，促进智库思想成果转化。

人才管理是智库管理的核心。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人才培育、管理、监督、激励 and 评价。一是重视培育学术领军人物。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顶级学者 or 学术带头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要求他们深植各个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 and 广阔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 and 影响政策层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前政要和领导人的影响力。美国一些智库的负责人一般由重量级人物出任，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前常务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犹他州前州长、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智库经验，发挥我们国家前政要 or 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 and 提升智库国际国内影响力。

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纵观国际知名智库无不以高质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

大影响闻名于世。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智库都将质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成果质量评价管理经验，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

资金来源对智库生存至关重要。财务上的不独立是阻碍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欧美等国际智库大都积极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在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努力扩大研究合同收入、社会捐赠、会员费、出版物收入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来源。中国智库应借鉴这些国家智库多样化的资金筹措方式，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扩大财力，保障智库的稳定运营。

建立完善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国外著名智库大都具有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通常智库领导层（多为理事会）主要负责智库的大政方针，如确定智库主席或所长、确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建议研究议题等内容，日常管理通常由主席或所长负责；智库组织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部分，政策研究是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大多实行项目管理制度，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领域实行阶梯配置；国际著名智库具有比较完备的传播体系。这些方式都是比较成熟的方式，也是国际著名智库通用管理方式，中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

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加快，智库行业快速发展，智库规模和类型不断扩大；众多智库活跃于国际舞台，智库与国际智库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智库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应看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智库在国家科学决策中参与程度较低、智库产品无法满足政府科学决策需求；智库行业存在主体单一、市场机制不完善、标准体系欠缺；智库本身存在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为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在坚持这个大前提和总的要求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应充分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体制机制，针对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举措，构建我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创新完善智库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一）完善政策分析供需体系，实现思想产品供需对接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竞争，主要表现在谁能用自己的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决策。在政策分析供需体系中，智库是供给方，提供政策思想和专业建议，政府、媒体和公众是

政策思想的需求者。思想产品的供需双方应加强互动，决策部门主动打开公共需求的“闸门”，接上智库产品供给的“活水”。

充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作用，使智库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制度化。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府购买政策咨询服务制度、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政府将“断”与“谋”适当分离，将智库参与作为必不可少的一环纳入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的过程，提升政府决策过程和信息对智库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构建政策分析研究供需交流平台，使智库了解政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政府及时向智库发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意向，构建政策开放讨论的社会化网络，释放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有效积极互动，引导智库发挥己之所长，对重大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

建立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渠道，使智库的思想产品为国为民所用。政府要畅通与智库沟通的渠道，建立择优选用机制，引导智库通过思想产品供给、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和研究成果社会共享等方式发挥作用。鼓励决策者到智库发表重要演讲，鼓励智库通过公共传播手段对政策进行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度。

形成政府政策测试机制，使智库参与决策程序化。通过调查研究、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方式，让智库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通过敏感性分析、第三方评估、试错测验等方式，对政策实施状况进行中期评价，发现政策漏洞，提出修订意见；通过预期绩效考察、宏观效果分析、社会反馈等方式，对政策提出后期完善和调整意见。

（二）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

制定体现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智库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一是改善智库在重点研究领域的布局。为避免智库在国家重要战略领域同质化过度竞争，需突出一些重点智库主要业务方向和研究专长。如在国家战略、公共外交、国家安全、宏观经济、改革、创新、开放、金融、高科技、社会治理、能源、民生等领域，国家应引导一些智库进行长期定向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覆盖和深度的研究布局，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精确度。二是制定智库业发展规划。明确智库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政策，赋予各类智库平等的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和行业自律，防止内外利益集团的渗透和控制。对智库在国际舞台如何开展交流活动也要有总体规划，如最近建立的中美智库间经济对话机制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培育和拓展智库思想需求市场。拓展政府需求、社会（公众）需求、国际需求（国

际事务、国际社会、国际人士)、公共外交等需求市场的空间;同时对应不同的参与决策方式和机制,包括内参和政策报告、咨询机制(会议、机制化的委员会)、承接“发包”课题、参与公共外交、公共渠道及社会影响、“第二轨道”机制(二轨对话)、个人渠道、人员交流及为高层领导讲课。

对智库市场进行有效规制。一是明确市场准入政策和标准。在市场准入政策上,对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要明确定义,对特色新型智库数量、类型、服务领域和水平进行规制,在行业上把握智库市场的发展布局 and 规模,防止鱼龙混杂的局面。二是构建质价对等的市场定价机制。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要逐步使思想资源配置在思想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智库产生的思想产品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费用,充分体现其成果的价值。

(三) 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

走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发展路线,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智库体系,将智库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子系统,形式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共生系统。一是在功能上,探索建设能够发挥决策智力资源聚合功能、连接体制内外桥梁功能、联系其他各类社会群体管道功能和发挥思想产品竞争市场功能的多样化智库。二是在服务对象上,探索建设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国家级智库和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省或市)智库。三是在领域和行业上,进行优化布局,探索建设国家战略、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安全等各方面专业化智库。四是在智库类型上,建设偏学术型智库、偏媒体型智库,体制内智库、社会类智库等。五是在层次上,探索建设高端智库和一般智库多层次的智库体系。建立以政府智库为主导,其他智库为补充的国家高端智库体系,重点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一般智库应以民营等社会类智库建设为重点,为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等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构建政府智库、大学智库和社会智库互补发展格局。一是引导政府智库转型。加快推进政府智库由传统智库向现代新型智库转型,在组织模式、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方面转型,推动研究方法创新,提高研究成果质量,提高智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人员专业化水平,推动政府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二是加强大学智库建设。让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充分发挥高校在基础学科研究、研究机构和人才丰富的优势,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大学智库的良性发展。三是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智库发展。在制度、经费、数据、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民间智库的建立和发展。构建社会智库思想成果向决策者提交和沟通的

渠道，建立它们参与政府决策和研究成果采纳的常规机制。为社会智库提供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和基础条件，政府研究项目可让独立型智库参与竞争，靠项目竞争获得经费；对于社会智库要明确其按非营利性组织定位，不按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注册，在财税政策上给予支持。

建立健全智库发展的相关法律，为智库体系建设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一是加快智库立法工作，制定智库发展标准，对智库的定位、性质、管理、经费、运行、评估与监督等给予法律性、制度化的规定，确保各项政策法律制度的落实，使智库发展有法可依，消除智库发展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障碍，创造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大对智库建设的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通过提供财政拨款、设立基金支持、社会组织捐款资助、购买政策咨询服务等方式支持政策研究的智库，对于企业和个人捐款给予免税政策；对于国家重点支持智库实行单位增值税减免政策；对于智库研究人员劳务费占经费比例无限制，目前可参照科研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

（四）建立智库行业协会或联盟等智库交流机制和平台

设立智库监管机构和交流平台，强化行业自律和自我净化，促进智库协同发展。一是设立专门的智库行业管理机构，负责智库行业标准制定、行业评价、行业的协调管理、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协调和监管。二是尽快完善智库发展的行业监督机制，加强行业监管。三是建立智库的行业性平台组织，通过定期组织智库会议、合作研究等交流活动，实现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快智库产业发展。四是通过平台合作促进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共享，更大程度地发挥智库思想产品的效能。五是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建共享的智库信息化平台，实现智库间对重大战略项目共同探讨研究、共享知识资源。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将促进我国高端智库的管理和发展。

建立分类管理的行业管理机制。一是各类智库布局 and 分类管理、智库思想产品市场管理。在思想产品市场上，智库是思想产品的供给方，政府、企业、媒体和大众等都是产品的需求方和消费者，完善的思想产品市场需要存在不同类型的智库，这些智库能够输出多层次、多种类的思想产品以满足不同的思想产品消费群体。二是在不同的战略领域内各聚集数十个顶尖智库，避免重复研究，有效组织分工，及时沟通信息，赶超国际同行。

建立智库评估与淘汰机制。通过规范的评审标准、评审流程、发布机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同行评议或第三方对智库的评估机制，尤其是高端智库的评估机制，对其思想成果的数量、质量、成效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估，优秀的要奖励，落后的要淘汰；建立智库咨询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

度，改变专家咨询无责任风险的现象，以此避免专家咨询的随意性；另外，通过评估和淘汰机制，有效避免当前智库建设盲目无序，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五）明确战略定位，强化智库独立性和责任担当

明确智库战略定位，实现专业化和错位发展。一是坚持以决策问题为导向。国外著名智库都有明晰的战略定位，多数以政策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智库不是纯粹学术性研究机构，而是政策研究、设计和建议机构。因此，中国智库要围绕政府决策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二是在加强对当前热点、难点政策问题研究的同时，注重对长期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三是加强智库专业性建设。智库应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置，确定自己的专业化研究领域，如综合、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错位发展。

保持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独立性。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独立性：一是保持智库人员的思维独立性，不能形成依附性。二是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坚守思想产品的独立性，能发出客观独立声音，不能人云亦云。三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国家智库体系具有独立性和特色，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适合我国治理体系的智库体系和制度程序，不能照搬照抄。四是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汇聚高端智力资源，防止形成对西方国家的智力依赖。

强化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责任与担当。一是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具备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发点。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智库成员需要有爱国之心和报国情怀，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目标。四是要具有追求真理，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理想信念。五是在国际上要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主张、提供中国方案，承担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提高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应遵循科研工作的规律性，重点要加强科研管理工作。当前，我国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几个方面：一是以问题为研究导向，提高研究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二是加强智库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时效性就是要研究一些突发性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前瞻性就是要对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有战略预判。三是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战略性和可操作性，要“顶天立地”。四是智库研究要注重基础研究积累，采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六）培育具有国际一流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培育以学术领军人物为领头羊的人才队伍。发达国家著名智库大都培育或引进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对智库提升国际国内影响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成为智库的招牌。因此，我国智库应打造以学术带头人为领头羊的研究人才队伍。一是培育或引进所属研究专业领域的国际顶级的学术带头人。二是采取“学术带头人+团队”的人才队伍模式。以顶级人才为核心，以岗位专家为骨干，以储备人才为辅助，打造熟悉国情世情、善于政策研究、具有专业化素养的高端人才团队。

充分发挥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影响力。我国与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因而不可能出现政党轮流坐庄时的“旋转门”现象，也就无法在人才流动上采用“旋转门”，但美国前高官和总统离职后到智库工作成为惯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我国高层领导任职离职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国际国内影响力，促进智库发展。一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负责人，发挥其政策经验和影响力，把握智库发展定位方向，整合社会资源。二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顾问，参与某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讨论。三是由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学术带头人，带领专业研究队伍开展研究工作。四是发挥前高官或领导人的资源整合能力，整合资金、人才、部门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资源。

创新国际一流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人才培育机制。一是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培育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二是提高研究团队的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国际化研究能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和人才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思想产品生产的人才薪酬体系、职称评审制度、激励机制等，充分认识智库中人的核心作用和价值，提高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待遇。四是创新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同时，应进一步畅通渠道，使社会各领域优秀人才有机会参与到智库工作中来。建立智库与决策、行政部门之间的交流机制，包括派出研究人员到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挂职交流，邀请这些行政部门高级公务员定期或不定期就重大方针政策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讲座交流，以及到智库机构定期挂职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等方式。

（七）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

加快构建国际化的智库网络体系。一是在海外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和国家，通过设立办事处、与国外学术和智库机构建立分支机构、聘用海外研究人员等方式，推进研究网络国际化。二是通过与国外机构开展国际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强化国际化智库网络建

设。另外，支持国内智库与国际同行之间深入交流，支持研究人员走出国门拓展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化的智库人才培育计划，促进国内智库建设全球化的智库网络，推动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三是加大与国际著名智库交流合作，注重智库知名度和影响力建设。加大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合作力度，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创建国际访问学者资助平台、举办各类国际公共政策讲座和论坛、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等，逐步提高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加强智库传播，促进智库思想产品包括智库影响力的转化，形成智力资源的交互平台。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智库通过设立与政府、社会、媒体等机构沟通的专门机构，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出版物、内部报告等形式进行传播。二是举办各类会议，邀请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等代表，通过交流研讨传播智库自身观点。三是通过智库网站和公开出版物、新闻媒体发布新的成果和政策时评，传播智库观点。另外，还可以利用智库人员的个人影响力和关系网进行人际传播，打造我国国际智库的名人、名品和名牌，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八）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当前，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研究报酬获得、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刚性约束和实际困难，建议首先解决最突出的几个问题：

一是改善智库参加国际交流的管理。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简化智库在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对话、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出台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关于出访经费、出访时限、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的政策。

二是落实科研激励支持政策。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对《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细化落实，并对落实情况组织督查。审计机关应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开展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

三是出台智库评价制度。智库评价制度包括对智库科研人员的评价和对智库的评价。鉴于咨政类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区别，应建立智库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系统，以体现咨政类成果的针对性、务实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制定智库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对智库的科学评价，激励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智库总体发展水平。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中国的海外消费：特点、原因及对策^{*}

毛中根 武优勳

摘要：中国海外消费呈现着规模大、购物消费明显、模仿型排浪式消费等特点。海外消费，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增长、本币升值、出境政策放松、境外支付便捷等各国一般性原因驱动使然，也反映了国内商品供需结构失衡、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信心不足、国内部分高端商品价格偏高等中国特殊性原因作用下的结果。海外消费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应对海外消费，日本和韩国采取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中国需实施吸引入境旅游、促使国内高端产品价格趋于合理、推动产品供给结构升级、引导居民理性消费、鼓励国内旅游公司走出去等措施，积极引导海外消费回流。

关键词：海外消费 消费外流 发展特点 增长原因 国际经验

作者简介：毛中根，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消费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优勳，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在国内消费低迷的同时，海外消费却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不断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积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服务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实证研究”（713732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消费提升路径与机制研究”（14ZDA052）的阶段性的成果。

极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海外消费，也称消费外流，指国内居民为满足生活需要而出国（境）购买服务或商品的行为，主要包括海外旅游消费、海外购物消费、海外医疗消费、海外留学消费等。目前，根据国家商务部的统计口径，海外旅游消费和其他类海外消费没有细分开，而是将海外旅游消费纳入海外消费总量统计之中，因此，海外旅游消费与海外消费在数量上大致相等。一方面，2015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9%，同比增长 11.3 个百分点，但依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67.67 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30 万亿元，境外消费达 1.5 万亿元，占 GDP 的 2.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有相似文化的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消费外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剖析海外消费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积极引导海外消费回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中国海外消费的特点

（一）规模居世界首位

中国游客被称为“会行走的钱包”。海外消费规模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海外消费规模大。^① 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15 年中国出境人数达 1.2 亿人次，居民境外消费总额约 1.5 万亿元。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5 年中国游客国际旅游花费共计 2920 亿美元，规模连续 4 年居世界第一。第二，海外购物消费规模大。2014 年中国消费退税购物规模达 42.5 亿欧元，^② 约占全球的 1/3，连续 7 年居全球首位。

（二）高购物消费特征明显

中国游客被称为“土豪”。高购物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购物消费占海外总消费的比例较大。2015 年中国 1.5 万亿元海外消费中至少有 7000~8000 亿元用于购物。《全球自由行报告 2015》显示，2015 年中国自由行游客海外购物花费占海外旅行总支出的比例约为 55.8%，明显高于一般发达国家自由行游客海外购物支出比例。第二，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奢侈品总消费的比例较大。2015 年中国居民全球奢侈品消费达 1168 亿美元，约占全球的 46%，其中境外消费占奢侈品消费总额的 78%。

^①中国商务部和世界旅游组织数据统计口径不尽一致，但都表明中国海外消费规模大。

^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购物退税是指一些国家对境外游客在退税定点商店购买的携带出境的退税物品，按规定予以退税，在一定程度上，购物退税金额大小能够反映海外购物消费规模。

（三）模仿型排浪式特点突出

中国游客被称为“时间高度集中的候鸟”，海外消费的热点比较集中，购物过程中经常出现“扫货”现象，甚至导致一些消费场所商品脱销。2014年国庆节期间，韩国一些著名的街区几乎演变为“华人街”，甚至出现免税店在开门半小时前就有大批中国游客在门口排队等候的情况。“爆买”成为日本2015年度流行语，经常被媒体用以形容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特征。比如，2015年日本马桶盖、大米、电饭煲成为中国游客的抢购热点。此外，韩国的美容产品、澳大利亚的奶粉及保健品、法国的名牌包、瑞士的手表、美国的苹果手机等一些原产地产品成为中国游客海外抢购的“标配”。

（四）日本和韩国成为中国居民海外消费主要目的地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排名中，居前三位的国家依次为泰国、韩国、日本。其中，中国游客赴泰旅游达790万次，人均消费额约为8430元人民币（46363泰铢）；赴韩旅游达611万次，人均消费额约为13700元人民币（2200美元）；赴日旅游达500万次，人均消费额约为14600元人民币（28.38万日元）。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人次最多，但人均消费和总消费额低于日本和韩国。这反映了中国居民购物特征明显，日本和韩国成为中国居民海外消费主要目的地。

二、海外消费增长的原因分析

（一）各国共同性原因

1.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国民收入提高是海外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表明，境外旅游消费增长与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达2000美元时，进入境外旅游消费增长长期；人均GDP达3000美元时，旅游消费需求将出现爆发性增长。以中日韩三国为例，人均GDP在2000~4000美元阶段，日本、中国出国旅游人数出现较快增长；人均GDP在4000~8000美元阶段，日本、韩国和中国出国旅游人数年均增长较快，韩国和中国的出国旅游支出年均增长率尤为突出（见表1）。总体而言，中日韩在人均GDP达2000美元后海外旅游人数或消费支出实现了较快增长。

2. 本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升值使得以外币计价的境外商品更便宜，因汇率产生的价差驱动消费者境外消费。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测算，自1971年实行浮动汇率后日元呈升值趋势，1971—1977年日元兑美元升值约25.4%，1977—1989年升值约48.6%。韩元在1986年之后出现了阶段性升值，1986—1991年韩元兑美元升值约16.8%，1992—

1996 年间汇率较为稳定。中国自 2005 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呈升值趋势，2005—2009 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 17.5%，2009—2015 年升值约 8.8%。本币升值引致海外消费增长，日本在 1972 年之后出国旅游人数快速增长，韩国在 1987 之后出国人数和出国旅游支出快速上涨，中国在 2006 年之后出国人数和出国旅游支出也出现较快增长。

表 1 中日韩三国人均 GDP 与海外旅游情况

国家	时间段 (年)	人均 GDP (美元)	人均 GDP 年均 增长率 (%)	出国旅游支出 年均增长率 (%)	出国旅游人数年均 增长率 (%)
日本	1970—1973	2004—3931	25.2	—	51.1
	1974—1977	4281—6230	13.3	—	10.4
韩国	1983—1987	2268—3627	12.5	6.1	0.9
	1988—1991	4813—7675	16.8	40.9	36.8
中国	2006—2009	2082—4515	22.2	21.6	11.3
	2010—2014	4515—7587	13.9	31.7	16.9

数据来源：人均 GDP 数据引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出境旅游支出数据引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日本出境旅游人数数据引自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公布的平成 20 年《观光白皮书》；韩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出境旅游支出数据引自《韩国观光年鉴 1995》。

3. 出境政策放松。出境政策宽松，减少了公民出国旅行束缚，为海外消费提供了可能。日本自 1964 年逐步放松出境旅游限制政策，1978 年完全取消公民携带外汇限额的管制。韩国自 1983 年逐步实施国外旅行自由化政策，1989 年彻底废除了国外旅行的年龄限制。中国自 1983 年逐步放开公民出境游，出境旅游政策经历了 1997 年“适度发展出境旅游”，到 2005 年“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再到 2010 年“有序发展出境旅游”的演变。中国公安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法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中国已与 127 个国家缔结各类互免签证协定，包括 8 个全面免签协议；与 39 个国家达成 63 份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安排，为公民出境旅游拓展了空间。

4. 境外支付更加便捷。境外支付手段日益国际化、多样化，为海外消费带来便捷。信用卡走向国际化，也方便了公民出境旅游。1967 年，日本信用局（JCB）与美国运通卡合作发行国际卡，之后日本国际信用卡实现了较快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信用卡业务在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普及，截至 1988 年，世界流通的各种信用卡约 7.5 亿张，促进了韩国出境旅游的发展。目前，中国出境游公民使用信用卡进行结算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银联发布的《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 2015 年末，银联卡

全球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15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400 万家商户和超 200 万台 ATM，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二）中国特殊性原因

1. 国内商品供需结构错位。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中高收入阶层，该群体的消费需求具有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特点，对商品品种、质量、安全以及消费环境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国内高端商品市场发展稍显不足，未能有效满足中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导致这部分消费者转向国外消费。国际咨询公司德勤的《2016 年全球奢侈品力量调查报告》显示，前 100 名奢侈品公司中，中国奢侈品公司（含中国香港 6 家）共 8 家，其中 6 家都属于黄金首饰类公司。

2. 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信心不足。中国居民出境消费从主要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反映了消费者对国内商品品质的不认可。国内产品质量事件时有发生，比如，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2011 年双汇“瘦肉精”事件、2014 年火锅地沟油案等重大消费事件的曝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国内商品的信心和意愿。据《2014 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数据，国家工商总局共对 92 批次的样品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正品率仅为 58.7%。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2015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约 63.9 万件，商品类投诉 30.9 万件，占总投诉的 48.34%。

3. 国内消费者还不够成熟。消费者缺乏理性的消费观念。中国大妈式购物，在海外免税店排队等候，抢购、扫货、爆买等集中式海外消费更多地表现出炫耀性和冲动性消费。部分富裕阶层通过对物品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和奢侈性，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炫耀性目的。《2014 出境自助游行业报告》显示，旅行花费方面，2014 年度人均每次出境游花费 8173 元人民币，其中，购物花费占 28%；33% 的游客在旅游前对购物不设预算；39% 的赴境外旅游游客购物实际花销高于预算。

4. 国内部分高端商品价格偏高。高端消费品在国内的售价远高于境外的售价，导致大量消费外流。据德勤发布的数据，中国依然是全球奢侈品物价最高的国家，23% 的奢侈品牌在国内的标价比境外贵 16%~25%。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国内税率比较高，中国进口关税税率一般为 6.4%~25%，高端商品还要额外征 30% 的消费税，远高于日韩等国；二是内销成本比较高，根据《2015 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数据，中国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率为 16.0%，比世界水平高 5 个百分点；三是国外品牌商对中国采取撇脂定价策略，由

于具有市场垄断地位，国外品牌商分区域实施差别价格；四是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1985 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使得部分出口产品出厂价低于国内价格。

三、海外消费增长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影响

1. 有利于提升国际地位。国际旅游是输出国家文化、形象和影响的重要渠道。通过举办国家主题文化年、体育赛事、盛大展会等活动，可以更广泛地吸引国际游客，增进各层面、各领域的国际交流，扩大本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有利于传播价值观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海外消费增长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崛起，有助于国家影响力的发挥。国家形象是软实力资源，国家形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出境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2. 有利于世界经济平稳增长。海外消费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总需求，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旅游业后向联系较强，对相关产业能产生较强刺激，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自 1996 年开始，旅游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世界上创造新增就业机会最多的产业。此外，在扶贫方面，世界各地的偏远欠发达地区往往都有独特的旅游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可以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的生存生活状况。国际旅游业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5 年旅游产业竞争力报告》指出，旅游产业占全球经济 10% 的份额，年均增速为 3.4%，预计未来 5 年增速将达 5.2%。

3. 不利于母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平衡。海外消费的过快增长，会影响消费流出国（母国）的国际服务贸易收支平衡，导致或者加剧国际旅游业收支逆差。出境旅游人数急剧增加，使得 1989 年日本旅游收支赤字居世界首位，高达 193.26 亿美元。过快的出境旅游，使韩国的国际旅游收支在 1991 年出现逆差，1992 年逆差达 4.87 亿美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15 年中国服务贸易收入 2304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1%；服务贸易支出 4397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5%；服务贸易逆差 2093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9%，其中旅行项目逆差 1950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81%。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 不利于扩大内需。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消费是社会总需求中最终消费的组成部分，出境旅游过快增长造成内需

“漏出”。2015 年中国游客国际旅游花费共计 29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连续 4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境外旅游消费市场。《中国统计摘要》显示，2015 年中国消费率为 52.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一般在 80%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在 70%以上。

2. 不利于国内制造业发展。消费外流挤压了国内市场发展空间，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内制造业发展。经济新常态要求致力于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依靠创新驱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背景下，国人对自己商品不信任，热衷到海外购物，将严重打击国内企业家创新创业激情。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检测指标，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测算，2015 年中国 PMI 指数平均值约为 49.91，低于作为经济强弱分界点的 50，甚至低于 2008 年遭受全球经济危机时的 PMI 指数平均值（约为 50.16）。

3. 不利于构建消费强国。海外消费增长，客观上反映了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不利于构建消费强国。消费强国的重要象征是消费动力转换并引致消费自信提升。消费动力转换主要指消费发展不再是受政策驱动，而是消费内在自发驱动，消费者自愿追求发展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由消费者共享，消费者又自愿去追求发展型消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消费自信的提
升，表现为在消费品品质保证基础上，国民越来越相信国产消费品，对中国自主品牌产生发自内心的消费自信、消费忠诚和消费自豪。

4. 加剧消费不平等。海外高消费加大国内居民消费不平等，不利于社会和谐。中高收入阶层出境旅游需求旺盛是中国出境旅游超常规发展的经济原因，中高收入阶层海外高消费，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机会海外消费，将加剧社会不公平。中国公安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法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有效的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约为 1.2 亿本。海外消费外流也是国民财富的外流，不利于国民财富在阶层间的流动，使得低收入阶层更难有机会获得财富的增加，从而固化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影响消费的不平等。

四、日韩引导海外消费回流的经验

随着居民出国旅游急剧增长，1989 年，日本国际旅游收支逆差居世界之首，高达 193.26 亿美元。1996 年，日本出境旅游人数约 1669.5 万人，入境旅游人数约 383.4 万

人。^① 1991 年，韩国出境旅游人数约 185.6 万人，仅为入境旅游人数的 58%，但出境旅游花费超过入境旅游花费，出现国际旅游收支逆差；1992 年其逆差达 4.87 亿美元；1995 年出境旅游人数超过入境旅游人数。日本和韩国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鼓励入境旅游、抑制出境旅游的措施。

（一）发展国内旅游业

完善入境旅游法律法规，深入挖掘国内旅游资源，加强对外宣传。20 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颁布并实施《国际会议振兴法》和《吸引海外游客法》。日本、韩国重视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积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1996 年，韩国试行“文化旅游节庆”政策，开发特色文化资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分别申请了 17 和 10 处世界遗产。日本和韩国还通过发挥海外机构宣传作用、洽谈商务、举办会议、放宽入境手续、设置多国语言旅游标识、培养翻译人才等多举措加强对外宣传。2004 年日本政府组织了“访日宣传活动”；1994 年韩国举办了旅游年。这些措施提高了旅游业的海外知名度，吸引了大量国外游客入境旅游。

（二）发展国内免税产业

发展免税产业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扶持本国品牌。各国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等措施积极促进免税产业发展，吸引国内外的消费者。1995 年，韩国免税品销售额为 10.5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位；韩国、日本航空公司飞机上免税品销售额分别为 1.1 亿美元和 1.0 亿美元，排名居世界前三。韩国政府不仅出台了包括济州离岛免税、购物退税、调整购买次数和额度等一系列政策来吸引国际游客，还通过积极引导本国出境公民在本国免税商店购物，进而引导消费回流。

（三）促进国内旅游公司跨国经营

旅游公司实施跨国经营，在境外建立子公司，通过境外子公司的经营，将本国居民出境的花费通过母公司利润汇总的方式“潜流”回国内，实现消费回流。为满足本国出国游客的安全和便捷等方面的需要，1975 年日本交通公社建立了印度环球部，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规模的跨国经营活动，逐步形成覆盖全球的旅游网络。其中，在印度 15 个主要大型城市设立办公室，该公司约 80% 的收入来自日本的出境旅游。2006 年，日本交通公社销售额达 190 亿日元。

^①数据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网站公布的平成 20 年《观光白皮书》。

（四）采用适当限制性措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面对国内经济不景气、海外消费过快增长的局面，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入境旅游、抑制出境旅游的措施。比如，公务出差方面，大幅度取消公务出国；税收方面，向出国旅游的民众征收 1 万韩元离境税，并将所征税款全部拨给文化观光部作为观光振兴开发基金；汇率方面，政府还出台了提高换汇率、限制携带外汇出境额度、在国外消费超过 1 万美元将受到法律制裁等规定。

事实上，上述政策措施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发展入境旅游、促进国内免税产业发展、实施旅游公司跨国经营等措施下，日本入境旅游人数持续增加，2014 年入境旅游人数为 1467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 33.6%；出境旅游人数为 1668 万人，较上一年度减少 3.5%。旅游收支自 1959 年以来首次实现顺差，盈余 2099 亿日元。在发展入境旅游、促进国内免税产业发展、适当限制境外消费等措施下，韩国出国旅游人数锐减，1998 年国际旅游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盈余 37 亿美元。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中国海外消费的持续增长在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无法回避其存在的消极影响。面对海外消费持续增长，日本和韩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发展入境旅游、促进国内免税产业发展、促进国内旅游公司跨国经营、实施适当限制性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中国需立足实际情况，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海外消费回流。

（一）加快国内旅游业提档升级，积极吸引入境旅游

发展入境旅游有利于对冲消费外流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升旅游环境，深度开发旅游产品，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增强对外宣传力度是吸引境外游客入境旅游的有效保障。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旅游业绿色发展，加快美丽中国建立。实施文化+旅游战略，提升游客消费体验，增加旅游资源与产品的附加值。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继续简化入境签证手续的时间，建设方便外国游客的公共设施。依托中心城市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培育面向全球旅游消费者的国际消费中心。采取税额减免或奖励等措施，鼓励驻外机构或旅游企业在境外积极宣传本国文化、民俗风情和旅游景点，支持鼓励旅游企业开发特色旅游路线，增强国内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综合运用各种措施，促使国内高端产品价格趋于合理

国内高端产品价格趋于合理有利于促进海外消费回流。完善税收体系、大力发展免

税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等是促使当前国内高端产品价格回落的有力措施。推动消费税改革，明确区分高端奢侈消费品与高端大众消费品，降低进口消费品的消费税。加强对免税业务的政策支持，完善和落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集中力量打造民族免税业集群和塑造中国免税业品牌。加快流通标准化建设，完善流通标准管理，发挥流通先导作用，推动流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制定跨境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管理，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促使价格合理回落。

（三）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产品供给结构升级

产品供给结构升级有助于吸引海外消费回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是推动产品供给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统一内外检测标准，强化品质监管，丰富产品和服务品种，推出精品，打造中国自主品牌。促进经济转型，推动国内企业加快自主创新步伐，积极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生产更多高端优质、物美价廉的产品。鼓励企业采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质量在线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提升产品品质、技术含量、市场声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结构。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让消费者树立信心。

（四）加强消费教育，引导居民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有助于居民海外合理消费，减少我国消费外流。构建国民消费教育体系、健全产品信息宣传机制是引导居民理性消费的重要途径。建立和完善高校消费教育体制，建立消费教育研究机构，提供以专家讲座为主要形式的公共消费教育，发挥网络、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的作用，通过典型消费事例评析、热点消费产品知识介绍等措施帮助居民提升消费认知水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引导居民理性消费。

（五）出台旅游投资政策，鼓励国内旅游公司走出去

国内旅游公司“走出去”有利于降低消费外流冲击。近年来，中资跨国并购海外旅游资产迎来高潮，以中国海航等中资入股维珍澳洲航空、安邦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中国携程收购全球知名旅游网站天巡等代表性案例。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国内有实力企业对沿线国家有序推进旅游投资，对接中国出境旅游需求，通过旅游需求走出去带动中国旅游服务走出去，有效构建旅游领域的利润回流机制，缓解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压力。可以依托高校或其他机构开展国外旅游市场调查和研究，总结其发展经验、预测国际旅游市场发展趋势等，为旅游企业走出去提供基本参考。支持大型旅游企业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先走出去，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与中小民营企业合作，

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强化我国驻当地使馆的作用，建立健全政府驻外部门与海外旅游企业的信息共享机制。支持构建旅游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对冲机制，开发针对旅游企业的兼具保险与理财功能产品。进一步深化旅游业国企改革，提升境外国企的市场运营效率和风险自控能力。

参考文献：

1. 戴学锋：《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初探》，《旅游学刊》2012年第9期。
2. 戴学锋：《论出境旅游在扩展中国国际影响力中的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3. 杜江：《国际著名旅游企业跨国经营案例分析》，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
4. 今井喜昭、王瑞林：《日本国际旅游的发展新趋势》，《旅游学刊》1990年第2期。
5. 李祗辉：《2007年韩国旅游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 李祗辉：《韩国文化旅游节庆政策分析及启示》，《理论月刊》2013年第7期。
7. 刘世杰：《日本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的教训》，《税务与经济》1982年第2期。
8. 毛中根、叶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居民消费发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9. 蒙泽群：《大力发展信用卡业务提高旅游业综合服务经济效益》，《旅游学刊》1988年第2期。
10. 汤伊心：《试论日本发展国际旅游业的经验及借鉴》，《前沿》2015年第9期。
11. 姚永敬：《日本国际旅游机构、政策与动态》，《旅游科学》1999年第3期。
12. 依绍华：《旅游业的就业效应分析》，《财贸经济》2005年第5期。
13. 赵长华、戴贇华：《韩国旅游业何以获得飞速发展》，《旅游科学》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谷 岳

建立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思路与对策

朱福林

摘要：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本研究对自由贸易港概念、形态分类、基本特征、经济效应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介绍了世界自由贸易港的运营与监管模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建设自由港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借鉴国外自由港发展经验基础上，对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提出了战略思路与对策措施。

关键词：自由贸易港 境内关外 全面开放

作者简介：朱福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我国通过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实现了国际贸易大国的地位，但随着经济发展向更高阶段过渡，以往的自由贸易区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而且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不断涌现也加剧了我国提高自由贸易区规格的压力。因此，纵观国际国内形势，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自由贸易港作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产物，近代以来已变成加快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极、产业发展、科技及制度创新等的重要平台。特别是二战以后，自由贸易港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自由贸易、振兴本国经济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政策手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把发展自由贸易港作为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因此，发展自由贸易港对目前我国建设现代经济体

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自由贸易港的概念、类型与发展趋势

（一）自由贸易港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自由贸易港（简称自由港）概念，但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可自由港是最早出现的自由贸易区或自由经济区。自由港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史上有据可查被正式命名的自由港产生于 1547 年，位于意大利西北部斯卡纳地区热那亚湾的雷格亨港（今里窝那港），距今已有 471 年的历史。随后，意大利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进而欧洲其他一些重要城市也相继效仿，或开设自由港，或在港区划出自由贸易区，发展转口贸易。这个自由港之风就从意大利刮向整个欧洲并蔓延至全球。二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国际经贸联系，以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采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就是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港（区）形式。目前全世界约有 600 多个自由贸易港（黄志勇、李京文，2012）。^① 中国香港、新加坡、汉堡、巴拿马、亚丁、贝鲁特等著名的自由港已发展成国际贸易枢纽、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李建萍（2013）认为，自由港又称“自由口岸”，是指设在一国或地区境内、海关管辖之外的，货物、资金、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全部或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免征关税，且以港口为核心的区域。李金珊、胡凤乔（2014）认为，自由港是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所具有的“免关税”“自由通行”“免于海关监管”等基本特征都是针对海关关税体系而言。李九龄（2011）认为，自由港是指划在一国“关境”以外的全部或绝大多数外国商品可以免税进出的港口，又可称为自由口岸、自由贸易区、对外贸易区，自由港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一种经济特征。刘明笑（2011）认为自由贸易港也称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是指一国政府在本国某些主要港口和周围区域设定的封闭地带，实行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而建立的经济特区。但有研究指出，自由港是自由贸易区的一种，并且自由港是自由贸易区最早的一种出现形式（胡凤乔，2016）。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更为广泛，是指为投资者提供离岸区域，提供先进商业基础设施，拥有灵活弹性商业投资，具有吸收力的税收和低投资、低运营成本的商业经济区。显然，自由贸易区还包括保税仓库区、出口加工区、银行自由区等（李莉娜，2014）。更广程度上来看，崔卫杰

^①由于自由贸易港定义与范围还未统一，学者们对全世界自由港的数量判断也存在较大差异。马晓燕（2011）认为，全世界已有近千余个自由港；而刘明笑（2011）则认为，经过近 500 年的发展，全世界类似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特区已经超过 1200 个。

(2017) 指出,自由港是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一种。大多数情况下,国内外学者常常用自由贸易区来囊括各类开放区和特殊经济区。事实上,世界上一些特殊经济区行自由港政策之实,但由于国别语言传统、行政法规措词等习惯不同采纳了多种形式的名称,因此很多文献将自由港与自由贸易区作为同等概念看待。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自由贸易港是指划在一国或地区港口周边、关境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海关管辖的港口或海港区,外国货物可以享受进出口免税政策,并且可以在该港内进行加工、制造、贮藏、分拣、改装、修理、装卸,以至再出口或在港内销售。自由港本质上是实行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大程度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政策的封闭地带或经济特区,通常认为自由港是自由度最大的经济特区,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境内关外”和“进出自由”。但外国船舶进出时仍须遵守有关卫生、安全、移民等政策法规。为避免概念上的不确定导致实践中名称选择的困难,本研究认为自由港应主要用来特指那些附带有港口的实行高度自由化政策的综合化海关特殊监管区。而对虽然行自由港政策之实,但没有港口的、自由化程度不高、且不具综合功能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可用其他名称来表示。^①自由港应是这些海关特殊监管区中开放程度最大的一种。

(二) 自由贸易港的形态与分类

不言而喻,自由港的核心要点在于“自由”两字,主要表现在商品、资金、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通,免除外国货物、资金进出港区的配额限制,准许外国货物在没有海关手续限制和不支付关税的情况下,在港区内进行改装、加工、长期储存、展览和再出口。但自由港因某些特征而表现出差异,具体分类如下:一是按商品免税程度划分,完全自由港对所有商品进出口免税,这种自由港在现实中十分少见;占主导的是有限自由港,仅对少数商品征收少量关税,如香港实施典型的零关税政策,一般进出口货物均无须缴付任何关税,但有 4 类商品除外,分别为烟草、酒类、碳氢油和甲醇。二是按空间范围划分,自由港可分为自由港市和自由港区,前者是指港口及所在城市全部地区均属于自由港范围,外商可在此长期自由居留及从事有关业务,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后者仅包括港口或所在城市的部分封闭区域,不允许外商自由居留,如哥本哈根等。三是按地理位置划分,自由港可分为临海自由港和内陆自由港,前者比较常见,世界上不少著名自由港属于此;瑞士国内的自由港则基本属于后者。四是按功能划分,自由港可分为转口贸

^①常见的符合“自由经济区”概念内涵的相关概念至少有 19 个 (Kusago & Tzannatos, 1998)。其中使用广泛且经常出现在正式法律文本中的包括:自由区、自由贸易园区、自由港、自由贸易港区、对外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边境区、免税/自由工业区、保税仓库区、保税港区、投资促进区等。

易型、工贸结合型、旅游消费型和综合型。转口贸易型自由港功能局限于转口贸易，工贸结合型是在转口贸易基础上增加了加工、制造等工业内容，而综合型自由港在贸易与工业基础上又扩展到金融、旅游等功能。如香港的发展起始于转口贸易，而后过渡到加工贸易型，现在已发展成综合型自由港。旅游消费型自由港主要是为发展旅游产业、购物为目的，一般不允许加工制造活动，以委内瑞拉的马格里塔和哥伦比亚的圣安德烈斯自由港为代表。

（三）现代国际自由港的发展新趋势

自由贸易港是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的产物，如果所有国家都取消关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和边境安全限制，其命运也将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而终结。然而，只要国际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国家海关主权安全顾虑依然存在，自由港就一直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是其功能和形态将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而不断演化。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贸易谈判体制推动下，以全球市场与国际分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得以确立。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加深，自由港的单一贸易功能逐渐难以满足现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需求，出口加工、科技研发、物流分拨、离岸金融、旅游零售、国际教育等现代服务功能逐渐加入到自由港的功能体系之中。自由港发展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全球不同地区产生了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区、对外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工业园区、国际物流中心、离岸金融中心等主体功能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致的不同形态，并且逐渐向综合型自由港形态发展。

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全球化的推动下，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跨边境、跨边界自由贸易区不断出现，甚至跨越国界组成跨国自由贸易区呈现出巨大发展潜力，自由港也呈现出跨区域合作形态。在 WTO 多边谈判机制受挫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通过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实现更深层次的国际经贸合作。

二、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

自由贸易港在各国加强国际经贸关系和发展对外经济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密不可分。

（一）自由港的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自由港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世界海洋经济体系中，作为关键的进出口汇集点，一些具有地理区位优势

的天然港口在被施与政策优惠之后成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港。可见，地理区位优势是许多港口得以被注入优惠政策的原始出发点，世界上许多著名自由港大多是由处于枢纽航线的港口形成，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自由港形成的先决条件。当然，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往往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而显现。

（二）自由港享有很高经济自由度

自由港是在自由区的几种形式中自由度最高、容纳层次最多、内容最为复杂从而要求也最为严格的一种自由区（陈永山等，1988）。首先，自由港具有“境内关外”的政策优势，即“国境之内、关境之外”。货物与服务贸易可免于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实施开放的企业准入制度、保税制度、优惠的税收与产业政策等。其次，自由港税收优惠幅度大。一般商品进出口无须缴付关税，此外，企业还可享受到土地租金、所得税、折旧等方面的政策性减免优惠。最后，自由港具有宽松营商环境。除了对货物进出口给予免税待遇之外，往往还在对外资金流动、企业外汇留存、货币兑换、外汇利润自由汇出及人员往返等方面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三）自由港拥有先进的商业基础设施

纵观世界自由港发展演变历史，某一地区一旦被选定为自由港，国家通常会以国际标准在此区域加大先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投入使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打造最便捷的物流周转方式，提高基础设施质量与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不论是处于沿海还是位于内陆的自由港，除需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外，还具备优良的港口运输与装卸设备，以及有利于快速开展货物储存、分级拣选、改装重组的各种硬件设施，以便快捷和高效地为商品集散与转口提供服务。

（四）自由港经济关系具有国际化特征

自由港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出口国外市场，而非东道国市场。自由港区不分国别和社会制度，对企业和投资者一视同仁，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和贸易往来，是国际经济交汇的地方。自由港往往代表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至高点，是东道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程度的直接体现，是衡量其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实体参照。本质上，自由港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将本国领土资源的一部分权益让渡给他国，借助于国外生产要素以取得经济高效益和高质量发展。

（五）自由港具有综合化功能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自由港的总体发展趋势为向多功能、多方位和综合化形

态转变，即除转口贸易、出口加工等传统基本功能外，还兼具旅游消费、金融保险、人员往来等现代服务经济扩展功能。随着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传统的以转口贸易为单一功能的自由港已经不具备以往的竞争力。自由港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于其综合性及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另外，自由港的综合性还体现于其综合的优惠政策体系，包括免税优惠、外资投资、金融外汇、股利汇出及出入境自由等一些特殊政策与措施，从而保障自由港综合功能的最大发挥。概括来讲，自由港由传统的贸易中转自由向综合经济自由发生转变。

三、自由贸易港的经济效应

（一）促使本国货物与服务生产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自由港是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枢纽，是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重要结点。由于自由港实行更高自由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关税、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其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及吸引外商投资的热土。自由港先进的商业基础设施与高度市场化的环境在为外商进入我国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内企业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架起便捷的桥梁，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二）加快货物资金周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跨国公司及从事贸易的国内企业从境外进口货物免税进入自由港，而且根据全球订单及市场需求，从自由港内向境外目标市场进行分拨。自由港内的分级拣选可以实现买卖双方的交易而无须变更货物的地理位置，收货人便可根据市场信息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分拨运输。国内货物进入自由港即视为出境，不仅可以办理出口退税，还可以通过合同洽谈提前收汇。由于自由港内外汇资金可自由出入，因此国内外企业可以省却大量换汇手续与风险，贸易企业可以方便使用外汇资金进行交易等活动。因此，自由港可以通过加快货物及资金等周转速度实现全球市场资源配置更高效率。

（三）自由港具有很强的腹地经济辐射效应

自由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龙头作用并具有很强的腹地辐射效应。世界自由港发展经验表明：自由港能带动腹地及较远地区的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例如，汉堡港、不莱梅港、鹿特丹港和安特卫普港依托发达的辽阔腹地，是连接欧洲大陆及其与国际市场的重要出海口，以这几个港为中心半径 500 公里以内，人口覆盖超过 1 亿人，自由贸易港的辐射作用几乎触及西欧所有重要城市。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发展也

印证了自由贸易区尤其对周边腹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在自由港背后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组装、物流等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成为周边经济发展的重要创造者。

（四）加速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与演化，发达国家一些产业向外扩张，而自由贸易港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力量。由于发达国家新产业、新工艺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产业转移的技术含量也不断增加，因此自由港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更新换代之中。自由港通过吸引国外资本，弥补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局面，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发展了出口工业，扩大了对外贸易，增加了外汇收入，扩大了就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管理人才，这一切都加速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许多自由港由完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逐渐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过渡。

（五）自由港具有促进劳动就业、增加收入、科技创新等社会效应

一定程度上，创造就业构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原因。据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报告，自由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雇员、年轻女工、农村转移劳动力及中学毕业生等一大批就业前景不佳的群体提供了工作可能。大多数自由贸易区内的薪资及工作环境比东道国其他区域具有一定优势，多数超过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提高了社会低技能职工的社会福利。

吸收外资是自由港成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作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配置布局的节点，自由港通过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引进外资、技术、管理及研发人才等要素，促进国内外生产要素相结合。由于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往往会加大产品与技术的创新活动，从而有利于产生国际研发溢出效应。有些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新型自由港形态——科学产业园更是发挥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领头作用。

四、世界自由贸易港运营与监管模式

自由贸易港能否运行成功与产生成效，除了优惠的政策条件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之外，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外自由港经验表明：高效的运营管理机构不仅是吸引国外投资者的重要标准，而且是自由港成败的关键之一。

（一）世界自由贸易港运营模式

世界上自由港的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政府管理模式，即以法律形式设立政府行政机构作为主体负责管理，如美国和韩国分别设立对外贸易管理局和自由出

口贸易区管理局。这种模式在实际中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公营模式，由行政机构代表国家进行具体运作管理，比较常见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巴西的玛瑙斯自由贸易区就是由通过政府法令成立的自由贸易区管理局统一管理。这种模式往往存在资源浪费、服务质量不佳、经营效率低等问题。二是混业模式，由国家拥有港口土地、岸线及基础设施，同时把港口码头租赁给国内外贸易企业和船运公司进行经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由政府出资建设基础设施，从而摆脱了前期资金投资大、回收期长的制约。同时私营企业可以高效运行。该模式又可称为地主型管理模式，比较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是公司型管理模式。经政府审批成立自由港董事会、理事会或投资公司，对自由贸易港进行运营管理。以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区为代表。在公司型管理模式中私有化程度最高的要数中国香港，其所有港口设施均为私人投资和私人经营。香港的葵涌码头 19 个泊位由和记黄埔、美国海陆、韩国现代和中远 4 家公司掌控。由于很少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实行完全市场自由定价，高效可靠的环境对外资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公司型管理模式由于受到市场失灵效应影响也有不足，诸如追加投资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不注重长远发展等。

（二）世界自由贸易港监管模式

监管问题是各国设立自由贸易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新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亟待解决现实突出问题。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自由港的核心在于“自由”，否则就不是自由港。因此，自由港的监管本质上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的高新运转，自由港的监管应以不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便利为宗旨，采取尽可能简便灵活的方法与手续。目前，国际上自由港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区域监管、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监管便利化措施三个方面。

1. 区域监管：世界各国对自由贸易港一般都实行封闭区域管理。汉堡自由贸易港由一条被称为“关界围墙”的金属栅栏与其他港区隔开，进出自由港区的陆上通道关卡有 25 个，海路通道关卡有 12 个。^① 新加坡的 7 个自贸区都以围墙与外界隔离，进出自贸区的通道由海关查检站管理，进出人员和车辆都必须接受检查。

2. 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自由港区内货物进出口免于一般的海关手续，但为了保障自

^①值得提出的是，与亚洲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热潮正好相反，自由港在欧洲的消失正成为一种趋势。2008 年实行的《现代化欧洲共同体海关法典》使欧盟凭借低关税和内部市场一体化成为了一个整体自由贸易区，单个的自由港已经失去原有意义。自 2013 年开始，由围栏和检查站组成的汉堡港自由贸易区正式终结其 125 年历史。

由港的运行，相应的监管必不可少。在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进出口货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只需填写和交验有关单证即可，但按规定必须得到有关部门批准方可进口的货物，如药品、化妆品和危险品等在报关时须出具批准通知或许可证。在自由港区建立或经营保税仓库，须获得批准并与海关签订合约、交纳保证金。海关对高关税商品和有疑问的商品采用重点抽查方法，通常事先获得一定的线索，如果发现问题可追究相关公司责任，甚至取消其自由港内经营资格。

3. 监管便利化措施：自由港监管便利化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监管便利与监管效率等方面。世界自由港大多实行 24 小时通关服务，货物可在自由港长期停留而无须交纳费用，船舶正常航行很少受到干预。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著名自由港均充分利用网络通讯技术实现手续简化、缩短办事工作周期。新加坡通过贸易网络系统公共数据平台连接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军控、安全、经济发展局、企业发展局、农粮局等 35 个政府部门，进出口贸易有关的申请、申报、审核、许可、管制等全部监管流程均通过该系统进行。

五、目前我国自由港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的对外开放成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深刻注意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营商环境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实施自由港战略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障碍很多都是由于前期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充分所造成，从而对更大幅度的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感到不适。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政府管理制度和理念尚不完全适应高度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从而无法摆脱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惯性冲动。二是行政管理体制尚不适应自由港运营管理要求。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港口运营管理部门与周边地区政府部门、口岸管理机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边检及海事局等）还难以适应完全市场经济的运营。三是多重政府目标影响自由贸易港实施效果。基于不同的诉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影响到自由港的运营效率。比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在具体操作过程，由地方政府制定的负面清单还须征求各部委的意见，因此负面清单的改革效果未充分展现。

（二）技术层面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现有保税港区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与自由港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虽然中国内地港口的吞吐量、基础设施并不比新加坡、中国香港差，但在管理能力、管理体制、效率和国际化服务上还有不少差距。二是海关、检验检疫、出入境边检和海事局等主要口岸管理机构的监管方式、监管水平离国际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三是目前来看，自由港还缺少宏观上的总体方案和规则，以及微观上的具体、精细和透明的操作规章和流程。四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经济主要集中于出口加工制造业，有关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开放经验与管理还很薄弱，人民币资本账户国际化及应对汇率、国际游资炒作等国际金融风险的策略与人才还有很大缺口。

（三）其他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我国整体营商环境还存在不小提升空间。据世界银行营商指数报告，2016 年我国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78 位，比 2015 年上升了两个位次。虽然高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123）、印度（130），但低于南非（74），与俄罗斯（40）差距更大。^① 二是美国特朗普政权对公平贸易的理解与政策实施、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都对我国沿海地区建设国际区域物流中心、金融与贸易中心构成激烈竞争态势。三是区域政治不稳定影响到各国推进国际自由贸易进程的力度，如朝鲜问题、南中国海争议、印度局势等一系列地缘政治对区域国际贸易增长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六、我国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早在 1988 年 6 月，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的伟大构想，这里的“香港”更多意义上指的就是自由贸易港。据统计，我国对外贸易的 90% 都是由远洋运输来完成，港口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桥头堡”。然而，就拿我国对外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保税港区来说，其与真正的自由港还存在很大差距。按国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程度标准，目前我国国内层次最高的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均不能与自由贸易港相提并论。这与我国作为世界货物与服务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仿。

（一）战略思路

1. 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上升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高度。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邓

^① 括号中数字为这些国家在 2016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中的排名。

小平“南巡谈话”的激励下，沿海地区筹建自由港的呼声日渐高涨。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自由港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与探索，许多学者曾呼吁应尽快建设自由港。但现实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和顾虑致使自由港的推进停顿一段时间，导致我国自由港建设有所延缓。造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自由港的战略地位认识还略显不足，未能从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提高经济质量的高度予以重视。

2. 明确制定各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定位与特色。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鼓舞下，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开始筹划自由港的申报与建设。由于政绩及声誉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地方政府可能会参与到自由港的盲目竞争与攀比，容易导致未能根据腹地产业优势、地理区位及港口优势形成错位经营，对自由贸易港的特色功能与定位不明确，从而形成恶性竞争的不良局面。

由于我国港口总体上软实力还较弱，为应对国际自由贸易区的激烈竞争，应从沿海港口中筛选出最具实力和潜力的、离国际性枢纽港最为接近的港口作为我国首批自由港的建设对象，并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综合禀赋选择合适的自由港类型及具体功能与内容。

按我国目前情况，多个自由贸易港将不同程度存在功能同构性，如离岸贸易、离岸金融和物流航运等功能不可或缺。但由于各地在经济产业重点、优势及特点上不尽相同，所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主导产业发展可以有所侧重，因此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发展规划。

3. 发挥制度创新平台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改革经验。由于区域基础与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一条增长极带动下的“点”到“面”雁行推展模式，而在增长极体系中各“特殊经济区”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引领作用。现阶段，我国自由港应兼具扩大出口与地区开发双重功效，并达到牵一发而带全身的效果。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仅要使局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受益，而且通过自由贸易港建设更大程度地加强东部沿海在总体发展及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带动作用，探索更高自由度下开放型经济管理新模式，从而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过程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可复制推广经验，发挥制度创新平台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释放改革活力与增强经济体系的创造力。

（二）对策措施

1. 加强自由贸易港立法。从国际著名自由港实践的成功经验来看，自由贸易港的运行与发展均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法治制度保障，以有效维护国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增强外资进入的信心。如美国制定和修改的《对外贸易区法》从法律上取消了手续繁琐的退税制度和海关监管障碍。欧洲议会通过了《共同海关法典》修订版，进一步简化了

欧盟海关程序及扩大了集中清关范围。韩国议会于 2002 年颁布了《设立和运营经济自由区法》，并随后建立了仁川、釜山、光阳自由贸易区。并且，为把济州岛打造成商贸型国际自由港，韩国政府还颁布了《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

自由贸易港实行许多不同于东道国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尤其是涉及到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因此能否良好稳定发展需要具有相当约束力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国试点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虽然获得全国人大在法律层面上的一定豁免与支持，但与国外成熟自由贸易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为统一协调未来各地区自由贸易港的申报与管理，应尽快出台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自由贸易港法律体系。

2. 大力完善与发展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功能。从世界经济形势与国内发展要求来看，我国自由贸易港在继承转口贸易与加工等传统功能基础上，还应积极推动自由港现代服务贸易功能的发展，增加自由贸易港内生产性服务贸易产业布局，并加快金融创新，积极探索离岸贸易与离岸金融等新型功能，增强自由港金融服务功能。

在新时代，我国的自由港建立除必要的加工制造业之外，物流、金融、免税零售、旅游休闲、资讯、医疗、教育、产权贸易等开放度不高的服务业应为主要产业选择。在自然人流动方面，外国人可在自由港与境外之间直接往返，允许外籍居民长期居住。例如，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先行尝试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允许设立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与外资成立中外合资银行等资本项目内容，从而进一步推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金融改革实现区内资金的自由流动，打造北方金融自由区。

3. 创新运营与监管体制。国外大多数自由贸易区采取的是单一管理模式，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成立某个机构代表国家进行管理。在目前我国政府主导体制下，采取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通过中央权威管理机构的管理有利于政策制定，可以在中央层面全面协调各部委配置改革，对各地区自由港发展重点进行统筹安排，对遇到的政策问题进行统一梳理，获得信息交流、经验共享、共同进步等协同效果。同时，对自由贸易港的具体管理权限应下放给地方，由地方所属的专门机构进行处理，有权对外直接谈判、吸引外资、出租土地等，地方政府有权颁布与法令精神一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等。

由于港口建设及相关工程资本投入巨大，自由港基础设施可通过公私合作（PPP）形式吸收民营资本，或引进外资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对港口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并让渡一部分经营管理权。在具体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并在市场成熟时逐步过渡到企业主导运营模式。

推行贸易监管方式转变，由“事前监管”向“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转变。建立

企业诚信信息系统及评价框架，对企业经营诚信记录良好的企业实行更大的优惠激励，并严惩不守法的企业，取消其在自由港的经营权。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原则，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系统，按国际标准简化报关通关手续，加强货物种类识别，探索基于“舱单数据”的高效监管。

参考文献：

1. 陈永山、汪慕恒、郭哲民等：《世界各地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2. 崔卫杰：《正确认识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方向》，《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7 年第 6 期。
3. 胡凤乔：《世界自由港演化与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6 年。
4. 黄汉生：《世界自由港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特点》，《南洋问题研究》1992 年第 4 期。
5. 黄志勇、李京文：《实施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12 年第 5 期。
6. 李金珊、胡凤乔：《国际关系体系下欧洲关税制度的变迁与自由港功能形态的演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7. 刘恩专：《论天津建立自由港的方案与政策》，《南开经济研究》1994 年第 6 期。
8. 马晓燕：《内陆自由港发展模式研究——重庆例证》，《改革与战略》2011 年第 1 期。
9. 孟广文：《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基础及模式选择》，《地理科学》2015 年第 1 期。
1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自由港政策比较及借鉴研究》，《科学发展》2014 年第 9 期。
11. 杨爽、孟广文、陈会珠等：《韩国自由经济区发展演化过程及启示》，《经济地理》2015 年第 3 期。
12. 周启元：《关于世界自由经济区问题的研究》，《东北亚论坛》1992 年第 1 期。
13. Kusago T, Tzannatos Z.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 review in need of update*. Social Protection & Labor Policy & Technical Notes, 1998, 35 (9): 828~849.

责任编辑：谷 岳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 政策、问题与对策

吴维海

摘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城市是我国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体。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研究落实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倡导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架构、理论及实施路径，持续提升地方创建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质量与效率，健全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促进社会信用整体水平提升和对外开放，是行业智库和专家学者应该跟踪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重点探索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对策，提出了建设世界新型信用组织（WCO）和“信用全球”等前瞻性倡议。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 示范城市 信用强国 信用全球

作者简介：吴维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源。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大踏步进入小康社会，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探索完善我国社会信用实践，参与和引领全球信用体系与国际信用标准建设，打造开放、诚信、包容、共享的国家、政府、城市和企业形象，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国际化为先导，增进全球共识，凝聚更多力量和国际

资源，拓展全球市场和各国之间的深度合作，赢得世界各国认可、信赖和相互尊重，确保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是国家部委、智库学者和地方政府需前瞻布局和有序推动的重大课题。规范、引导和推动地方政府创建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架构，建设“信用强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远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和积极推动的战略性部署。

一、理论阐述

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设“信用强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①

（一）古典经济学理论^②

古典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源头。从 17 世纪开始，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逐步提升，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更加频繁。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多关注狭义的信用概念。那时候出现了银行信用，民商法逐步有了“债”的概念，信用通常指“信贷”或“借贷”。到了 19 世纪时期，经济学界对“信用”的研究不断增加。熊彼特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到，“将信用定义为‘信任’的提法，尽管贴近生活，但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则不严格”。亚当·斯密着重于信用和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的研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经济活动建立在社会习惯和道德的基础上。如果离开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将受到重大影响，将动摇交易基础。他认为人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经纪人”，存在利己的趋势；同时又是道德人，存在同情心、守信、利他等特征。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是一个自由的过程，人们应该遵从公平、信用的原则，以信用为基础，与他人开展相应的经济交往，并实现获利。如果普遍存在商业欺诈，将对本人和他人都不利。

古典学派习惯于采用公债理论分析和看待信用问题。休谟的观点是，如果过多发行公债将丧失社会信用。斯密的观点是，发债初期需要依赖信用，而信用通常由银行予以担保。如果失信，政府必须用特别资源抵押才能发债，通常可以用国家的特定收入进行债务偿还的担保。李嘉图提出，可以建立偿债基金，从政府公共收入超过公共支出的部分获得资金来源，从而保证政府信用。

^①赵东明：《诚信建设理论基础、现实要求和实践途径》，人民论坛网，2015 年 10 月 11 日。

^②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征信网，2012 年 1 月 10 日。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信用的理论^①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信用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与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货币经济矛盾发展的产物，是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的运动形式。^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信用是建立在彼此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交易基础和规则制度。

（三）契约经济学理论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现代契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认为，信用是一种契约关系，它存在契约关系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每个经济主体都遵守信用契约关系，社会就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经济社会实际看，经济主体一般会从自身的成本效益考虑信用契约关系，进而选择自己的守信行为。从预期效果看，如果守信是最优选择，将减少社会的非对称信息，契约签订与执行成本就低，社会效率就高。如果失信是最优选择，参与者就选择隐瞒真实信息，就会加重社会非对称问题，从而提高契约签订与履行的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率（哈特，1998）。

（四）信用经济学理论^③

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是“信用经济学”。信用经济学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信用工具的研制、投放和流通理论，以及信用信息对市场交易的影响等方面。

信用投放和流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货币本质就是信用，向市场投放信贷将影响对国民收入和物价等的预测。德国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布兰德（Bruno Hildbrand，1812—1878年）根据交易方式，将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物易物为主的自然经济时期，二是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经济时期，三是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时期。瑞典经济学家克尼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年）提出和发展了“纯现金经济”“简单的信用经济”“有组织的信用经济”“纯信用经济”等概念。^④

（五）博弈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

博弈论为经济学在信用理论研究提供了依据。“囚徒困境”理论对于研究信用问题很有借鉴价值。按照囚徒理论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行为主体之间单纯开展

①邓宏伟：《基于信用链的建筑市场信用研究》，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06年。

②韩冰：《信用制度演进的经济分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征信》2012年第1期。

④孙磊：《信用体系演化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一次性交易的囚徒困境游戏并不会导致合作结果的出现，这是由于背叛构成市场交易游戏双方的纳什均衡。如果市场行为主体之间进行了多次重复交易，可能导致游戏双方产生合作的结果。通过信用建设可以逐步解决囚徒困境：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博弈主体之间受声誉、互惠等自发的合作机制驱动，将增强守信的可能性。

信息不对称理论重点研究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分布给市场交易行为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市场运行效率问题，并且分析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规范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各级政府正在推动的征信体系建设可能让潜在的授信人了解受信人的信用历史，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成本，降低逆向选择的概率。同时，使交易双方的一次博弈变成受信人与社会在未来的重复博弈，减轻授信后对对方的监督成本，约束了受信人获得信用机会后的失信冲动，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信息不完全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依托经济、法律、科技等手段持续改善。

（六）我国儒学的诚信理论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诚信是儒家的做事准则，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是重要的道德约束，^① 儒家倡导守信。《孟子》提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儒家把经济关系看作道德关系的表现和延伸，倡导商业领域的诚信规范，强调遵守道德规范，强调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提倡利他、诚信和礼让，反对利己、侵争和分化，鼓励沟通情感，协调复杂的利益，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政策演进

（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阶段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粗放到精细，逐步深化提升的政策演进和变化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信用的概念。《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提出了社会信用的问题。1991 年原国务院生产办组织清理企业“三角债”和“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目的是解决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和失信现象（这就是初期的社会信用问题）。随后，社会信用逐步被纳入各级政

^①吴维海、张晓丽：《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府、金融行业和企业经营的重要范畴。

归纳分析，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约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①

一是起步阶段，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了从事企业发债和融资担保等评级的信用中介机构。信用意识逐渐被政府、企业、银行和投资者等接受。银行探索试行贷款风险分类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初步建立健全贷款证管理制度。国内出现了专业担保、信用调查、讨债追债等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各级政府开始探索企业信用和业绩评价，银行实施了贷款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试点。

二是发展阶段，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信用担保中介机构进入了加快发展阶段。原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开始在济南、镇江、铜陵、深圳、重庆等地实施改革试点，各地出现了一些国有或民营的信用担保机构，主要为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等服务。

三是完善阶段，大约在 21 世纪初期。^② 政府主导建立信用信息披露系统，社会上出现了信用联合组织。上海、北京、广东等开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2001 年开始，国家部委联合下发信用管理指导意见，国务院起草企业和个人征信立法与实施方案，国家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全国信用担保机构调查，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开始全国跨省市联网，工商、税务等领域启动了信用体系建设。国内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业务快速设立，国外的邓白氏、惠誉、科法斯等信用机构进入我国。

四是推进阶段，大约在 2014—2016 年。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建设规划纲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民银行实施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各级政府、各行业全面启动“信用中国”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五是创新阶段，大约从 2016 年开始。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国家部委和各级政府全面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信用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办法逐步完善，行业性、区域性信用信息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各地推出了行业监管和黑名单等制度。各地区、各部门的信用孤岛、资源重复投入、国内实践与国际信用标准脱钩等问题引起了有关部委的重视。2017 年笔者撰写并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著作中，提出了树立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立足中国特色，主动融入全球治

^①吴维海：《政府融资 50 种模式及操作案例》，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吴维海、张晓丽：《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理和“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信用强国”，^① 倡议和推动“信用全球”建设的新思路、新倡议，并提出建立 WCO，即设立“世界新型信用组织”，积极推动国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体化、融合化和标准化，探索国际信用体系的融合化、高端化和开放化，增进国内信用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引导并逐步构建全球信用标准的融合化和均等化，为我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目标而提供国际信用支撑。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环境

我国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守信氛围。争创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认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为新时代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指明了新方向。主要表现在：

1.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②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增强社会成员诚信意识，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提升地方经济社会秩序、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降低市场参与要素的交易成本、防范经济风险的基础保障，也是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为尽快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地方政府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环境，推动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方向转变，加快实施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电子支付为支撑的重大转变。十八大强调“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各地区积极参与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大力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③ 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包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这也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

①吴维海：《中国有责任引领“信用全球”》，中宏网，2017 年 8 月 22 日。

②黄庭满：《习近平网络空间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③《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新华网，2013 年 11 月。

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实践创新。

201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政务诚信、个人诚信体系和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上述文件提出了弘扬诚信文化，建立诚信记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各地区以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为突破口，全面建设个人诚信记录，强化奖惩。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失信行为的惩处，着重处理危害群众利益、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政务失信行为。同时，强化信用监管，营造诚实守信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倡导儒学思想和诚信价值观。要求各级党组织完善规章制度，规范党组织和党员政治纪律，强化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信用管理、监督，丰富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参与和引导作用。

为推动我国农村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201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三农融资担保体系。完善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农村金融风险”。^① 这为我国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2. 国务院、国家部委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系列政策文件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指示，深入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公布《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章和标准。2002年住建部《关于加快建立建筑市场有关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信用档案的通知》提出，加快建立建筑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2007年商务部制定了《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大力推进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2014年，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基本建成，信用监管体制基本健全，信用服务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全面发挥作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2017年2月5日。

设取得明显进展，市场和社会满意度大幅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普遍增强，经济社会发展信用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社会秩序显著好转”。^①《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等文件，提出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2015年，《中国保险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保险业信用制度体系、信用评价基本规则 and 标准体系基本建立。

为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任务分工》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2016）》，提出“开展地方信用建设综合示范。推动示范地区率先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向社会有序开放。推动示范地区各部门在开展经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强化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并作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必备要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组织国家级社会信用示范城市的申报和验收。原则同意沈阳、青岛、南京、无锡、宿迁、杭州、温州、义乌、合肥、芜湖等11个城市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②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牵头，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单位联合发布《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范围、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确立了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类法人由多码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转换，为各地建立社会信用惩戒机制和规范信用管理指明了方向。

为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健全激励惩戒机制，不断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为我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3. 地方政府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试点

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

^①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4年。

^②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沈阳等11个城市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复函》，发改财金〔2015〕1667号。

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2017 年和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民银行加大了创建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试点的评审工作，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推动全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不断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做好信用信息公开，扶持或组织行业信用评价，加大信用分类监管，努力提升社会信用公开程度和诚信水平。各省市、各地区建立综合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全国信用信息整合和实际应用，社会信用市场规模显著扩大。

在创建国家级或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试点工程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政府和市场“双线推动”或“双轮驱动”的格局。各级政府积极发挥本地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提高重大决策的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探索实施政务诚信示范，推动社会诚信建设；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强化信用激励约束机制。2016 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建立年报抽查工作机制，完善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失信公开披露功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结合各自职责，丰富和发展了政府信用、金融信用、行业信用和商业信用等体系化建设，以及黑名单公开制度，实行了联合惩戒。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我国经济目标 and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更高要求相比，差距很大，问题不少。需要继续研究和持续改进。

总结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①②}

（一）社会信用体系仍不完善^③

近些年，我国吸收借鉴西方信用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坚强领导下，国家部委、各级政府、金融系统、公安系统等结合各自实际，探索并实施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步骤、新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不容否认，我国地方的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信贷、纳税、诈骗、违章记录等显性记载和静态信

①吴维海、张晓丽：《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安秀环、刘长垠、刘春侠：《完善水利行业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思考》，《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5 年第 7 期。

③马骏：《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研究——以合肥市为例》，《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息上，对于机构、企业和个人等详细信息记载不全、信息更新不及时、跨部门的信息数据割裂。多数信用资料以纸质化为主，电子化记录和电子化保存比例偏低，数据搜集、整理、提炼和开发不足，使用效率低。各部门、各行业征信信息覆盖面窄，纵深开发不够。各类信息数据分散，信用系统无法共享，行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战，信息孤岛和互设壁垒现象突出存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不完善，跨部委、跨行业缺少社会信用体系的互补、整合和互相促进。

（二）社会信用激励惩戒机制不健全

目前，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等缺少详细的社会信用奖励与惩戒机制，现有管理考核制度、办法已经过时，需要较大幅度地调整、补充，总体上还没有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从操作层面看，各个机构、各层面没有形成各个领域社会成员详细的信用记录和运行机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严谨，各领域守信激励政策和手段较少，操作不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失信成本低，导致了全社会信用水平偏低。

（三）社会信用投入和服务水平偏低

从国家和各省市、各城市的资金投向看，政府和城市决策者宁愿将资金投入到工厂制造、道路维修等基础设施项目，也不愿意把资金和资源投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这既说明了相当一批政府高层和部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认识不够，战略意识不强；同时，也不利于高质量地完善社会信用基础设施，不利于增加信用管理和服务人员，不利于引进专业能力强的社会信用建设与管理团队，容易造成一手硬（工程和项目投资热情高）、一手软（社会信用建设投资严重不足）的局面，导致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和专业人员严重不足、信用服务市场不发达、服务运行机制滞后、信用服务行业不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公信力不足、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缺失等问题。

（四）社会诚信环境和守信自觉性不高

从全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暴露出的问题看，一些地方政府和城市存在社会诚信意识差，社会信用水平不高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履约践诺、诚实守信氛围不浓，造成了投资机构不敢投资，企业贸易和业务缺少诚信，个人之间缺少信任，区域信用环境不好，各个领域的守信程度低，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同时，社会公众缺乏使用信用信息产品的意识，信用产品需求有限，产品市场难以在短期内形成。

（五）失信行为和欺诈事件屡有发生^①

从全国来看，由于各层面的信用度总体不高，经济社会领域经常出现由于没有执行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等监管流程，弄虚作假而导致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危及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各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虚报冒领等现象或违法违规行时有发生。一些地区和城市政务诚信度、司法公信度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不小的差距，如电信诈骗、虚拟货币庞氏骗局、山东冠县辱母案等，大多是商业失信导致的恶性特重大事故或事件。

（六）社会信用体系架构和实施路径不清晰

尽管各地都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等实践活动。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晚，实践经验少，国内理论研究不多，可参考的案例少，整体看，国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架构和实施路径仍然模糊，处于浅层次、零散化和局部化状态，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四、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合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社会 2020 年、2035 年和 2050 年“三个阶段”目标的重大部署，在对北京、山东、河北等省市信用调研和案例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以创建省级或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支撑，发起设立 WCO、世界信用联盟（WSA），全面建设“信用强国”，倡导共建“信用全球”的对策与建议。

（一）探索并构建示范城市的总体框架

研究全球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趋势，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民银行联合开展的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驱动，总结提炼各地区实践经验，策划地方政府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并构建国家级（或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一般架构。

1. 总体架构

创建国家级（或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总体架构，主要包括社会信用组织保障和社会信用制度保障两大类。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重点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全社会、全方位、全过程

^①杨家钢：《中部六省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隧道行为”实证研究》，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的社会诚信体系和运行机制构建等主要内容。^① 其中，社会信用组织保障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完善组织领导、出台优惠政策、推动创新示范等工作内容；社会信用制度保障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奖惩机制、信用标准体系、完善运行机制等工作内容。

从信用实践操作来看，我国各地区、各城市应该健全完善本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大力推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等重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地方政府和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系统性、前瞻性和严肃性。

从行业分类看，上述重点建设领域又可以分为更加细致、可操作的领域和具体工作。如：政务诚信建设需要推动依法行政、探索政府诚信示范、完善政府诚信机制和强化公务员诚信教育考核等，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工作细则和具体行动计划进行任务目标的分解。在司法诚信建设方面，可以重点推动法院公信、检察院公信、公共安全领域公信、司法公正和从业人员信用，以及司法公信的制度建设等工作，并且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和考核监督机制，逐步分解和组织实施。

2. 三层次的实践架构

进一步研究和构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可以按照逻辑层、基础层和应用层进行社会信用体系的网络建设和组织实施。具体架构设计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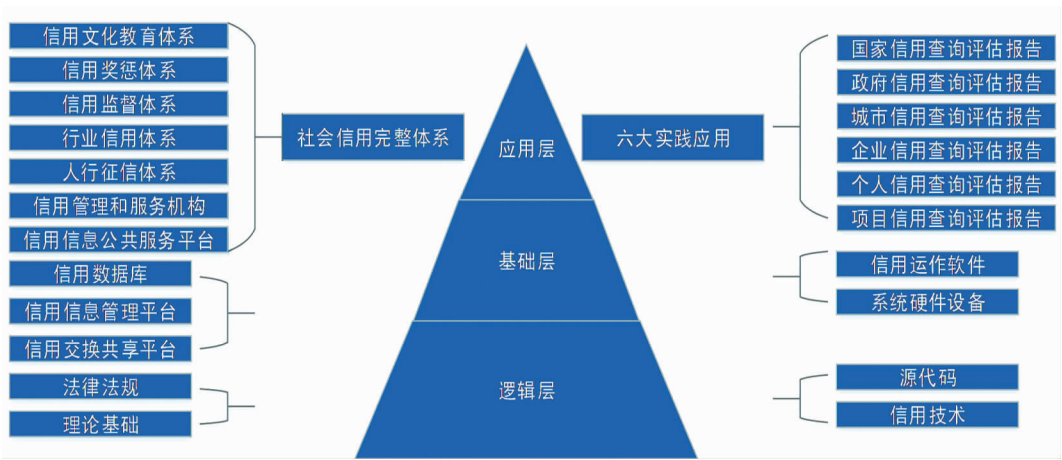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层次架构

由上图可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逻辑层，由源代码、信用技术等支撑，包括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法规；基础层由信用运作软件和系统硬件设备等构成，并包含了信用交换共享平台、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信用数据库等；应用层由国家信用查询评估、政府

^①吴维海：《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信用查询评估、城市信用查询评估、企业信用查询评估、个人信用查询评估和项目信用查询评估等构成；同时，需要完善人行征信体系、行业信用体系、信用监督体系和信用奖惩体系。

（1）逻辑层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也要有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的源代码、信用技术等逻辑支撑等，这就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路线图的逻辑层。

信用历史渊源和理论。中国古代诚信理论：孔子把“信”与“恭”“宽”“敏”“惠”并列为五德之首；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之道”等等。同时，还有古典经济学理论、信用供给机制、信用经济学、博弈论以及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等。

国家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相应出台政策全力支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各省也颁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等政府规章和文件。

信用技术。信息技术是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它主要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来设计、开发、安装和实施信息系统及应用软件。它也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主要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

（2）基础层

构建数据库、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信用交换共享平台，以及信用系统运行软件和硬件设备等，这就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层。

各地政府为推动全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与应用，积极投入到信用体系建设中来。目前全国各省区市均已建成了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应用系统，实现法人、个人信用信息关联和深度应用服务。平台应用于政务、商务、社会 and 司法公信建设领域，其他地区和领域也在加快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3）应用层

通过构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信用文化和教育体系、信用奖惩制度、行业信用体系和信用管理服务机构，为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国家信用、政府信用、城市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和项目信用等查询评估报告，实现社会信用的经济发展和社交保障、指导与风险预警等基本功能。

上述三个层面的技术、硬件和应用的组合与逻辑关系，构成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和框架。

（二）建立健全信用组织领导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贯彻党的十九大重要部署，需要做好如下工作：

1. 强化党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引领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核心示范和引领作用。健全完善以各级党委、党支部等主要领导支持、参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强化党组织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引导和督导，确保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将社会信用建设工作纳入主要领导和部门的责任分工、业绩考核，与地方经济发展、廉政建设同部署、同考核。

2.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和诚信道德纪律教育

强化各级党员干部、政府管理者的诚信意识和诚信执政培训，统一思想认识。通过政策学习、信用专题培训和法制教育，增强全体党员、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意识，提高党组织、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决策者对信用工作的重视程度，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提高本地区、本城市、本企业形象和城市品牌的核心工作来抓。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和社会工作者的信用引导与政策教育，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建社会信用示范城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党内规则和社会氛围。

3. 完善各级组织领导与运行体系

完善创建国家级或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组织体系。成立工作推动小组和创建办公室。成立以书记或市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和创建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日常工作执行小组，根据职责和工作需要，制定具体的落实方案。各部门、各类企业、各类社会组织等成立相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小组，明确部门或人员负责本单位信用体系建设和相关信息输入、分析等工作，实现党、政、企、学、研等五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共建共享机制，加强跨部门的工作衔接，定期部署和自我检查、完善，确保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全面落实。

（三）提高信用要素投入和能力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整合和资金支持，需要各方面的精力投入和各方参与，需要各类信用信息的共建共享和规范化的商业运行。

1. 加大资源与要素投入

强化资金资源投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部委有关社会信用建设重要部署，立足地区优势和需求，完善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强化本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土地和技术要素投入、专业人才培养和投入，探索采用政府购买服务（PPP）等融资模式，强化重大项目融资，推动开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项目和配套服务平台。出台优惠产业政策，引进和推动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到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完善本地区的社会信用产业价值链，增强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评估和自我修正的能力。强化人才支持，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配备上，增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人员或部门，增加需要的土地和办公场所等配备，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政策支持。

2. 以规划方案引领推进重点工程

制定社会信用建设行动计划。深化行政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研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申请政府资金支持等领域的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使用，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推动并建立全市信用联动工作机制，选择金融企业进行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创新示范。

实施社会信用建设示范工程。实施重点企业或个人示范工程，选择和建设部分示范乡镇或街道、示范企业、示范村和示范农户，积极推动这些示范乡镇和村庄率先对所辖信用信息整合，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向社会有序开放。推动示范单位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自觉性。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中国”网站作用，做好信用信息数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联合惩戒信息等“三个公示”，开展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和部委信用周、信用承诺、热点聚焦等“三个活动”。加强个人、政务、电商、中小企业和农村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发挥人民银行等社会征信机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征信市场，鼓励民间资本等进入征信业，强化信用信息服务与产品的应用，弘扬和培养守信示范单位和诚信典型城市、典型企业。

3. 优化信用管理和应用流程

研究国内外信用实践经验，结合国家和部委政策文件，规范和优化本地区跨部门信用管理流程和社会信用操作规则，提高信用行业管理与服务水平，逐步构建适合现代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和操作办法，减少跨部门的重复劳动、相互扯皮、数据割裂或信息孤岛等现象。

（四）推动重点领域信用建设

1. 强化重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

以政府信用建设为起点，逐步推进企业诚信、公民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政府诚信建设重点清理不作为、乱作为和庸俗、懒惰、散漫现象，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等政府诚信体系建设。企业诚信建设以市场为突破口，推进企业信贷、纳税、合同、质量、价格、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诚信体系建设。公民诚信建设以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为重点方式，全面推进政风、行风评议活动。

2. 推动示范试点和全民守信

引导各地区创建省级或国家级示范城市，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探索诚信社区、诚信单位、诚信家庭等创建活动，发挥各级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守信自律。以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为主体，通过依法整理、搜集和分析个人信用资料，为社会和目标客户提供个人信用证明材料，帮助客户判断和控制信用风险，提高全民信用意识和守信自觉性。

（五）强化社会信用考核激励

1. 完善奖惩考核与业绩挂钩

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级，完善社会信用评价标准和操作办法。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适当奖励守信者，严格惩戒失信者，及时处罚违法违规行为，弘扬守信的典型机构和个人。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社会公众的个人信用管理

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将社会公众和一般个人的信用评估体系与个人身份证信息数据库紧密衔接。个人违背了社会制定的个人信用规章制度的纪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记录在个人身份证信息查询系统内，达到规定年限后方可撤消，形成法规震慑与行为约束。

3. 完善信用监督评估机制

研究推动行政许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研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申请政府资金支持、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组织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进行评估，纳入政府各部门业绩考核。对于企业或个人失信的，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信用信息侵权责任追究机制，制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投诉办理、诉讼管理制度及操作细则，落实失信经济、行政或刑事处罚，形成全社会守信的良好氛围。加大对国家部委、人民银行等国家管理部门的

交流和沟通，尽快达到国家级社会信用示范城市的建设标准。

（六）倡导 WCO 并推动建设“信用全球”

1. 设立 WCO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国际标准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这就需要在信用建设领域构建国际统一、公认的信用标准，实施信用一体化。为此，笔者提出了倡议设立 WCO，即世界新型信用组织，以中国建设信用强国的基础，推进“信用全球”体系的建设。

2. 构建“信用全球”“三步走”新架构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更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中国行动。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全球经济振兴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承担了“三位一体”的角色。习总书记提出，“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这为我国建设信用强国，引领“信用全球”指明了方向。

构建“信用强国”到“信用全球”，可以实施“三步走”战略。

第一阶段，引导推动阶段。通过提升国家信用水平，构建信用强国战略，引导信用全球建设的共识共议，积累我国的信用建设经验，将其推广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美国家。引导、构建全球信用协调组织、信用规范标准、信用运行机制、信用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信用考核管理办法。

第二个阶段，聚集提升阶段。通过引导和构建各类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全球信用组织领导体系、运行合作和信用共享平台，形成资源与人才集聚、运转高效的全球信用运行体系和共享平台。

第三阶段，融合共建阶段。通过建设全球统筹的信用标准和信用平台，推动和提升各国、城市、机构等信息开放共享。初步建成信用全球的目标。

通过三步走战略，基本建成“信用全球”的架构和运行体系。

3. 构建引领信用全球的五大新规则

措施之一：传承与借鉴相结合。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中国倡导的“全球信用”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

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建立世界信用评级组织。

措施之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包含信用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以信用重构为目标，创新机制和规则，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包括信用评估和规则利用）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措施之三：推动建立世界信用评级组织。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通过构建代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及人民利益的社会信用组织、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公共服务平台，有助于尽快形成全球和平、公正、均衡发展的经济新秩序、运行新机制、信用新规则。

措施之四：重塑国际信用规则。以重塑全球社会信用评估机构和服务架构为目标，扶持和优先推动我国社会信用评估中介组织，联合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打造公平、开放、包容、竞争的国际信用评价组织机构，构建纠纷解决的机制，重建国际信用新秩序。

措施之五：典型示范，全球推广。构建信用强国和信用全球，事关我国各个领域，影响到全球各国和各行各业。国情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法律体系和经济发展进程不同。要因地制宜，加强沟通，试点先行。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化需求，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示范试点，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在我国和部分国家共同推动下，通过金砖会晤机制、上合组织、中非论坛等平台 and 对话机制，达成共识，先行先试。通过摸索经验，加强各个国家、不同对话机制之间的深层交流，完善国际信用组织的建设和机制的设立，逐步总结经验，积累案例，完善平台，在发展基础相类似、文化理念相近、沟通机制良好的国家或对话平台先期进行推广，逐步从点到面，到网络化，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全球信用建设体系和运行机制。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依托国际合作机构，整合各国资源，建立健全国际信用组织，发动各国参与和互动，与全球发展的趋势和阶段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沿线各国良好的信用环境，需要构建国家政治互信、诚信的商业环境，需要深化各国金融信用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沿线国家的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和促进“信用全球”的广泛共识和各国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2014 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任务分工》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2016）》。
3. 郑君：《中国模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创新与挑战》，《中国金融》2015 年第 4 期。
4. 曹雅廷：《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公共信息与征信系统》，《征信》2015 年第 2 期。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6. 韩冰：《信用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分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7. 吴维海：《大国信用——全球视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年版。
8. 吴维海：《“大国信用”建设路径有待创新》，《中国民商》2017 年第 6 期。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沈阳等 11 个城市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复函》，发改财金〔2015〕1667 号。
10. 吴维海：《信用强国和信用全球的倡导者》，搜狐网，2017 年 5 月 20 日。
11. 吴维海：《中国有责任引领“信用全球”》，中宏网，2017 年 8 月 22 日。
12. 吴维海：《社会信用与企业信用建设及效用研究》，搜狐财经网，2017 年 6 月 21 日。
13. 吴维海：《设 WCO，构建信用全球》，搜狐网，2017 年 8 月 20 日。
14. 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征信》2012 年第 1 期。
15. 孙磊：《信用体系演化的经济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16. 赵东明：《诚信建设理论基础、现实要求和实践途径》，人民论坛网，2015 年 10 月 11 日。
17. 黄庭满：《习近平网络空间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18. 安秀环、刘长垠、刘春侠：《完善水利行业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思考》，《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5 年第 7 期。
19. 邓宏伟：《基于信用链的建筑市场信用研究》，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20. 杨家钢：《中部六省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隧道行为”实证研究》，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责任编辑：谷 岳

· 产业 发展 ·

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 数字化转型及创新

杜振华

摘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印度作为软件业发展的领先国家之一，通过软件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员工培训的技能重塑、新地域新领域的开拓创新，以及孵化器和加速器对初创企业的扶助，从而继续保持和坚守其软件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也为印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快发展打下雄厚的基础。中国作为软件大国，从印度的发展获得经验启示是中国软件产业提升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软件业 信息服务业 技能重塑 数字化转型

作者简介：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任。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它冲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发展的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跃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直奔新经济的核心软件业，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时，印度的软件产业也没停下脚步，创新和数字转型成为主题。这也使其牢牢坚守着软件强国的优势。

一、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一）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仍居世界前列

据印度通信部数据显示，印度当前软件业价值占全球软件业价值 4110 亿美元的 1/3

以上。目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业务流程管理（BPM）基地，是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最大的国家。2017 财年，印度服务外包大约占世界外包市场 1730 亿~1780 亿美元的 55%，在提供信息技术（IT）服务方面的竞争力突出，成本约比美国便宜 3~4 倍。根据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NASSCOM）的数据显示，2017 财年，印度软件总收入达到 298 亿美元，以超过 8% 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在软件出口方面的就业人数达 120 万人，BPM 软件服务外包占全球外包市场的 37%。5 年来，其软件收入增长 1.7 倍，专注于数据分析的新企业数量 400 个。2017 财年，其新增收入 110 亿美元，在过去 5 年中业绩持续增长超过 60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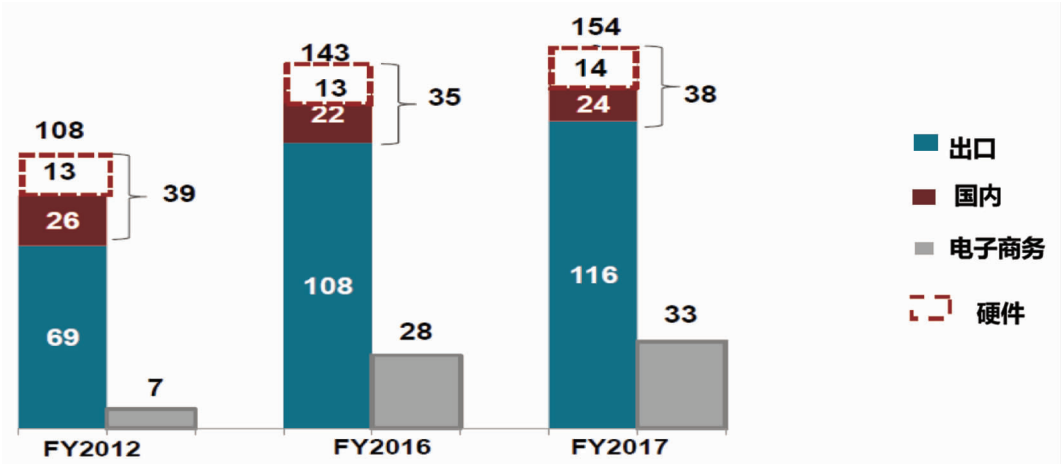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17 财年印度 IT-BPM 收入构成（单位：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NASSCOM。

注：FY 为财年，印度财年的起讫时间是上年的 4 月 1 日至当年的 3 月 31 日。

2017 财年，印度 IT-BPM 总收入（包括电子商务）增长 8%，达 1540 亿美元（按固定汇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7.7%；IT-BPM 出口达到 1160 亿美元（图 1），同比增长 8.6%；企业研发收入超过 290 亿美元，数字收入占产业收入 14%；国内包括硬件收入在内的 IT-BPM 收入同比增长 8.5%，达到 380 亿美元。从结构上看，2017 财年，在印度 IT 市场中，IT 服务收入 800 亿美元，BPM 为 290 亿美元，软件产品与工程服务为 290 亿美元，硬件 140 亿美元（图 2）。

统计数据表明，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部门相比，2014 财年到 2017 财年雇佣人数保持净增长，IT-BPM 直接创造 55 万~60 万个工作岗位。高价值工作机会为训练有素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对就业的持续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NASSCOM 预计，2025 年印度 IT 公司的收入将上升到 3500 亿美元，增加 250 万~300 万就业岗位。

(二) IT-BPM 出口具有较强的增长态势

印度 IT-BPM 主要包括服务与软件产品。服务由 IT 服务、BPM、工程研发和产品开发构成；软件产品主要包括系统软件、企业应用软件和垂直应用软件。2017 财年，印度软件业出口收入中，IT 服务出口达 660 亿美元，占比 54.4%；BPM 为 260 亿美元，占比 22.2%；软件产品与工程服务为 250 亿美元，占比 21.4%（图 3）。从 2009 财年到 2017 财年，其出口收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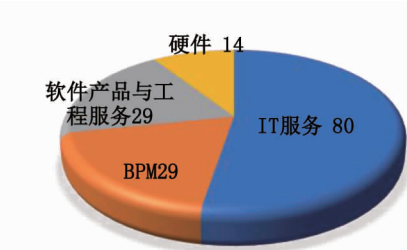


图 2 印度 2017 财年 IT 市场分布（1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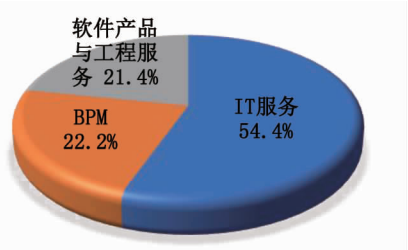


图 3 印度 2017 财年出口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IT&ITeS. <https://www.ibef.org/exports/electronic-and-computer-software-industry-in-india.aspx>。

2017 财年，印度 IT-BPM 行业员工以 4.7% 的速度增长，增加员工 4.9 万名。行业员工总数 370 万人，是最大的雇主。零售、医疗和旅行、运输是印度 IT-BPM 产业增长的关键领域。预计到 2018 财年，印度 IT-BPM 出口收入增长 7%~8%，届时收入将达到 1240 亿~1250 亿美元。

在汇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2017 财年印度 BPM 的净利润增长除第四季度为 7.2% 外，其他各季度都呈两位数增长，最高为第三季度的 11.2%（图 4）。新兴行业（如医疗保健）、数据分析和高价值服务都对利润增长做出了贡献。第四季度净利润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投资于技术驱动的创新，以提供差异化的客户体验和改善未来的增长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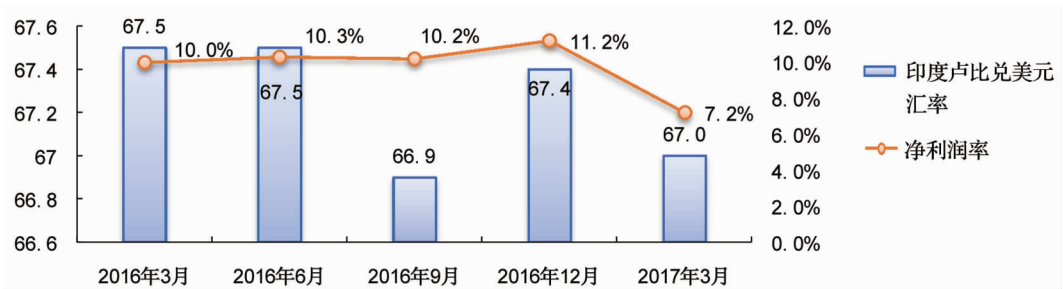


图 4 2017 财年印度 BPM 净利润增长率

资料来源：NASSCOM。

印度软件收入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一是数字收入成为主流。新的商务模式聚焦于技能需求，对于产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新市场的扩张。在欧洲、日本、中国和非洲等新的市场上，通过收购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高了数字能力和咨询技能，拓展了应用领域。

二、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数字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

当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是通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来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策略。产业和 IT 管理者正致力于构建灵活的基础设施，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人力资源需求。考虑到云计算的灵活性，云计算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基础设施。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智能自动化驱动大部分产业转向数字化。

1. 来自数字方面的收入增加

数字经济广泛渗透到其他经济领域，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重塑世界经济格局。2016 年，世界平均来自数字服务的收入为 25%，印度 IT-BPM 来自数字服务的收入为 16%，美洲则为 63%，亚太地区（APAC）为 13%，来自欧洲、中东、非洲三地区（EMEA）为 22%（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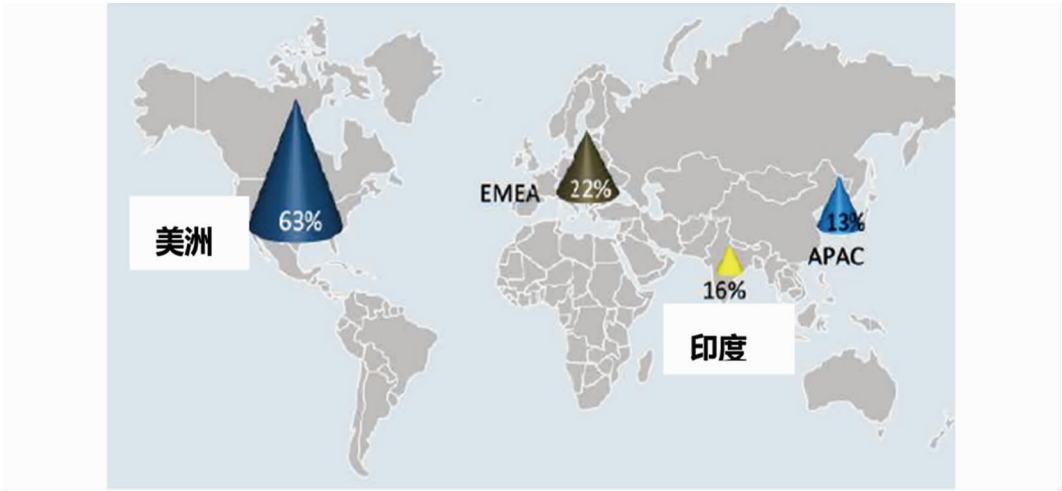


图 5 2016 年全球软件供给者的数字收入热点图

资料来源：NASSCOM。

注：EMEA 为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的字母缩写，为欧洲、中东、非洲三地区的合称；APAC 为 Asia Pacific，即亚太地区。

正如印度曾经是全球的软件中心一样，印度现在正雄心勃勃地欲成为全球的数字技能中心。目前，其 72% 的员工在全球外包市场中提供数字服务，接近 50% 的雇员在全球外包中从事分析工作。2017 财年，NASSCOM 客户服务收入中，来自数字客户体验的占比最大，达 24%；其次是机器人自动化，占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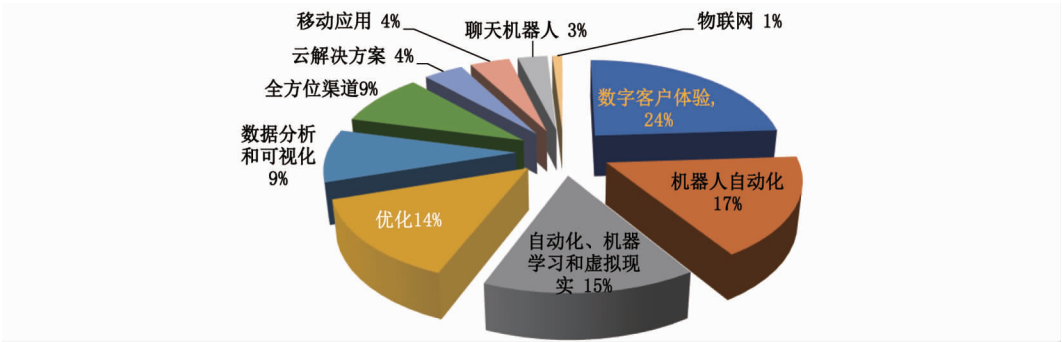


图 6 2017 财年企业在客户服务中获得的回报

数据来源：NASSCOM。

2016 年，BPM 提供商的收入中，84% 的收入来自传统服务，来自数字收入只有 16%。预计到 2025 年，将有 60%~70% 的收入来自数字收入，传统收入则下降至 30%~40%（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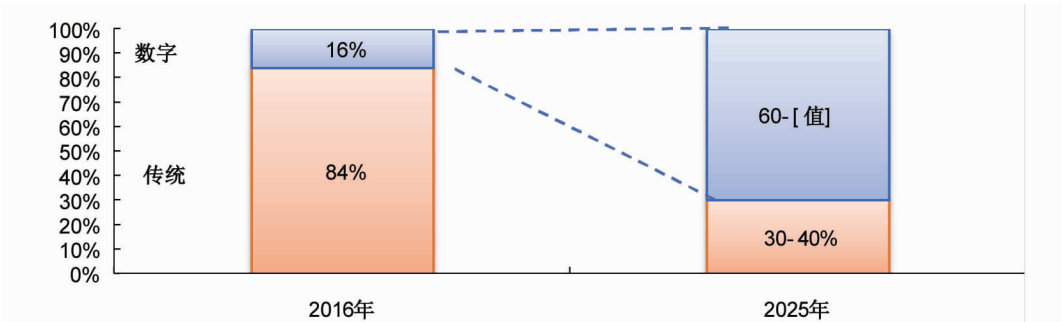


图 7 2016 年与 2025 年印度 BPM 收入构成对比

数据来源：NASSCOM。

顺应当前数字经济飞速发展趋势，印度于 2017 年建立了机器人自动化（RPA）卓越中心。目前，已有 25% 的 BPM 公司专注于数字客户体验；15% 的 BPM 公司专注于建立全渠道体验；30% 的 BPM 公司建立聊天机器人，移动应用程序，为数字启用云计算解决方案。

2. 成为数字解决方案的合伙人

投资者在印度本地化中建立了数字产能，“数字印度”是发展中的关键驱动力，即建

设全国性的宽带网络。鉴于数字这种极具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印度软件业正在重新将自己塑造为全球数字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用数字化改造自己，一些技术公司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和基础设施实现这种转变。印度计划 2020 财年软件产业规模增长到 3800 万~4000 万美元，2025 财年达到 5000 万~5500 万美元（如图 8）。其中，BPM 起着聚焦印度新技术演进和创造未来的战略路线图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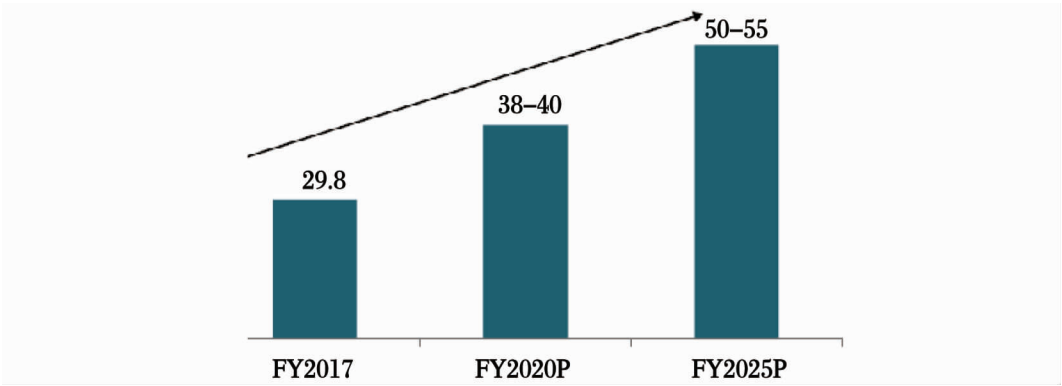


图 8 软件产业战略增长（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NASSCOM。

印度将继续成为 IT 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新增加的云创业企业在软件即服务（SaaS）中占巨大份额，达 95%。SaaS 改变了整个软件业的付费习惯，把一次性付费的现金流变成了 10 年持续付费的现金流。因此，企业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进入的门槛降低了。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在全周期使用过程中，为该软件付费的全部开销降低。SaaS 的生命周期总价值（LTV），甚至可能比传统软件的 LTV 更高，但第一次的销售费用和第一次的部署费用要低很多。今天，移动端的兴起和云技术的发展，对于 SaaS 的迅速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传统地区和新兴行业是软件出口主要收入来源

1. 开拓新的市场

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现新市场是获得创新收入的重要来源。从驱动 BPM 收入增长的因素看，2017 财年北美与世界新兴地区在增长中占统治地位，年增长分别达到 7.4% 和 10.2%。印度软件出口目的地虽然达 200 多个国家（地区），但美国仍然是其主要的外包区域，占签约总额的 42%。与此同时，欧洲保持较弱的经济增长，只有 4.0%（图 9）。从行业来看，电信和制造业推动印度软件出口收入增长，分别达到 18.6% 和 13.6%；金融服务业（BFSI）和零售业由于短期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增长只有 7%（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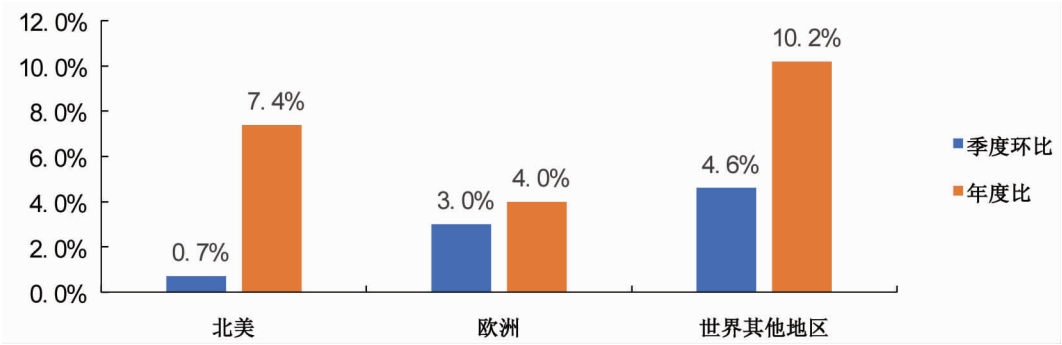


图 9 2017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地理区域收入增长

数据来源：NA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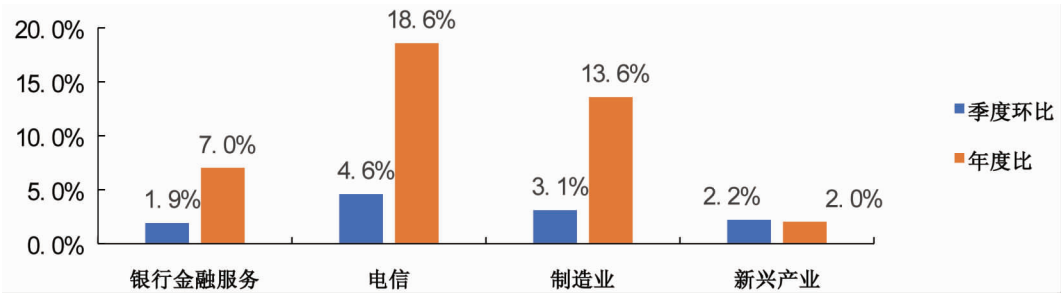


图 10 2017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行业收入增长

数据来源：NASSCOM。

2. 产能利用率和现场收入上升

印度 IT 服务公司的产能利用率随着公司继续实施生产力和效率改进措施而增加，包括实习生在内最高达 80.1%，不包括实习生在内最高达 77.0%（图 11）。由于许多企业使更多的资源接近他们的客户，现场收入份额依然坚挺。例如，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的服务模式是，70%的员工在印度，30%的员工在客户所在地贴身服务——印度员工往往通过工作签证的方式到目标国工作。2017 财年，来自现场的收入各季度接近或达到 60%，最高为 60.2%；离岸收入占比为 39.8%~40.4%（图 12）。

（三）通过并购增强软件产业实力

2017 财年，印度在数字经济带动下发生的企业并购超过并购总额的 1/3，数字产业占并购总额的 37%；其中，手机并购 41%、分析 16%、云计算 9%、移动支付 11%、其他 17%（如图 13）。

在主动融入软件产业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印度软件产业清晰地捕捉到数字革命而进行转型。表 1 显示，由于数字转型的加快，软件产业伴随着创新效率不断提高。2017 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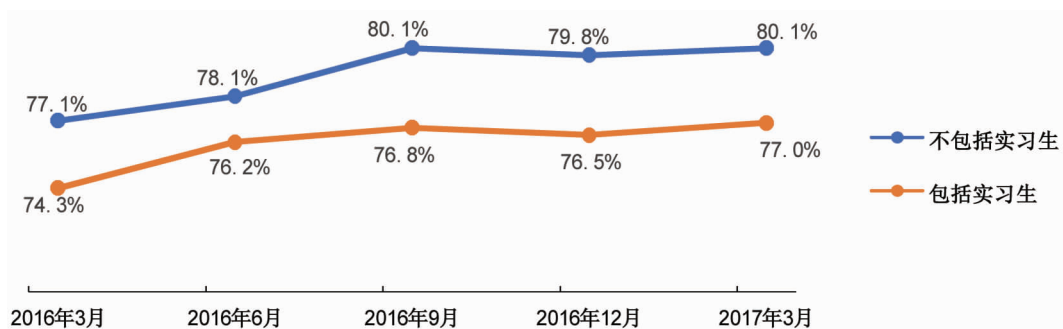


图 11 2017 财年印度 IT 服务公司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NA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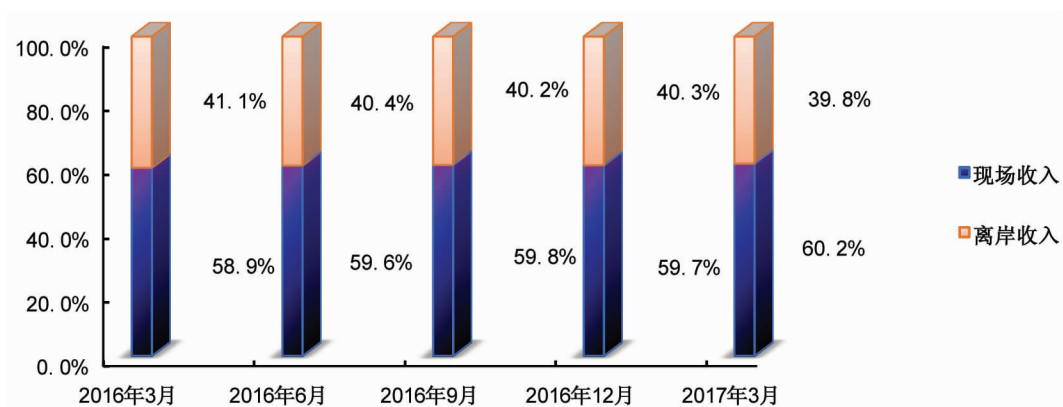


图 12 2017 财年印度 IT 服务公司现场与离岸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NA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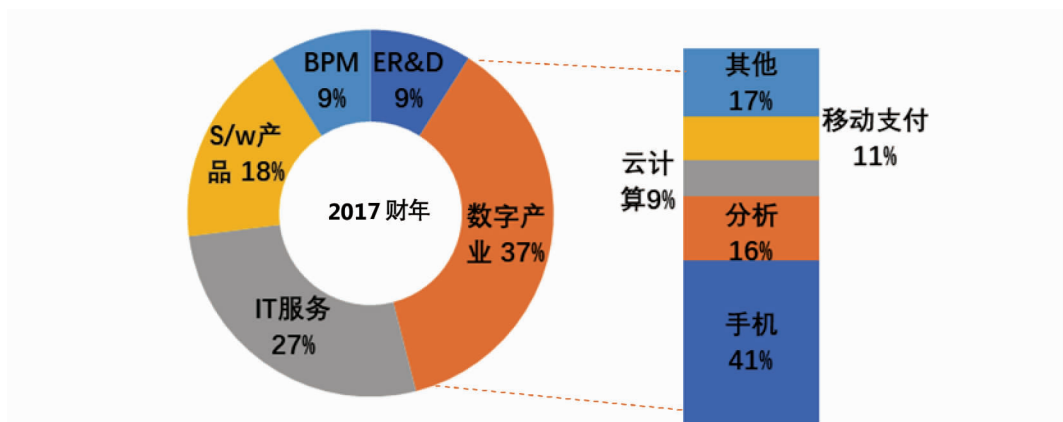


图 13 2017 财年印度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并购占比

资料来源：NASSCOM。

注：图中 S/W 为软件产品。

年，来自数字方面的收入占比达 15%~20%，远高于 2012 财年的 4%；以增强数字能力的并购达 64 件，比 2012 财年增长了 64%。印度软件产业通过并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在已披露的并购案中，主要涉及软件服务、数据分析、数据管理解决方案、设计服务等数字技术。例如，Zensar Technology 公司收购了英国的 Dartboard Analytics 公司，案值达 1400 万美元，该公司主要提供体验设计服务。印度在数字方面的专长和技能，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表 1 印度 2012 财年和 2017 财年关键业绩指标差距

	关键业绩指标	FY2012	FY2017	含义
效率	固定价格合同（占收入%）	42	55	与客户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得回报的趋势
	百万美元客户（占比%）	48	46	数字驱动更小的交易价值；趋势有望加速
创新	在岸收入（占比%）	48	59	数字项目需要与用户共同创新
	平台收入（占收入%）	4~7	7~10	基于 IP 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专注于增值服务
	数字收入（占收入%）	4	15~20	IP 数字收入增长快于 2025 愿景的预测
	数字并购（数量）	39	64	增强数字能力的并购，设计、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NASSCOM. IT – BPM Industry in India: Sustaining Growth and Investing for the Future, 22 June 2017, Hyderabad。

（四）共同创造成为一种新模式

在软件领域，传统的客户服务正在向高价值驱动、创新和极具个性化的服务转变，技术为这个转变提供了平台。最近几年，印度所有领先的 BPM 公司的客户服务创新数量均显著增加。这些公司正在利用数字和颠覆性的技术，如大数据或分析技术、云计算、移动性、物联网、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AR/VR），这改变了他们为客户服务的方式，创造新的收入源泉和新的客户体验。共同创造是服务提供者与客户创造更好的理念、产品和服务共同工作的过程。价值是由服务提供者和客户联合创造的，允许客户共同构建服务以适应他们的环境和建立整体业务功能的经验。

三、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风险

印度 IT 产业出口，包括软件（IT 服务）、业务流程外包（BPO）服务、硬件、其他 IT 服务（设计和培训），主要是 BPO 和软件，其他方面占比较小。印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软件规模及其出口所占份额一直呈上升态势。软件出口占印度整个软件规模从

1992 财年的 19% 上升到 2000 财年的 60%，再上升到 2017 财年的 76%（图 14）。其中，从美英市场接纳的份额就占全印软件外包市场的 70%，欧洲大陆所占份额也超过 10%。因此，外包的主动权掌握在海外发包者手中。

印度软件出口规模在 30 多年中一直呈现较高的增速，其中最高增速的 1982 年为 99%。解决“千年虫”的 2000 年给印度带来了 46% 的出口增长；2003 财年印度受世界经济下滑影响，软件出口增长率降为 15%；因世界经济回暖，2005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增长达 40%；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印度软件外包大单日益减少，2010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增长率降到只有 1%；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15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增长率达到 18%（图 15），2017 年回落到 8% 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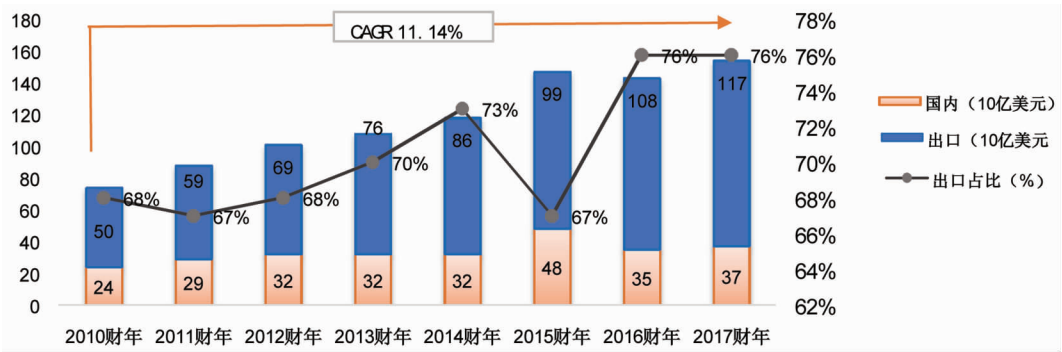


图 14 2010—2017 财年印度 IT 进出口总量及出口占总产出份额

数据来源：IT&ITeS. <https://www.ibef.org/exports/electronic-and-computer-software-industry-in-india.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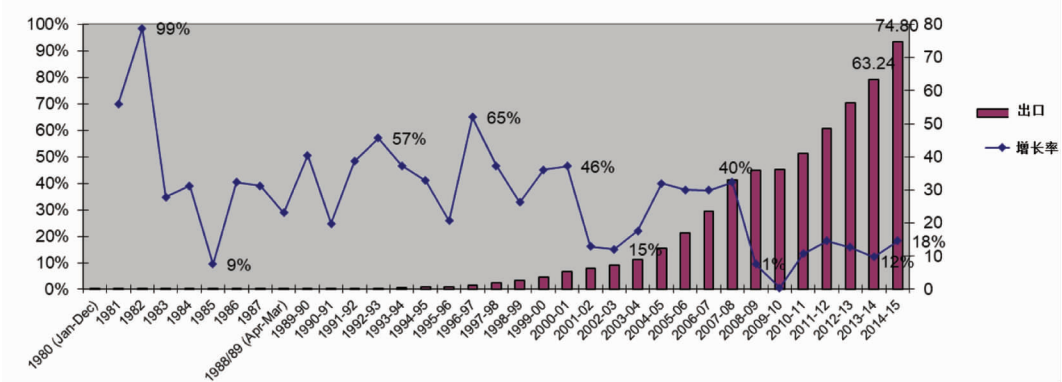


图 15 1980—2015 财年印度软件出口增长率和出口规模（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Dataquest (India); Indian Dept. of Electronics/IT reports; Interviews; ESC India。

由此可见，印度软件产业由于主要用于出口和承接服务外包，在国际软件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国际市场的繁荣或萧条都会给印度软件出口带来深刻影响，进

而影响印度的整个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海外市场的萎缩是印度软件业所面临的最主要外部风险。

（二）信息基础设施是软件产业持续发展的隐忧

印度的软件产业更像全球信息产业的飞地坐落在软件园区，整个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其他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使软件产业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尤其信息基础设施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得以生存及发展的基础，是印度接入互联网和承接软件服务外包的命脉。除了软件园区因政府予以特殊的优惠政策发展较快外，整个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会影响印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深化。

表 2 2016 年印度与亚太和世界通信指标比较

重要通信指标	印度	亚太地区	世界
固定电话每百户签约用户	1.9	10.0	13.6
移动电话每百户签约用户	87.0	98.9	101.5
固定宽带每百户签约用户	1.4	11.3	12.4
活跃移动宽带每百户签约用户	16.8	47.4	52.2
3G 覆盖率（%）	79.7*	87.6	85.0
LTE/WiMAX 覆盖率即 4G（%）	73.5*	73.6	66.5
移动蜂窝价格（人均国民收入%）	1.8	3.2	5.2
固定宽带价格（人均国民收入%）	4.8	14.5	13.9
移动宽带价格 500MB（人均国民收入%）	1.9	2.7	3.7
移动宽带价格 1GB（人均国民收入%）	3.2	5.4	6.8
家庭拥有计算机比例（%）	15.2*	37.8	46.6
家庭接入互联网比例（%）	22.6*	45.5	51.5
个人应用互联网比例（%）	29.5*	41.5	45.9
每个互联网用户连接带宽（kbit/s）	16.0	48.0	74.5

资料来源：国际电联（ITU），2017 年 6 月。

注：星号数据为 ITU 估计数。

从表 2 可以看到，印度一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其指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在亚太地区范围内看，除了 4G 与亚太平均水平持平以及价格相对较低外，其他指标都落后于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2012 年 7 月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停电事件，使印度在 36 小时里，全国电网崩溃了两次，直接影响了 50%国民的生产生活用电。印度必须面对数字经

济发展带来的可能性与支撑互联网经济的破落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三）人力成本上升的困扰

印度软件人才成本上升失去比较优势。经过专业培训的信息技术人才跟不上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这拉高了印度信息产业从业人员的薪资。相关数据显示，印度软件从业人员的薪资以每年 15% 的速度增长。由此，迫使 Infosys、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和惠普罗公司（Wipro）这样的软件巨头纷纷到海外寻找雇员。高薪资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软件业丧失了一部分比较优势。例如，Infosys 成本支出中 70% 用于工资支出。不过，这一局面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东南亚、东欧、南美等地均出现成本洼地。

四、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保持强势的原因分析

（一）技能重塑成为企业数字转型的关键

数字化正在改变世界。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不断融合，广泛渗透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数字经济。工人、企业、产业以及整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都受到严重影响。^① 员工只有在数字化方面的技能改善，才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

印度 IT - BPM 产业正在拥抱数字变革，以为下一阶段增长获得动力。数字转型需要顶级科技人才，需要一整套的技能。事实上，NASSCOM 已与美国的互联网产业联盟结盟，以便在物联网领域取得更多的创新。数字浪潮正在重塑印度软件产业及其优势，并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印度的 IT - BPM 产业作为数字解决方案的伙伴正在积极地为全球的合作者、利益相关者、消费者、初创企业、学术界等提供服务。

数字科学正在成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利用和提供高价值服务的下一个增长点。2017 财年，在印度软件公司中，有 3500 万人（超过 50% 的顶级企业员工）接受过数字化培训，是 2010 财年的 12 倍。中型企业再培训率达 33% ~ 35%，小企业再培训率达 38%。其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分析（37%）、移动应用（26%）、云计算（24%）以及其他（13%）。

“技能革命”需要学习和技能重塑，设计思维可推动企业创新。在印度，技能重塑已成为软件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项巨大工程。通过技能重塑以帮助员工适应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科技，并确立数字技能培训水平：一级基础，数字技能基础；二级中等，对项目准备就绪的数字模块进行深入开发；三级高级，具有实践经验和外部认证的数字模块；四级专家，为中小企业发展培训专家（如建筑师、专家、顾问、培训师等）。印度培训学

^①布鲁金斯：《数字化对美国劳动力的影响》，<http://www.199it.com/archives/672568.html>，2018 年 1 月 8 日。

习架构如图 1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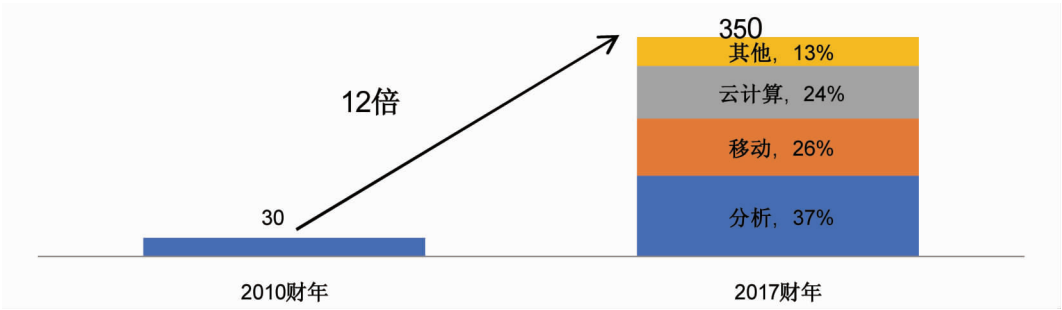


图 16 超过 50%的顶级企业员工接受过数字化培训（10 万人）

资料来源：NA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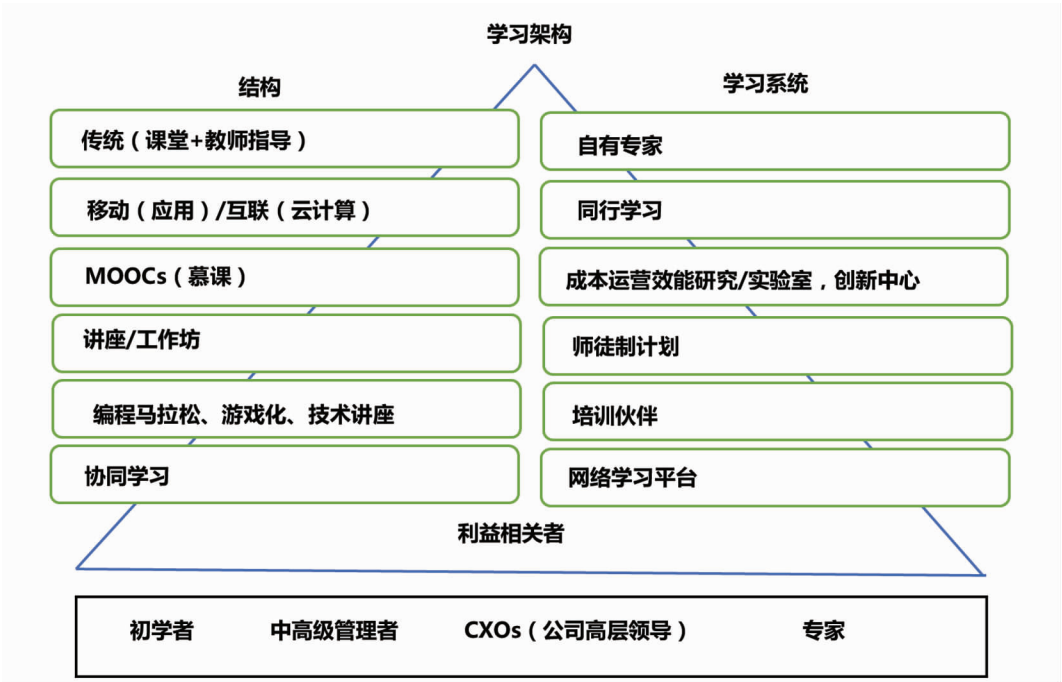


图 17 印度软件企业在培训学习架构

资料来源：NASSCOM. Indian IT – BPM Industry: Skilling for Digital Relevance。

通过卓越研究基地（COE）、增强数字服务（DS）和人工智能为 NASSCOM 成员提供新时代的竞争优势。对于印度 IT – BPM 产业来说，学习新技能或灭亡已成为业界的新口号。例如，高知特（Cognizant）企业数字人才战略就是引领数字转型，以强大的员工队伍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并持续不断地学习。随着数字化的加速，在各个层次和角色上，技能要求正在迅速改变。为深化和拓展数字技能，Cognizant 学院制定了全方位的数字人才战略。学院设计的基于级别的程序包括：数字 101，侧重于建立广泛的数

字素养，并适用于整个劳动力；数字 102，着重于开发技术技能以使这些技术中的应用程序或产品开发成为可能；数字 103，一个全面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培养全栈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数字架构师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认为，数字化不仅能加快印度经济的增速，推进电商市场的发展，还能带来数字支付时代。印度极有可能成为今后 10 年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而数字化将为印度经济带来更正面的影响。

(二) 通过孵化器与加速器打造 IT 产业生态系统

NASSCOM 提出，从 2013 年到 2023 年，用 10 年时间孵化支持建立 1 万个新的技术企业计划，以打造 IT 产业生态系统。在学术孵化器的驱动下，学生初创企业由 2016 年的 350 个增长到 2017 年的 450 多个，几乎增长 30%。^①

2016 年，孵化器和加速器比上年增长近 40%，达 140 多个，新的学术型孵化器建立了 30 多个，班加罗尔、国家首都地区（NCR）孟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继续成为领先的中心。二三级城市的新孵化器以 66% 的增速增长，法人加速器以近 35% 的增速增长。孵化器和加速器聚焦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以及虚拟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图 18 孵化生命周期

资料来源：NASSCOM. Indian Start-up Ecosystem traversing the Maturity Cycle. Education 2017。

孵化器提供跨越生命周期的支持，典型周期一般为 6~36 个月。加速器更多地聚焦在

^①NASSCOM. Indian Start-up Ecosystem traversing the Maturity Cycle. Education 2017.

“增长和加速”阶段，典型周期为 3~12 个月（图 18）。在技术驱动的初创企业中，印度位居世界第三位，2016 年科技初创企业达 4750 家。印度的软件技术园和经济特区为 IT 公司提供了负担得起的房地产空间。从 2016 年第一季度到 2017 年第一季度，获得初创企业经费的企业由 350 个下降到 290 个，下降 17%；但平均每个初创企业获得的基金支持由 580 万美元上升到 620 万美元，提高 7%。独角兽基金则表现为指数增长，到 2017 年第一季度时已超过 38 亿美元。^①

据《印度时报》报道，为鼓励印度“创业一代”发展，印度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NDA）为软件创业公司制定了财政激励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引进或支持 1 万家新兴创业公司，这将直接或间接创造 350 万个就业岗位。“印度制造”“技能印度”“数字印度”等战略也都以此为目标。数字技术加速与制造、生物、能源等技术融合，带动群体性突破，全面拓展人类认知和增长空间。

（三）高度重视软件企业的国际质量认证

印度是当前世界上软件企业获得质量认证最多的国家。有 170 家公司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0 质量标准认证，在全世界获得美国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5 级认证的 50 多家软件企业中，印度占了绝大多数，这是其提供软件外包服务的基础。印度软件产业提供一系列服务，从低端应用发展到跨越多个垂直领域的高端集成 IT 解决方案，并有发达的供应商基地。印度 IT 和软件行业坚持质量流程和标准，大多数企业都将业务与国际标准接轨。印度高素质的技术毕业生人才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库之一，能为外包来源国节省 60%~70% 的成本。在过去 5 年中，一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使印度 IT 公司帮助客户节省了 2000 亿美元。这也是印度软件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四）努力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对于印度的 IT-BPM 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未开拓的出口市场。同时，印度也向中国企业敞开大门，鼓励中国到印度农村投资并与他们分享关键领域的巨大商机。

印度 IT-BPM 产业继续向新高峰扩展，向迄今尚未开发的地理区域扩展，以减少对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对印度而言，中国目前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以建立一个强大的亚洲市场的新收入流。中印一直以来是传统的贸易伙伴，向前迈进可以创造彼此双赢局面。NASSCOM 一直致力于促进印度公司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中国的投资

^①NASSCOM. Indian Start-up Ecosystem—Traversing the Maturity Cycle. Edition 2017.

和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如今，中国经济体量跃升至全球第二，未来外包市场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中国电力、电信、交通等领域的强劲需求，以及规划建设中的智慧城市等红利尽出，内需将成为中国软件外包公司的主要驱动力。印度企业唯有深耕中国，才能获得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订单和服务能力。在全球竞争中，中印合作可以规避欧美客户在中印之间的平衡布局。印度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会为自身软件业发展找到数字经济升级的出路，也会迅速改变自己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为印度带来更多的福利。

（五）通过延长免税期限催生数字革命

印度正在快速崛起，其 2016 年与 2017 年的 GDP 增速已超过中国，并于 2017 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虽然印度社会各方面似乎都充满矛盾，但软件的发展与数字转型使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数字印度”是其政府的一个旗舰计划，期望把印度转变为一个数字授权的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印度政府已对软件技术园的 IT 部门延长了免税期限。此外，还为设立设施提供程序上的便利。

印度目前正在催生数字革命。大量的技术向着数字产业转移，增加的需求是独特的分析技能和尖端技术。印度未来正在以下几方面寻求发展：一是建立印度数字创新中心；二是加速技术技能培训和再培训平台发展；三是建设卓越或首创中心——包括物联网、设计、数据科学、网络安全；四是完善数字生态系统——将初创企业与原有企业联系起来；五是国内技术引进伙伴加速印度转型；六是以数字解决方案和工业 4.0 为重点，扩展日本、德国、中东、非洲和中国的新市场。

五、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软件产业又是数字经济这一核心动力的核心。印度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表明，数字技术可对任何发展阶段的国家做出贡献。“数字经济成为重塑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力量。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驱动放大大部生产力的‘乘数型’生产力，成为重塑经济结构和提升生产率的主导力量。”^①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投资每增加 1 美元，便可撬动 GDP 增加 20 美元，而 1 美元的非技术投资仅能推动 GDP 增加 3 美元，数字技术投资的平均回报是非技术投资的 6.7 倍。^②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主要是通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

①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17 年）》，2017 年 7 月。

②华为、牛津大学经济学院：《数字溢出：衡量数字经济政治影响力》，2018 年 2 月。

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来实现的。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正在全面应用数字技术，这将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而数字技术的实现，主要通过 SaaS 平台服务模式，基于产品、信息、客户的资源整合平台及其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中国必须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培训，提高软件从业人员在数字化条件下的软件开发技能、软件开发云等智能化的软件生产平台的开发能力，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降低从开发到运营的成本。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准、结构更合理、空间更广阔的阶段演进，带来更高的价值增值，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岳森：《印度 IT 之王：软件外包的不死之术》，《环球企业家》2013 年第 6 期。
2. 吕鹏飞：《印度软件业期待转型》，《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26 日。
3. 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 陈世清：《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年版。
5. 王健编译：《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中国经济网，2014 年 4 月 1 日。
6. 张运洪：《印度制定新软件产业刺激计划，2025 年前新增 350 万个就业岗位》，《人民邮电报》2016 年 7 月 20 日。
7. 张文海：《印度软件业两次下滑的警示》，《群众》2017 年第 2 期。
8. 管辉、戴洛特：《蓬勃发展的印度数字出版业》，《图书馆》2017 年第 3 期。
9. 布鲁金斯：《数字化对美国劳动力的影响》，2018 年 1 月。
10. 华为、牛津大学经济学院：《数字溢出：衡量数字经济政治影响力》，2018 年 2 月。
11. NASSCOM. *Upskilling for Digital*, 2017 – 03.
12.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 – 2018.

责任编辑：李 蕊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及趋势展望

夏友仁

摘要：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市场成熟、庞大。对全国经济社会而言，美国软件业提供了较高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创造了较多的就业岗位，经济红利覆盖面广泛而均衡，有效助推了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同时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投入，后势强劲。未来美国软件贸易将持续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软件服务贸易将蓬勃发展。为促进该行业发展，美国商务部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6 年成立了数字经济议程和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通过系列措施助推数字经济增长。商业软件联盟、美国信息技术工业协会、美国软件与信息行业协会、美国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已凸显出在软件贸易中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美国 软件贸易 服务贸易 数字经济

作者简介：夏友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具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其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领先，对整体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显著。美国的服务贸易优势产业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且多集中于知识产权使用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之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国，长期位居软件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拥有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甲骨文、微软等在内的众多全球顶尖软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服务供应国，软件贸易体量在全球举足轻重。

一、美国软件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美国软件业发展现状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全球 3.8 万

亿美元的信息技术（IT）市场中，超过 1/4 都在美国。2016 年该产业占据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的 1.14 万亿美元，并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为美国带来了 1050 万个就业岗位。2014 年以来，软件业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增加了 14.6%。美国拥有超过 10 万家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其中 99% 以上为中小型企业（少于 500 名员工）。这些公司包括软件出版商、自定义计算机编程服务供应商、计算机系统设计公司和设备管理公司。该产业吸引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美国劳动力，总数将近 200 万人。

美国软件公司经营着一个成熟、统一的市场，并且其以提供可靠、有效的解决方案迅速进入市场而闻名。由于美国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因此该产业的国际公司对美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是世界上打包和定制软件市场的领跑者，拥有相对稳定的海外市场份额，而且在几乎所有的其他细分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国际数据公司（IDC）的调查显示，基础设施项目是美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优先项目，且其对协作工具、绿色信息技术、云计算和移动应用等方面的兴趣正迅速增长。

（二）美国软件业发展特点

在美国软件业的相关研究中，经济学人智库（EIU）通过软件业对经济影响力度的量化分析，明晰了美国软件业对经济产生贡献作用的三个主要效应：一是直接效应——软件业对经济发展的广度影响力，其为一国带来广泛的经济收益。二是间接效应——软件业对整个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三是引致效应——一般需求的增长带来相关其他经济活动的增加。究其原因，是支付给软件行业工作者的工资和为软件业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相关产业工作者的工资总额有所增加，从而进一步带动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总体而言，美国软件业在贡献 GDP 增加值、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水平以及推动美国经济走向更为繁荣的未来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而言，软件业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作用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1. 高额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美国软件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美国经济的正向拉动作用显著。2016 年，软件产业为美国的经济直接贡献了 5644 亿美元（直接的 GDP 增加值）；与 2014 年相比，两年来增长了 18.7%。当考虑软件服务对美国经济的全部经济影响力时，可知 2016 年软件业为美国总的 GDP 增加值贡献超过 1.14 万亿美元（其中包括 5644 亿美元的直接 GDP 增加值和 5755 亿美元的间接及引致效应所带来的 GDP 增加值），两年内增长了 6.4%。

2. 强大的就业拉动能力

软件业是一个强大的就业制造者——带动了美国超过 1000 万人的就业。作为一个创

造就业的动力源，2016 年软件业在美国直接雇佣了 290 万人，与 2014 年的 250 万人相比，仅在两年中就解决了超过 40 万人的就业问题。此外，软件业所带来的每一项直接工作，都会带动与之相关其他行业的 2.6 个就业岗位的增长。软件业通过间接和引致效应，为其他行业增加了 760 万个工作岗位。从总体效应看，软件业 2016 年为美国带来近 1050 万个就业机会。

3. 均匀的经济红利覆盖

软件业的经济红利覆盖面广泛且均衡，直接带动了美国 50 个州的经济的发展；各州均从软件业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机遇中获益。几乎在各州当中，软件业所创造的直接的 GDP 增加值涨幅均超过 10%。在 35 个州中，来自软件业的直接的 GDP 增加值涨幅超过 20%；其中，爱达荷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涨幅超 40%，另有 9 个州涨幅达 30% 以上。

4. 持续的软件研发投入

一直以来，美国十分关切和重视软件业的研发，相信软件产业将持续推进其经济增长。随着软件业所带来的研发经费的大量投资，未来的经济收益将更为巨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超过 50% 的美国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推动经济获取突破性进展，创造一个更为繁荣的未来，2013 年美国软件产业在研发上的投资额超过 630 亿美元，与 2012 年的 520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21%。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630 亿美元的软件研发投入超过了美国每年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62 亿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300 亿美元）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22 亿美元）投入的总和。由此可见，美国对软件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坚信其有望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回报，并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增加。^①

5. 有效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助推

软件业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也不容小觑。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升级和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传统的仅注重工业生产的经营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位于微笑曲线两端、居于价值链高端的设计、开发等在内的服务，越来越成为当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剂，生产性服务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日益凸显。而软件业作为高新技术服务行业，同时也是生产性服务的一种，其对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和服务产业升级的影响亦尤为深刻。软件业对促进美国信息技术行业、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建立数字化经济社会影响深远。

^①数据来源：www.software.org。

二、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现状

1.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概况

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包括三类服务：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和与计算机软件有关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各年出口额分别为 1297.16 亿美元、1244.42 亿美元和 1244.53 亿美元，其中，计算机软件服务出口额分别为 391.77 亿美元、367.61 亿美元和 366.62 亿美元，分别占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的 30.2%、29.5% 和 29.5%。2016 年，美国软件服务出口额较上年减少 0.99 亿美元，降幅为 3%。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于 2015 年略降至 398.58 亿美元，较上年减少 21.25 亿美元，之后于 2016 年骤增至 443.92 亿美元，涨幅达 11.4%，其中，计算机软件服务的进口额自 2014 年至 2016 年逐年上涨。2016 年美国计算机软件服务进口额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6.55 亿美元，增至 74.23 亿美元，涨幅达 9.7%。2014—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顺差额逐年递减，分别为 877.33 亿美元、845.84 亿美元和 800.61 亿美元；计算机软件服务的贸易顺差额也与之保持同向递减，分别为 324.63 亿美元、299.93 亿美元和 291.98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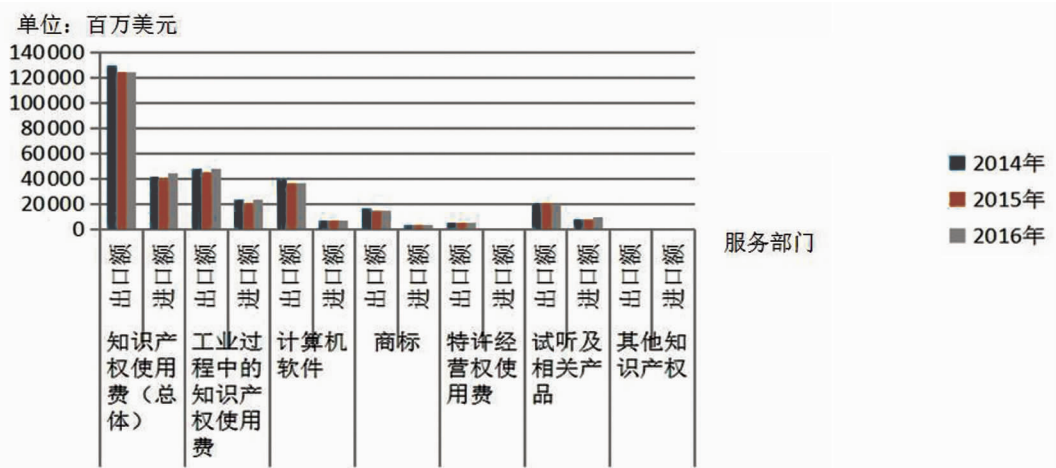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及细分行业贸易额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从 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细分市场贸易规模看，不论出口还是进口，计算机软件服务都在其中占据着较大比重。2016 年，美国计算机软件服务出口占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总额的比重将近 1/3，为 29.5%，成为继工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之后的第二大出口细分行业。2016 年，美国计算机软件服务进口占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总额的

16.7%，低于工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的 52.3%、试听及相关服务的 22.6%，大于商标、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和其他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进口额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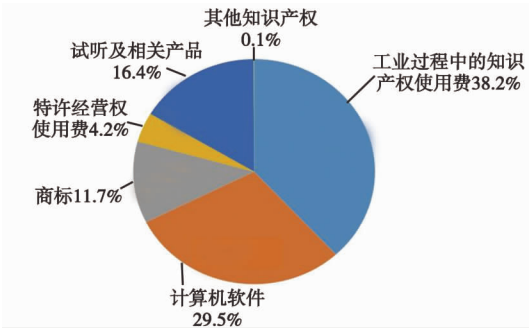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
细分部门出口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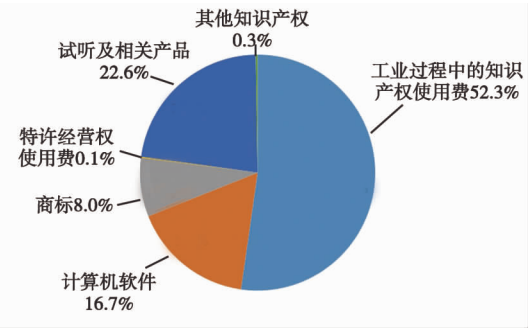


图 3 2016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
细分部门进口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2. 美国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概况

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长期以来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一方面，美国拥有包括软件服务等在内的坚实的服务产业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完善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为美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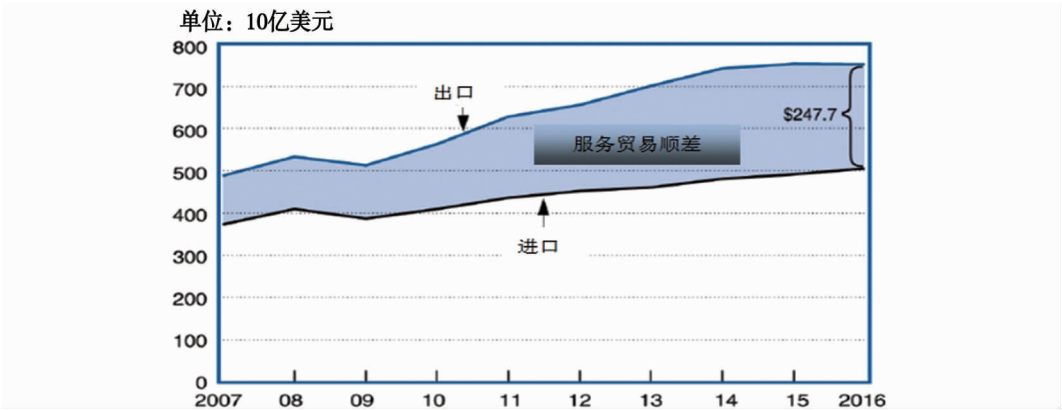


图 4 2007—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2007—2009 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基本保持稳定；2010—2014 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整体大于进口增速，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美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于 2015 年增加 4 亿美元后，2016 年减少 138 亿美元，降至 2477 亿美元，这也是自 2003 年以来美国服务贸易年度顺差额的首次下降。其中，2016 年，美国服务出口下降 8 亿美元，降幅为 1%；服务进口增加 130 亿美元，增长率为 2.6%。2015 年，美国

服务出口总额较上年增加 113 亿美元，增长了 1.5 个百分点；服务进口总额上涨 109 亿美元，涨幅为 2.3%。美国服务贸易的这些变化主要由 2016 年现价美元标的 GDP 值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 GDP 增长率较 2015 年降低所致。此外，2016 年美元相对于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升值，这使得美国提供给客户的服务在这些国家更为昂贵。

表 1 2014—2016 年美国国际服务提供和接收情况 单位：10 亿美元

年份	服务提供（出口）		服务接收（进口）	
	通过贸易	通过美国公司的 境外分支机构	通过贸易	通过外国公司在 美国设立的分支机构
2014 年	741.9	1534.8	480.8	940.4
2015 年	753.2	1463.5	491.7	952.5
2016 年	752.4	—	504.7	—
较上年变动百分比（%）				
2014 年	5.8	16.1	4.3	5.4
2015 年	1.5	-4.6	2.3	1.3
2016 年	-0.1	—	2.6	—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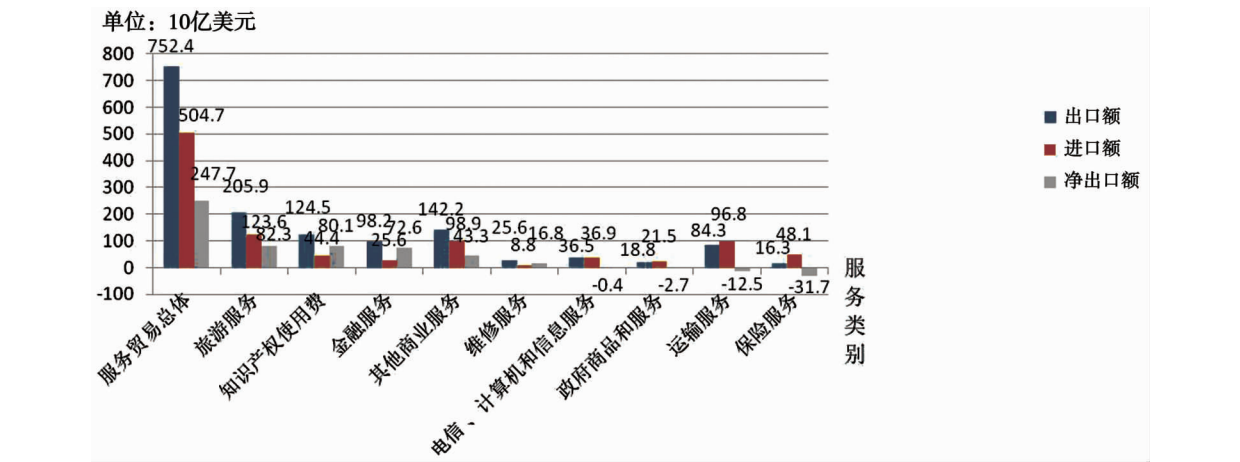


图 5 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结构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2016 年，美国服务出口总额持续减少，九大主要服务部门中三个服务部门的出口额有明显下降。其中，政府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少 11%，金融服务和运输服务出口均减少 4%。2016 年，美国九大服务部门中的四个服务部门的服务进口额均有明显增长。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进口增长 11%，旅游服务进口增长 8%，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

2%，保险服务进口增长 1%。^①

（二）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特点

1. 对服务贸易总体顺差贡献显著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国际贸易体量巨大，对世界贸易总额的贡献举足轻重。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长期存在，但服务贸易顺差明显。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从美国服务贸易总体及各细分行业看，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顺差为 2477 亿美元；旅行服务的贸易盈余最多，为 823 亿美元，其中 70% 的贸易盈余来自个人旅行，包括与健康相关的个人旅行、与教育相关的个人旅行及其他个人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盈余为 801 亿美元，其中 67% 是与计算机软件和工业过程相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顺差。可见，软件贸易顺差对美国服务贸易整体顺差的实现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方面，其促进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抵消货物贸易长期逆差的影响，对于美国整体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平衡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拉动作用。

2. 软件贸易促进体系协同驱动

美国软件贸易的相关中介组织较为丰富，随着软件业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深化，这些多元的中介组织在软件贸易中的协同作用效果逐渐凸显。

商业软件联盟（BSA）、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SIIA）、美国计算机与通信产业协会（CCIA）、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CompTIA）、美国应用软件协会（ACT）等均为美国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相关中介组织，其具体职能各呈特色、各有侧重。总体而言，相关中介组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助推美国软件贸易不断向前发展：一是作为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加强二者间交流互动；二是制定行业标准、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推动行业内企业在全价值链驱动背景下进行持续创新；三是提供全球信息技术研究成果和市场信息，方便美国计算机软件服务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紧跟全球最新的 IT 行业趋势；四是为企业 provide 资源，助其拓宽融资渠道，并创造就业机会；五是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服务，打击盗版，维护会员企业权益；六是促进行业内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为美国软件贸易提供发展潜能。

除上述行业协会之外，SDTimes、Computer World、Computing Now、Computer Weekly 等出版物，也将继续为包括软件业在内的 ICT 行业提供多种现时咨询和未来行业发展动态信息，从而在推动技术进步、加强行业互促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与行

^①Shari A. Allen and Alexis N. Grimm, U. 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in Services in 2016 and Services Supplied Through Affiliates in 2015*, October, 2017. <https://bea.gov/scb/pdf/2017/10—October/1017—international—services.pdf>.

业协会一道为美国软件服务业在内的现代计算机通讯行业发展构建坚实的促进体系，助力软件贸易在体量、质量和效应上不断提高，进而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发展。

3.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计算机软件贸易作为以知识产权为客体的国际技术贸易的一种，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一定比重，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成员，美国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其软件业立足于世界领先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软件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随着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不断向前，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亦将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的四种主要形式——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在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样得以呈现。就各形式知识产权的特点，美国推行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一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专利保护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 1787 年 9 月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中就有规定，国会拥有制定与专利有关的法律——“为促进科技和实用艺术的发展，国会拥有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在有限时间内对其作品和发明的独占权”。之后在此基础上，美国国会颁布了包括《专利法》在内的与专利保护有关的各项法律。二是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USPTO）政策和国际事务处（OPIA）商标组专门从事与商标有关的国内、国际政策和执行事务。该小组参与 TRIPS、《商标法新加坡条约》、1994 年《商标法条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马德里协定）的发展、谈判的监督工作。三是长期以来，OPIA 版权组就其国内、国际版权法律和政策问题向行政当局及其他联邦政府部门与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四是美国通过专门立法加强对商业秘密持有者的保护力度，维护其经济利益不受损害。2016 年 5 月 11 日，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正式生效；在该法生效一周年之际，2017 年 5 月 8 日，USPTO 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商业秘密保护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4. 积极的财政支持

2017 年 9 月 18 日，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提出，从 2017 财政年开始，接下来 5 个财政年的每一年度，财政执行机构的首席信息官需向管理预算办公室提交报告，说明改进软件许可证管理后资金节省的具体情况。该报告指出，美国国税局计划在具有合适资金的情况下，成立软件资产管理（SAM）行政治理小组，以提高软件资产管理的有效性。美国国税局还计划以联邦要求和产业最佳实践为指导方针，构建 SAM 框架。该框架将根据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通报所有计算机层面和相关职能的 SAM 能力。实施这一有效的 SAM 将为美国软件业及软件贸易减少信息技术成本，并降低软件所

有权和使用过程中相关的操作风险、财务风险及法律风险，有效助推美国软件贸易发展。

除此之外，BSA 为用户提供资源助其对软件资产实现有效管理；推出软件资产管理优势（SAM Advantage）这一长期性的项目，帮助软件企业更为方便地采用国际标准组织（ISO）所制定的全球 SAM 标准。另外，拥有超过 5000 家移动通讯领域的 APP 企业和信息技术公司的 ACT 亦将为美国软件业和软件贸易未来的发展提供相应资金支持。该协会提倡为会员企业营造一个激励和奖励创新的环境，同时为企业提供服务资源，助其利用知识产权资产筹集资金，并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移动通讯软件行业持续创新。除了一些小型企业之外，ACT 还为苹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易贝、脸书、英特尔、微软、甲骨文、贝宝（PayPal）、威瑞信（VeriSign）和威瑞森电信（Verizon）等众多大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三、美国软件贸易发展趋势

受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影响，美国的软件贸易发展短期内前景并不明朗，但长期看，其软件贸易发展呈持续上升趋势。

（一）高新技术对软件贸易影响深远

1. 云计算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软件服务的突破为美国企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它允许任何人（一个初创企业、一位个体消费者、一个公共实体部门或一个小型企业）得以快速、高效、成规模地获取最先进的技术。云计算服务以其前所未有的连通性，为信息技术市场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不断推动行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根据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关于全球采用云计算的预测，到 2020 年底，全球云计算业务的花费将达到 1910 亿美元，为 2014 年全球云计算业务花费（720 亿美元）的 2.65 倍。IDC 先前预测，2017 年全球云计算市场的花费为 1070 亿美元，是 2013 年 474 亿美元的 2 倍之多。作为全球云计算市场的领跑者，美国在该领域内拥有一定数量的大型公司。2015 年，美国进口了约 340 亿美元的云计算服务；与 2010 年该项进口数据相比，增长了 40%。长远观之，软件业作为一项专门的服务行业，有望成为美国云计算服务市场增长最快的部门。

2. 数字经济提供创新驱动动力

美国和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经济社会变革。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经济增长越来越与数字经济紧密相连。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就业、商业创造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参与者分享思想、学习新技能、获取人类知识宝库

的领域。信息技术始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商务部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通过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包括软件业和软件贸易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把技术和互联网政策置于首位，帮助企业来回应数字经济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此，美国商务部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成立了数字经济议程，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一是促进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开放，推动数据和服务畅通无阻地跨越国界。二是促进网上信任，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保护隐私，保障网络安全。三是确保个人、家庭和公司的进入，充分意识到快速宽带网络对于 21 世纪经济成功的至关重要性。四是推动创新，通过智能化的知识产权规则促进创新，并推动新技术的开发。2016 年底，美国商务部建立了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未来将继续向美国商务部提出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以及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比如未来数字经济中的就业和工作，数字经济度量，利用数字平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3. 大数据背景下软件贸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以往普遍采用的随机抽样数据处理方法难以满足当前需求，而逐渐被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的模式所取代，大数据应运而生。在大数据背景下，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科技日益涌现，对美国软件业及软件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互联网连接设备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家庭和企业之间以及物质世界的互动方式。互联网连接设备多种多样，安全摄像机、数字录像机、打印机、可穿戴设备、“智能”灯泡以及因特网连接式家用电器等，这些设备被统称为“物联网”。物联网设备代表着越来越多的用于收集、交换和处理因特网上信息的工具，为其用户提供了访问一系列服务和信息的便捷通道。与之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往往通过所收集到的各种数据，对未来发展产生洞察力、做出预测，并进一步通过软件实现人机互动。物联网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流支持；人工智能又将物联网带来的价值实现最大化的增值。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各物联网终端设备的连接和人机交互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软件需求的增长。随之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全球市场对软件贸易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大数据背景下，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无疑为美国软件业及软件贸易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潜力。

然而，随着大数据为软件贸易带来广阔发展机遇的同时，挑战也与之并存。美国司法部 2017 年 7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物联网设备越来越成为犯罪分子攻击的目标。为了攻

击物联网设备，网络犯罪分子常常探测设备的安全漏洞，然后安装恶意软件以暗中控制设备、损坏设备、获得对设备内数据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影响设备的操作。安装的恶意软件不仅可以危害受感染物联网设备的操作和信息安全，而且还可以为黑客提供用于在同一网络上穿透其他电子设备的管道。除非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否则恶意软件可以在用户未打开文件、不点击链接或者执行除打开互联网连接设备之外的任何其他操作的情况下，快速扩展到物联网设备的网络上。因此，为了保障信息安全，未来美国在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将有效防御恶意软件侵入终端设备窃取用户信息，进一步加强信息风险的防范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维护。

（二）电子商务成为推动软件贸易发展新枢纽

电子商务是一个跨越所有产业的线上销售渠道，是企业推行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程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有效供给，应运而生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日益繁荣。2015 年，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 3410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长约 14%。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 2020 年底，大约 9.4 亿的网购消费者将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花费近 1 兆美元。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将成为推动软件服务贸易增长的新枢纽。

1. 电子商务促进软件服务需求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商务活动，电子商务运行和交易模式日趋成熟且完善。在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过程中，面临包括业务信息、产品信息、客户信息等在内的待处理的海量数据。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统计的准确和高效，企业对电子商务相关软件的需求日益高涨。这些软件在数据处理、产品运营、客户维护等方面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为了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帮助企业高效地开展业务，与之相关的软件服务贸易市场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跨境电子商务为软件贸易发展提供新动能

与“电子商务”的一般概念不同，跨境电子商务的字面意思是“通过电子商务跨越国别和区域界限开展线上销售”，即为“国际电子商务”。在国际服务要素差异化背景下，各国或各地区的软件服务要素禀赋不同、服务供给质量不同、服务价格不同，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自然也不尽相同。随着全球价值链升级、全球软件服务要素差异化程度的扩大，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国际市场对软件服务的需求亦将不断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软件贸易的发展。

（三）软件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将更趋完善

数百年来，知识产权一直是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化发展进步的动力。包括 USPTO 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知识产权局，均致力于通过共同努力，确保知识产权继续促进科技创新。因此，随着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的软件服务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会减退，而只会日益提升。

以云计算服务为例，云计算安全公司 Skyhigh Networks 近期一项报告显示，一般的大型公司在运用其网络的过程中会使用超过 1100 项云服务。该研究发现，许多组织并没有云服务提供商的正式批准，或者员工与云服务提供商签约时，并没有遵循正式流程。云计算服务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网络安全隐患。因此，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可见，未来对于维护包括云计算等在内的软件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将会成为其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日益完善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诞生于 1790 年，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美国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和商业秘密权；相应地，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和《商业秘密保护法》。^① 除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之外，USPTO 对于推动和完善美国国内及国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亦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USPTO 将继续通过商务部长，就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政策问题，包括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美国总统及所有联邦机构提供咨询意见。此外，USPTO 被法令法规授权，从事提供指导、开展项目和进行研究等相关工作，并就涉及知识产权的事项与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办事处和国际政府间组织进行互动。美国将继续加强对进口盗版软件的查禁力度，对涉嫌盗版的进口软件进行技术性鉴定，不断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2. 行业协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支持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BSA，在欧洲、中东、非洲、亚洲等地区的 69 个国家均设立了分支机构，致力于推广正版软件与合规项目，净化全球软件业市场环境。未来，其将继续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正版软件市场的发展，为美国软件服务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行业支持。一是调查与维权。从终端用户、成员企业、执法机构、附属部门等处收集盗版报告，随后对其开展调查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个别严重的盗版案件将提交至国家执法部门并提起刑事诉讼。二是打击互联网盗版。BSA 通过使用最新技术，追踪盗版软件使用情况，并对网络服务供应商及使用盗版软件网站的经理入

^①孙南申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提出删除盗版软件的要求。三是教育与宣传。BSA 将持续通过新闻媒体、学校、社区及相关途径，强化公众对盗版软件负面危害的认识，助力正版软件市场蓬勃发展。^①

作为软件和数字内容行业的主要协会，SIIA 除维护政企关系、促进行业内企业的商业发展之外，仍将不断加强保护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推动创建益于软件服务业和软件贸易发展的法律及监管环境。

（四）中美软件贸易合作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除加强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外，在软件服务等高新技术领域也不断开展广泛合作，未来中美软件贸易合作发展前景将愈益广阔。

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到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两国在开放经贸市场、推进新兴产业贸易投资领域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中国广阔的市场将为美国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一个开放的、可预测的、透明的市场环境，有效促进美国个人和企业从中美贸易关系中获益，并进一步开放 ICT 贸易。为获得全球技术解决方法，提高软件使用效率，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商业企业的网络安全，降低对 ICT 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的条件限制，有效促进中美包括软件服务在内的 ICT 服务贸易发展。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还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在该项机制的推进下，中美两国未来亦将继续深化中美网络安全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减少软件服务产品的信息安全隐患。

除中美双边经贸对话合作机制之外，位于中国北京的联署组织——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对中美包括软件贸易在内的 ICT 服务贸易发展亦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会员制非盈利机构，同时也是 ITI、BSA、CompTIA 等五大美国 ICT 行业协会的在华代表机构。其一方面将为中国 ICT 产业现阶段及未来面临的许多复杂挑战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推动中美双边包括软件服务在内的 ICT 产业经贸合作。一是助力中国 ICT 产业相关政策法规的发展和完善，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采用，促进中美间 ICT 业务往来，实现贸易投资繁荣；二是代表在华的美资 ICT 企业，与中美两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中介组织、学术机构保持良好交流；三是作为中美 ICT 产业交流的平台，通过定期举办行业内相关活动等，促进两国 ICT 产业互利合作；四是为中美两国 ICT 产业提供相关行业动态的专业信息服务。

责任编辑：李 蕊

^①资料来源：<http://www.bsa.org/about-bsa>。

欧洲软件业与贸易的发展态势、 影响因素及趋势展望

肖汉雄 杨丹辉

摘要：软件业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助推欧洲经济增长、提升信息化水平、促进就业的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正在加速重塑全球经济体系，软件业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促进了欧洲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的融合发展。同时，作为全球软件贸易的重要市场，欧洲软件贸易形成了独特的外包模式，推动了全球软件业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效益提高。本文分析了欧洲软件业的发展现状及软件贸易的主要特点，指出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价值领域拓展、英国脱欧引发的转移效应以及破除服务业市场分割的政策方向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将为欧洲软件业的未来发展和贸易方式创新提供新的机遇。

关键词：欧洲软件业 软件贸易 服务外包 新工业革命

作者简介：肖汉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杨丹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在工业 4.0、先进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工业革命的重要理念引领下，欧盟实施创建和完善数字化单一市场、推动数字化欧洲工业计划等举措，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与传统产业体系的全面深度融合，在数字化、信息化转型进程中挖掘经济新增长点。由于欧盟人力成本普遍较高，外包成为欧洲软件及信息服务企业优化服务、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外包业务的拓展不仅带动了欧盟软件贸易连年攀升，而且进一步加深了欧洲

软件市场的分工和联动。

一、欧洲软件业与贸易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软件业在欧洲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经过多年发展，软件业已成为欧盟经济体系中最重要行业之一，对各成员国经济增长做出突出贡献。根据商业软件联盟（BSA）2016 年的研究，软件业为欧盟直接和间接创造的产值分别达到 2490 亿和 9100 亿欧元。软件业直接和间接创造的产值高出欧盟成员国中 23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占欧盟 GDP 总额的比重达 7.4%。其中，英国软件业直接和间接创造产值为 1602 亿欧元，占其 GDP 的比重达到了 10.0%（见表 1）。由此可见，软件业对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 1 软件业对欧盟 5 个主要国家经济的贡献度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软件业直接创造产值占本国 GDP 比重（%）	2.9	2.1	1.7	1.3	1.2
软件业直接和间接创造产值占本国 GDP 比重（%）	7.1	5.2	5.3	3.2	3.4
软件业直接创造产值（亿欧元）	653	623	370	203	129
软件业直接和间接创造产值（亿欧元）	1602	1526	1131	508	35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BSA 报告《Software: A 910 Billion Catalyst for the EU Economy (2016)》整理而得。

软件业属于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产业，该行业对大量高素质人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欧元区长期以来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其中，西欧发达国家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业就业人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普遍超过 2%，且近年来这一比值仍有显著上升趋势。在软件业更为发达的英国、丹麦等国，软件从业人员占比超过 3%。

从研发投入看，信息、软件等行业的研发强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软件业重合程度最高的计算机编程、咨询及相关行业，其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普遍较高。西班牙、英国、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都将 8%~9% 的研发经费投入软件行业（见图 1）。再从研发人员的比例来看，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有 10% 以上的研发人员从事软件开发等相关行业，荷兰的这一比值更是超过了 16%。研发人员和投入经费高度集聚，反映出软件业作为智力密集行业的鲜明特点，也意味着软件业技术水平进步仍有较大空间。高度活跃的创新活动使得软件业有能力为消费者和其他经济部门提供日新月异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推动新工业革命、引领社会经济实现转型的强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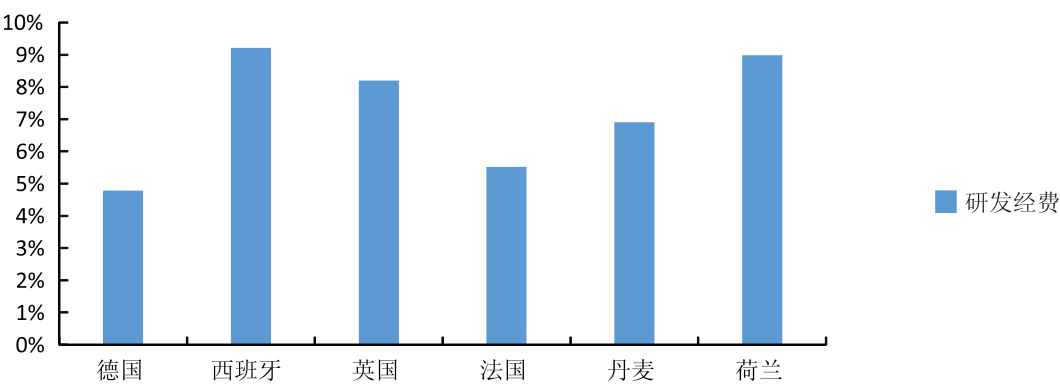


图 1 2015 年欧盟部分国家计算机编程、咨询及相关行业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二）欧洲各国软件业发展不平衡

与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对应，欧洲软件业发展同样存在不平衡问题。西欧国家软件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欧国家。西欧国家中，又属英国、德国的软件业规模较大。BSA 在 2016 年的研究显示，英国软件业产值占欧盟软件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 26.2%，德国占 25%，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紧随其后。其余欧盟国家软件业产值所占的份额仅为 20.4%（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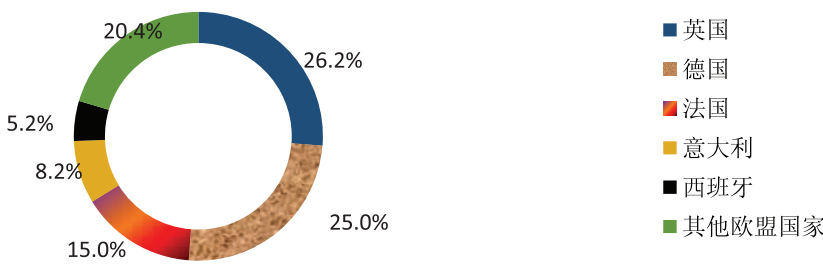


图 2 各国软件业产值占欧盟软件业总产值份额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BSA 报告《Software: A 910 Billion Catalyst for the EU Economy (2016)》整理而得。

（三）欧洲是全球软件市场的重要参与方

欧盟国家在全球软件业进出口中占据突出地位（见图 3）。在出口方面，欧盟国家软件总出口额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出口额之和。2015 年，欧盟国家计算机服务业的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 60.4%，形成了巨额顺差。欧盟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软件业主要出口方的角色，其软件业实力强大，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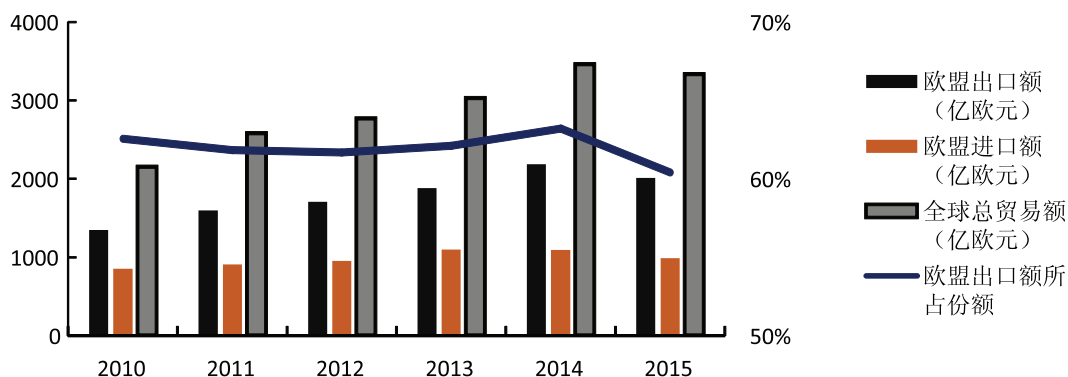


图3 欧盟国家计算机服务业进出口额变动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

（四）外包成为欧洲软件贸易的主要形式

除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大规模软件贸易，欧盟国家之间的软件贸易也十分活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高昂的人力成本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一直是软件企业多年来面临的难题。据 EDIG（e. Digital Corporation）统计，欧盟6个主要国家信息技术（IT）行业劳动力的缺口达到25万人。为了及时提供软件产品并控制成本，西欧的软件企业往往转向国外寻求接包企业的协助。

从欧洲内部软件业的分工体系看，西欧和北欧等经济发达、软件需求规模大的国家承担发包国的角色，而人力成本较为低廉的东欧国家则是软件外包的主要接包方。其中，英国、瑞典、德国、挪威等西欧和北欧国家是欧洲软件外包合同的最大发包国（见图4）。但总体而言，相比美国、日本等国的软件企业，欧洲企业在外包方面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软件开发的环节较多地保留在企业内部。欧洲企业通常重视对核心环节的掌控，并不倾向将其外包。2017年FORBA（Forschungs und Beratungsstelle Arbeitswelt）的一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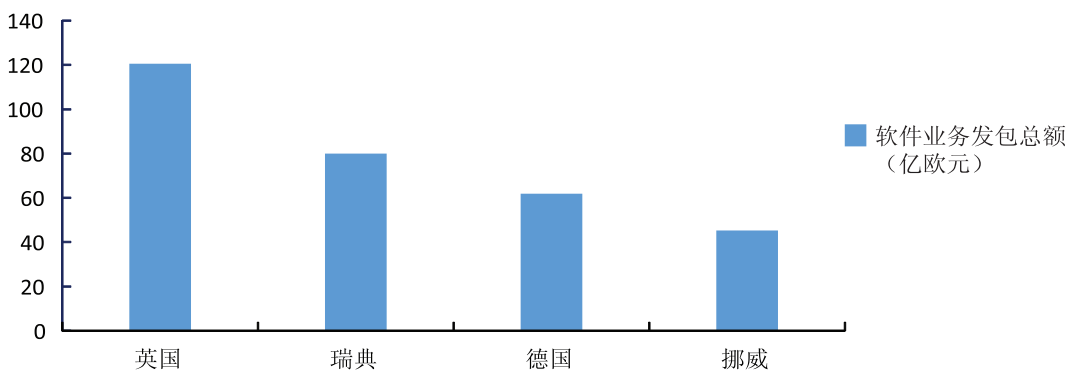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部分欧洲国家软件业务发包总额（亿欧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报告《Global IT – BPO outsourcing deals analysis》整理而得。

调查显示, 8 个主要欧盟国家软件企业外包业务占其软件交易的比重平均仅为 20% 左右。而在外包模式方面, 欧洲各国均比较青睐在岸外包。近年来, 中东欧国家软件业的快速崛起, 吸引了许多西欧国家向人力成本低廉、劳动力素质可靠的东欧地区发包, 近岸外包业务的比例随之有所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 新工业革命催生的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对软件贸易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生产和交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欧洲软件信息业发展对传统外包模式的倚重有所弱化。Computaris 在 2016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欧洲企业正逐渐脱离单纯寻求降低人力成本的思维, 转而寻求将外包模式转化成长时期、高质量的伙伴关系。基于长期伙伴关系的个性化、特质化解决方案, 将成为欧洲企业未来外包的重点。其中, 汽车控制软件、电子银行、个人信用记录等产品和业务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软件外包增长的爆发点。此外, 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对软件的需求开始大量进入软件外包市场, 欧洲大公司这方面的需求尤为迫切。

二、欧洲软件业的转型方向：典型国家分析

如前所述, 欧洲软件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欧洲各国对软件业的发展定位、重点应用领域也存在较大差别。本文以德国和爱尔兰为例, 分析欧洲软件业主要参与国的行业发展动向及其相关政策调整。

（一）工业 4.0 下的德国软件业发展

德国是欧盟内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德国软件业同样是欧洲大陆软件业的领头羊。根据 BSA 在 2016 年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 德国有 192 万个工作岗位与软件业相关, 约占德国全部就业的 4.5%。德国软件厂商数量居欧洲各国之首, 其软件市场是欧盟范围内最大的市场, 规模约占欧盟市场的 1/4。

支撑德国软件业强大竞争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德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长期保持高水平, 职业教育与产业部门的需求高度契合, 德国劳动力成本也具有一定优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 2005 年后德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速度在欧盟中是最低的, 这相当大程度得益于德国较为灵活的移民政策。同时, 德国还拥有开放度很高的市场、完善的法律环境和较低的宏观税负, 这些制度因素十分有利于软件业的投资和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 德国软件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 德国成熟的工业企业集群、良好的工业基础为软件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德国软件企业主要向电子、通信和机械等制造业厂商及商业部门提供配合硬件运用、服

务于硬件的嵌入式软件产品。德国不仅有思爱普等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大企业，也有众多为其他产业提供软件产品的活跃的中小企业，这是德国软件业的突出特点之一。

德国是工业 4.0 的发起国和积极倡导者。随着新工业革命兴起，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理念为德国软件市场的变革提供了机遇。尽管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德国大数据市场表现出巨大发展潜力。根据咨询公司 Experton 的估计，2020 年德国大数据市场的规模将增至 38 亿欧元。目前，德国对大数据的需求主要来自互联网、电子商务和广告等行业，大数据的深度开发及应用将在德国企业的生产、物流和销售等方面掀起广泛变革。

云计算则是另一个备受德国企业关注的领域。根据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BITKOM）开展的调查，45% 的德国企业已经运用与云计算相关的解决方案，以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云计算方面的支出约占德国企业信息技术支出的 5%。由于法规、安全等方面的限制，现阶段德国客户对本国数据中心提供的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见图 5）。据大阉拿觅克（Datacenter Dynamics）估计，到 2020 年，德国数据中心的总占地面积将可能高达 310 万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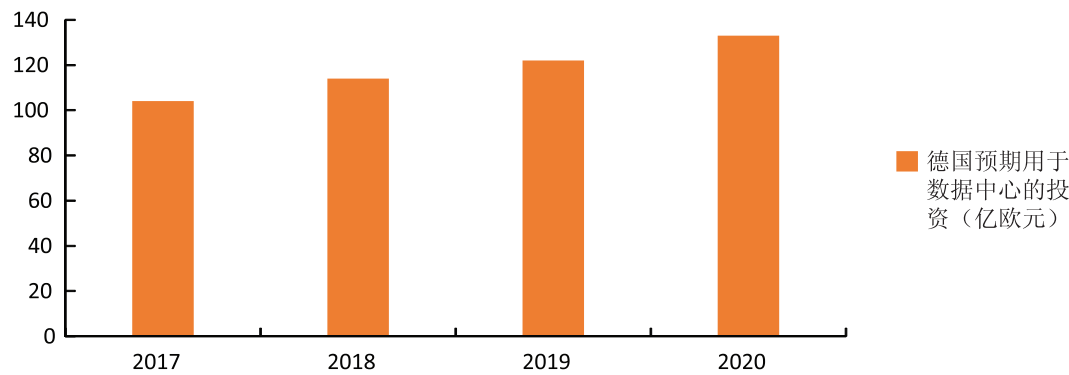


图 5 德国预期用于数据中心的投资（亿欧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Datacenter Dynamics 2016 年报告《Worldwide Colocation Data Center Investment》整理而得。

此外，能源转型、智能社会商务平台等政府战略计划的推行也将为德国软件业提供诸多机会。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先行者，德国联邦政府正加快实施能源转型计划，以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转型。未来，智能电力网络将成为德国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而更加分散化、更加依赖新能源的智能电网，需要更高水平的电力软件保驾护航。据 BITKOM 估计，智能电网软件市场规模将于 2020 年达到 100 亿欧元。智能社会商务平台的兴起则提出了对企业商务软件的需求。智能社会商务平台将极大提高企业内部协作和信息流通的效率。BITKOM 指出，83% 的德国 ICT 企业开始涉足这一市场。另据 Experton 估计，2019 年前德国智能社会商务平台市场的规模将以年均 50% 的速度增长。

(二) 加快转型的爱尔兰软件外包行业

爱尔兰地处欧洲一隅，从人口和经济上来说都是一个小国，却有着十分发达的软件行业，被誉为“欧洲硅谷”。目前，爱尔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软件业出口国。2015 年，爱尔兰计算机服务业出口额达到 636.4 亿美元，远超欧洲其他国家。通过承接国际外包特别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外包合同，爱尔兰培育了实力强大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集群。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从销售额来看，爱尔兰软件行业都表现出了强劲活力（见表 2）。

表 2 2008—2014 年爱尔兰软件编程、咨询和其他服务业基本信息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企业数目	6637	6960	7290	7619	8190	8532	8689
销售额（亿欧元）	190.22	200.03	215.72	288.23	339.08	378.62	400.98
雇员人数	29245	26008	27724	29705	32136	35610	40053

资料来源：爱尔兰中央统计办公室。

爱尔兰发展软件外包具有多项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爱尔兰具有强大的专业人才队伍。爱尔兰科技、数学与机械专业（STEM）毕业生占总人口比例居于欧盟首位。爱尔兰政府推行了 ICT 技能行动计划和学校数字战略等多个计划，以增强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为信息行业的发展预备人才。其次，爱尔兰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爱尔兰的税率较低，其企业所得税长期固定在 12.5% 的较低水平，其个人所得税法规对各类专业人才也颇具吸引力。除了税收之外，爱尔兰政府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手段鼓励企业发展，设立了投资发展局、企业局等机构与企业对接。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新技术新理念成为引导未来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价值源泉。爱尔兰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投资，鼓励创新，力争站在这一波浪潮的前列。2010 年，IBM 就在其都柏林分支设立了智能城市技术中心和研发实验室。2015 年开放的克罗克公园体育场被称为是首座物联网体育馆，也被视为智能城市测试平台。英特尔公司和地方政府在该项目中展开了密切合作。在大数据领域，爱尔兰同样表现不俗。都柏林已经成为欧洲数据中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拥有 30 个以上数据中心。2016 年，亚马逊宣布扩充其在爱尔兰的数据中心规模，增加 500 名员工；苹果和脸书将斥资数亿欧元建立新的数据中心。Equinix 也增加了在都柏林投资的计划。移动支付领域的巨头 ACI 环球公司则选择在利默里克建立新的数据中心。这些行业巨头的布局有利于巩固提升爱尔兰作为欧洲软件业发展“桥头堡”地位及其在全球软件外包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将助推爱尔兰在欧洲数字时代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三、影响因素与趋势展望

由于域内市场容量有限、监管法规发展滞后以及企业文化差异等多种原因，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欧洲软件企业相对于美国乃至亚洲的竞争对手，总体实力并不占优势。尽管如此，欧洲国家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科教体系，依然可以为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还有众多因素可对欧洲软件业的未来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从近期看，欧洲经济的复苏是对软件业的主要利好；而从远期看，英国脱欧所带来的转移效应、新工业革命创造的全新需求领域和欧盟层面的制度完善，为欧洲软件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欧洲传统工业集群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对软件产品形成可观需求，欧盟通过破除不合理监管和市场分割也将释放改革红利，从而有望为欧洲软件业拓展其全球竞争力开辟广阔空间。

（一）经济温和复苏将对欧洲软件贸易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2016年以来，欧洲经济呈现缓慢温和复苏的态势。目前，这一复苏进程显示出逐渐加速的迹象。2016年年末，欧洲央行指出，欧洲经济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7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预测，2017年欧盟经济将增长2.3%，这是5年以来该地区最快的经济增速。而2018年和2019年的预测增速则为2.1%和1.9%。同时，欧元区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在今后两年也将下降。目前，不仅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增长势头，曾经深陷危机的南欧主要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显现出复苏的征兆。国际市场对欧洲经济增长信心的恢复可能催生科技行业投资增加，欧洲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也将提升企业进行设施更新换代和信息化、数字化改造的愿望，从而为欧洲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英国退出欧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严重冲击，但欧洲大陆国家继续推进一体化建设的意愿仍有坚实基础。2017年3月，27个欧盟成员国发表罗马宣言，宣布将把欧盟建设成可持续、有竞争力的联盟，在全球化和其他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创造经济增长的新机遇。法国、德国等欧盟重要国家的政治领袖也多次公开强调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欧盟的团结和发展。经过英国脱欧所引发的短暂动荡之后，市场信心开始逐渐恢复。未来欧盟一体化市场的逐步巩固和扩大，可望为欧洲软件业与贸易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从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看，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机构与主要推动力，欧盟始终致力于欧洲经济社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2015年，欧盟提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

要求创建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市场环境。2016 年，欧盟发布了《数字战略行动计划》，将信息化形容为今后欧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旨在建设有活力的一体化数字市场，培育民众的数字化知识和技能，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同时，欧盟国家将继续致力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促进数字化议题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保护信息安全。这些政策信号均将为欧洲软件和信息服务市场带来巨大需求，成为欧洲软件业持续发展的政策利好。

（二）新工业革命为欧洲软件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0 世纪末以来，欧洲经济逐渐显现出“去工业化”的趋势。尽管欧盟工业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竞争力，但由于生产环节持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欧洲工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显著降低。欧盟工业的总体衰退直接反映在欧盟产业结构上。2000 年，工业增加值还占据欧盟 GDP 的 18%，而到了 2010 年，这一比值已经下降到谷底的 14%。同时，产业结构的分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进而损害其政治团结。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的英法等西欧国家与制造业依然举足轻重的德国和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以在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上达成共识。

近年来，以智能制造为主导，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欧洲经济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欧洲工业转型升级提速。2016 年，欧盟议会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未来 5 年内，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每年将为欧洲创造 1100 亿欧元的市场，成为欧洲重要的增长点。为此，欧盟和产业界已展开合作，谋求提高欧洲制造业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早在 2009 年，欧盟就开展了公私合作的未来工厂（Factories of Future）项目。2013 年，欧盟发布了未来工厂 2020 路线图，提出了欧盟工业发展战略的新愿景。欧盟“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是到 2020 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提升至 20% 的高位，并确立了清洁生产、生态产品、关键使能技术、可持续的建筑材料、清洁车辆和智能电网等优先发展领域。德国的工业 4.0、法国的新工业法国计划等，都是欧洲国家为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而推出的代表性战略。现阶段由于欧洲国家对新工业革命的准备程度不同，观念有所分歧，2016 年欧盟又推出了数字化欧洲工业计划，试图整合欧盟各国推进工业智能化、绿色化的努力，为各国工业的网络互联、标准互通创造条件。这一计划旨在加快传统制造业的现代化转型，促进信息技术和传统行业的整合，推动中小企业在信息时代的适应和发展。传统工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物联网等理念对工业体系的根本重塑，需要大量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和通信设施的支撑，从而催生对配套软件的巨大需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深度交织，

新的价值领域不断延展，将为欧洲软件业转型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三）面临英国脱欧与全球化进程波折的挑战

2016 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方式决定脱离欧盟，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其贸易政策导向也更趋保守。这些标志性事件导致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出现逆转和倒退风险，“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可能对欧盟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信息产业是智力高度密集的行业，知识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标准与法规的一致性对信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脱欧会使整合英国与欧洲大陆市场的漫长努力付之东流。例如，欧美数据共享协议即“安全港协议”已运行 15 年，英国脱欧后，其公民将不再受该协议及后续协议保护。据英国《镜报》2016 年初统计，87%的科技行业从业者明确反对英国退出欧盟。另据 Juniper Research 调查，65%的受访者认为英国脱欧会对全球科技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脱欧也将为欧盟软件业带来新的机遇。首先，英国退出欧洲统一市场后，为数众多的科技企业可能转向欧洲大陆进行投资。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 10 年间，伦敦所吸引的国际科技投资项目超过了巴黎、都柏林、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慕尼黑等城市之和。在欧洲科技独角兽公司中，超过 1/3 位于英国。英国脱欧后，英国与欧洲大陆市场之间的隔离将导致投资转向欧洲大陆。例如，2017 年初，微软公司就曾提出，有可能将计划建设的数据中心从英国迁往欧洲大陆国家。其次，欧盟软件业将获得更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英国招聘与就业联合会（REC）强调，IT 行业是英国对外国员工需求最大的行业之一。英国脱欧使得许多员工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选择。而英国人力资源协会（CIPD）在 2017 年年中的调查显示，近 1/3 的英国企业表示欧盟籍员工正考虑离职。回流欧洲大陆的人才将为欧洲软件企业提供更多劳动力供给，有效控制人力成本，提高劳动力队伍的总体素质。此外，英国脱欧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依然坚持开放政策，努力维护和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无疑起到了欧盟压舱石的作用。稳固的欧洲统一市场将有利于吸引软件企业的投资。

（四）削减管制与破除市场分割释放政策红利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服务业在欧洲国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但相对其他领域而言，长期以来，欧盟统一市场在服务业方面开放的程度不足，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目前，欧盟服务业的交易仅有 20%是跨境交易。法律障碍和语言、文化等非法律壁垒阻碍欧盟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一体化。为此，欧盟已多次出台政策措施，削弱欧盟领域内针对服务业的由来已久的法律和行政壁垒。例如，2006 年欧盟发布《服务指令》，简化企业跨境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手续，并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

2012 年以来，随着债务危机后“疑欧情绪”的涌动，部分欧洲国家转向保护主义。特别是意大利、希腊等在危机中受创较为严重的国家，试图加大政策力度，保护本国竞争力相对较弱的服务业。为此，欧盟努力采取行动遏制相关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促进服务业一体化进程的延伸。2017 年，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四大措施以提升服务部门的竞争力。首先，建立新的电子审批流程。新流程中，包括信息服务业在内的企业若要在其他欧盟国家开展业务，只需向所在国政府部门提交申请，所在国政府部门会自行将材料转递目标国政府部门，由后者进行裁量。其次，控制各国关于从业资格的规定。欧盟将要求各国在确立从业资格规范时保证透明度，并限制从业资格规定的规模。再次，出台行业规范指南。欧委会将指导各成员国对行业规范进行修订，以确保各国行业规范的开放透明。具有高成长性、能创造就业的服务行业将得到重点关注。最后，加强各国立法通报。欧盟将要求各国在服务业规制立法早期向欧委会通报立法的内容和目标，以便及时纠正不符合欧盟规范的立法行为。这些规定通过优化审批流程、促进规范相容等方式，降低企业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的成本，破除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为劳动力在行业间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

应该看到，欧洲服务业的高壁垒、强管制由来已久，放松对服务行业的管制、降低各国间服务贸易壁垒的过程，将为软件业持续增长注入政策红利，刺激欧洲企业进一步加大对移动互联网等消费端应用软件的开发，更好对接新商业模式并满足数字时代消费升级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娜、唐守廉：《欧盟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2.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16》，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6 年版。
3. 刘金瑞：《欧盟网络安全立法最新进展及其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4. 刘志斌、祝琳：《欧洲软件业与贸易发展的现状、特点及趋势》，《全球化》2017 年第 8 期。
5. BSA. Software: A 910 Billion Catalyst for The EU Economy, <http://softwareimpact.bsa.org/eu/>.
6. DCD Intelligence. Worldwide Colocation Data Center Investment, 2016.
7. Computaris. Global IT – BPO Outsourcing Deals Analysis, 2017.

责任编辑：李 蕊

推动创新设计 迈向制造强国

——王晓红等著《创新设计引领中国制造》推介

书 讯

王晓红等著《创新设计引领中国制造》一书，是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委托课题《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行动纲要研究》（2016年）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人民出版社于2018年3月出版。该课题研究成果为相关文件编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撑。研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供创新动力支撑，同时作为我国第一个创新设计发展规划，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创新设计发展描绘了蓝图、指出了方向，明确了我国制造业中长期创新设计的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

制造业是强国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两个“中高”的关键转折时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动力之源。

创新源自设计，创新贵在设计。设计是将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及服务的先导，决定着制造与服务的品质和价值，因此是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起点和源头。随着社会由传统工业经济向以网络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新经济发展，传统工业设计正在向创新设计演进和拓展。创新设计以绿色低碳、网络智能、开放融合、共创分享为主要特征，为产品和产业的全过程提供系统性服务，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于一体，涵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设计和服务模式设计，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创造市场新需求的关键核心环节。创新设计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制造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日益增多，发展创新设计不仅是有效改善制造业供给侧结构、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长期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和引领跨越，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突破口。

本书研究立足全球视野、国家战略高度，坚持前瞻性、创新性、引领性和针对性，

注重理论创新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分析系统全面、资料详实，对于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进创新设计发展，都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全书由总报告和 7 个专题报告、4 个国际考察和国内调研报告、5 个案例分析组成。

第一篇为总报告，从战略层面系统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创新设计的规划思路与发展愿景，分析了我国创新设计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创新设计取得的重大成就与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创新设计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领域和区域布局，以及实施路径、保障措施等，形成了《行动纲要》（建议稿）的重要基础。

第二篇为 7 个专题报告，作为总报告的重要支撑。专题一着重研究了创新设计的基本内涵及“十三五”乃至未来时期发展创新设计的战略意义，指出了我国创新设计取得快速发展与重大突破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发展的主要思路。专题二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现状及趋势，阐述了制造业创新设计竞争力显著提高及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专题三从提高重点产业创新设计能力、提高企业创新设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强创新设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创新设计人才体系、完善创新设计生态体系等方面阐述了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的主要任务。专题四着重研究了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设计、航空航天装备设计等 11 个领域。专题五着重研究了我国创新设计发展的区域布局，分析了各区域创新设计发展的主要优势，提出了优化创新设计区域布局的总体设想。专题六着重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创新设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强规划组织引导、建立创新设计产业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创新设计人才体系、推动建设创新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创新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创新设计宣传推广工作等。专题七着重研究了世界创新设计强国以及具有创新设计特色的国家和地区创新设计的发展进程及促进政策。

第三篇为国际考察与国内调研报告。课题组分别考察了英国、德国的创新设计有关情况。重点分享了剑桥大学培养创新设计人才的经验和做法；德国创新设计机构、中小企业、设计孵化器在创新设计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政府推动设计发展的经验；英国的设计企业、设计组织、设计政策的发展经验等，对我国发展创新设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课题组重点对我国创新设计发达地区广东省进行调研，并提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圈的构想。

第四篇为国际国内创新设计典型案例分析。在国外创新设计案例中，分别从设计创新型企业、设计组织转型、设计教育创新等方面，分享了苹果公司、三星公司的成功经验。在国内创新设计案例中，重点从创新设计企业、创新设计示范区、创新设计教育、创新设计大奖等方面分享了小米集团、红领集团、顺德广东工业设计城、中国好设计大奖等的成功经验。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年4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 2018、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4月17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指出，全球投资和贸易继续回升，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8%，比2016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成为201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此轮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广泛，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地区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显著增长。相较2017年10月，2018、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均上调了0.2个百分点至3.9%，反映了全球增长继续加强，同时IMF还将中国2018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了0.1个百分点至6.6%。

报告认为，自2016年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回升已变得更为广泛、更为强劲，这一结论得到欧元区、日本、中国和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表现的支持，2017年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超出预期。发达经济体2018—2019年将继续以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速度扩张，随后经济增长将减速，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加快，随后趋于稳定。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当前有利的经济增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一机会巩固增长，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并加强政府应对下次衰退的能力。

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2018、2019年经济增长分别为2.5%和2.2%，相较2017年10月份，分别上调了0.5个和0.4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临时性的财政刺激政策，相较2017年10月份，IMF对美国2018、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2.3%和

1.9%提高到 2.9%和 2.7%，分别上调了 0.6 和 0.8 个百分点；在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欧元区经济体的过剩产能将缩小，对欧元区 2018、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1.9%和 1.7%提高到 2.4%和 2.0%，分别上调了 0.5 和 0.3 个百分点；对日本的预测分别从 0.7%和 0.8%提高到 1.2%和 0.9%，分别上调了 0.5 和 0.1 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增长预计将进一步加强，亚洲和欧洲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强劲增长，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在经历了 3 年增长疲软后将略有回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8、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 4.9%和 5.1%。相较 2017 年 10 月份，IMF 对中国 2018、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6.5%和 6.3%提高到 6.6%和 6.4%，均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8、2019 年的经济表现也好于此前的预测，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欧洲新兴经济体。相较 2017 年 10 月份，IMF 对巴西 2018、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从 1.5%和 2.0%提高到 2.3%和 2.5%，分别上调了 0.8 和 0.5 个百分点；对墨西哥的预测分别从 1.9%和 2.3%提高到 2.3%和 3.0%，分别上调了 0.4 和 0.7 个百分点。

尽管近期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大致平衡，报告认为，未来几个季度之后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已启动，但金融状况仍宽松的环境下，可能出现金融状况急剧收紧的局面，使过去积累的金融脆弱性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二是对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担忧在加剧，同时贸易失衡也在扩大，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普遍支持减弱，可能导致各国转向采取内向型政策，从而破坏国际贸易和投资；三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网络安全漏洞对疲弱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期前景造成了进一步威胁。

目前，全球经济的周期性上升为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时机，使各国能够推进相关政策和改革，保持当前的回升势头，并提高中期增长率，以造福所有人。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很多措施，以促进更强劲、更有韧性、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为应对包括世界贸易治理在内的各种挑战，多边合作仍至关重要。全球相互依赖性只会继续增强，除非各国以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来面对这一环境，否则全球经济无法繁荣发展。

（二）世界贸易组织：2018、2019 年全球贸易将维持强劲势头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 年 4 月 12 日宣布，2017 年的货物贸易量比上年增长 4.7%，达到 2011 年以来、时隔 6 年的高水准，起到拉动作用的是亚洲。从具体国家来

看，中国夺回了贸易额首位宝座。WTO 预测，2018 年也将维持强劲势头，但中美贸易摩擦等未来的风险正在加大。

从全球整体货物贸易额来看，出口额为 17.198 万亿美元，进口额为 17.572 万亿美元，分别增长约 11%。WTO 表示，“旺盛的个人消费和投资是全球贸易的增长引擎”，原油等资源价格上升也成为东风。亚洲的进出口均实现 2 位数增长，与北美和欧洲相比，增势更加突出。

从个别国家的货物贸易额来看，中国达到 4.105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时隔 2 年重回首位。中国进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及零部件生产智能手机等最终产品出口的趋势扩大，以美国消费扩大为背景，电子产品和玩具对美出口也出现增加。货物贸易额居第 2 位的美国，由于企业积极进行设备投资，计算机和工业机械等生产资料进口大幅增加。居第 4 位的日本，主要面向亚洲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正在扩大。

WTO 预测，2018 年全球贸易量将比 2017 年增长 4.4%。在全球经济保持强劲的背景下，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扩大，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增长势头将得以保持。不过，目前的贸易环境极为不稳定。美国提高了对钢铁和铝的关税，又向中国表示，作为反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措施将提高机械等关税。中国方面也提出了展开报复的方针。如果中美走向贸易战争，将对全球经济构成沉重打击。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在 2018 年 4 月 12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非常积极，贸易的强劲增长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预测 2019 年的货物贸易量增速为 4.0%，但仍敲响警钟：“乐观的预测没有考虑贸易限制的影响，如果贸易限制扩大，好转的趋势将迅速遭受损害。”

（三）IMF 总裁：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2018 年 4 月 12 日在香港亚洲全球研究所的演讲中警告称，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着因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而“分崩离析”的风险。

拉加德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时代，多边贸易体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它促使全球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它降低了生活成本，还创造了数百万薪酬更高的全新就业岗位。可是现在，这一规则及共同责任体系却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如果这一危险成为现实，那将是一项不可原谅的集体性政策失败”。

自 2018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对进口钢铁征收 25% 及对铝征收 10% 关税的行政命令以来，引发全球对贸易战的担忧。随后，美国于 2018 年 4 月 3 日发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

单建议，而中国强力反击。迄今为止，这两个主要经济体已经宣布对彼此的关键出口产品征收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关税。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援引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称，全球关税的变化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收缩达 3%，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1%。拉加德抨击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的关注，她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更加密切地关注美国国内经济，以改善其总体贸易赤字。

（四）IMF 预警全球房价同步上涨，建议通过房产税等手段抑制过热

IMF 于 2018 年 4 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全球主要国家和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同步上涨，凸显了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但其中存在的风险值得各国关注。

报告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维持超低利率，全球经济缓慢复苏，这些因素推动了全球房价同步上涨。此外，富人和私募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加大了房地产投资，推高了全球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各国决策者应密切关注全球房价同步上涨的趋势，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或估值过高的情况下。建议通过提高房产税和印花税、控制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等手段抑制房地产过热风险。

（五）IMF 报告称制造业就业减少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

IMF 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整体经济生产率下降，也不是各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交通、电信、金融商贸等更高效的服务行业，整体经济生产率会随之提升。

近年来，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导致部分国家政策“向内看”。决策者和学者担心，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正导致生产率下降，拖累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IMF 研究报告显示，21 世纪头 10 年，在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就业人口稳步转移至服务业，而这种结构性改变对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发展中经济体，就业人口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则极大推动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尽管制造业内部收入差距小于服务业，但没必要担心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源于所有行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与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关系不大。另外，技术发展和贸易扩大导致中低水平技术工作减少，并抑制这些岗位薪资增长。IMF 建议，各经济体应降低国际服务贸易壁垒，以促进高生产率的服务行业的扩张，同时强化技能再培训，帮助民众更好实现重新就业。

（六）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初级商品出口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8 年 4 月最新发布的数据，全球还有 9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仍然依赖初级商品出口。

联合国贸发会议表示，受技术因素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增加太多商品价值，并且在向其他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这大大限制了其工业化发展速度和水平。这些国家出口的农产品、矿石或原油等初级商品占到其出口总值的 60% 或更多。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61 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 80% 以上依赖商品出口。因此，这些商品价格的波动容易对其宏观经济产生严重打击，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后果。为此，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有限的技术转让，包括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链条上的基础设施。同时，在农业和矿业价值链中，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开发有助于提高商品的附加值。为帮助依赖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价值链将是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银行上调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结果

世界银行 2018 年 4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6.5%，比 2017 年 10 月预计的 6.4% 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预计 2018 年中国消费会加快，这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中国的开放以及扩大内需等措施，或可抵消贸易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世行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应更加强调平衡内外需，更加注重消费和服务业增长，使得经济从过去的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更加强调放慢信贷增长速度和提高发展质量。世界银行上调中国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部需求改善和国内消费增长快速。尽管中国目前更加强调防范金融风险，但是中国短期、中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在提高，而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在降低。

世行预计，2018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5%，低于 2017 年的 6.9%。预计 2018 年中国消费增长会加快，其中居民消费增速为 7.4%，高于 2017 年的 7%，政府消费增速为 8.2%，高于 2017 年的 8.1%。投资增速比较稳定。进出口速度有望放慢，2018 年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增速分别为 6.5% 和 7.2%，比 2017 年的 7.1% 和 8% 增速有所放慢。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苏迪尔·谢蒂指出，很多全球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这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如果中美贸易发生摩擦，会破坏全球价值链。不过，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仍比较乐观，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这些地区对于全球经济放慢有抵御能力，中国对于一些新兴国家的出口会快速增长。

（二）亚行：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定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2018 年 4 月 11 日最新发布的《2018 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表示，得益于经济改革、强劲的国内外需求及服务业发展，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定增长，预计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6.6%，2019 年为 6.4%。

亚行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化解债务风险等经济改革措施将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亚行同时表示，2017 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率达 8%，未来服务业发展和强劲的国内外需求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三）国际投资者积极评价中国市场开放政策

针对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有关进一步加速推进市场开放的承诺以及中国央行确定的具体开放举措，澳新银行认为，中国设定了明确的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中共十九大以来的重大进展，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举措，这将有助于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在中国市场开放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快速发展，成为海外投资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瑞银集团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在 2017 年 11 月份公布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意在加速中国投资行业的发展，取消共同基金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这对国际机构非常具有吸引力。随着中国开放不断加速推进，中国将为全球投资管理机构提供增长机会。

瑞银财富伦敦投资办公室负责人余修远表示，深港通和沪港通每日额度提高，不仅展示了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意愿和努力，也意味着未来人民币汇率灵活度将提升。沪伦通的推进也将使英国成为海外投资者在大中华区之外持有中国在岸股票的唯一窗口。这也将提升英国作为基金业中心的吸引力，同时还将巩固伦敦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交易和清算中心地位。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更详细、更明确地列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措施的实施时间，并重申中国将加强对外开放和支持区域协作的决心。如果相关

措施得到有效落实，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将会降低。同时，中国更详细地公布了相关措施的实施时间表，增强了市场对中国贯彻执行开放市场措施的信心。

在一系列最新发展趋势的驱动之下，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开始强化中国市场布局。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登了全球第一大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近期给股东的年度信函。他在信中表示，有三大趋势可能“极大地改变我们公司和我们的行业”，分别是全球退休市场的变化、科技日益强大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机遇。“从现在到未来，贝莱德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加在世界各地高增长市场的影响力和渗透率，尤其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人口、经济和监管方面的变化，包括这些市场的高储蓄率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将创造重大机遇”。分析认为，近期中国市场的开放，尤其是向贝莱德等外资机构开放外资独资企业牌照和私募基金牌照，使贝莱德有能力在 2018 年夏天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量化基金。

美国花旗集团旗下花旗信托基金的亚洲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奥尔德克罗夫特也表示，在中国政府最新的开放决策下，外资公司最早在 2020 年就可以 100%持股内地基金管理公司，这将为国际机构提供一个巨大的机会。

另一值得关注的外资动向来自汇丰集团。据路透社报道，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新年度计划在精简内部机构的同时，将把亚洲特别是中国作为加倍投资的重点。近年来，汇丰因为全球低利率、重组成本及监管空前严格而面临获利能力弱化的挑战。汇丰未来新的管理团队将加强对中国业务的侧重力度，期待搭乘中国经济增长快车，提振集团盈利能力。据悉，汇丰未来将扩大中国区员工雇佣，并将投资范围从中国南部地区扩展至中国其他地区。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4 月)				
世 界	3.2	3.8	3.9	3.9
发达国家	1.7	2.3	2.5	2.2
美 国	1.5	2.3	2.9	2.7
欧元区	1.8	2.3	2.4	2.0
日 本	0.9	1.7	1.2	0.9
发展中国家	4.4	4.8	4.9	5.1
印 度	7.1	6.7	7.4	7.8
俄罗斯	-0.2	1.5	1.7	1.5
巴 西	-3.5	1.0	2.3	2.5
世界银行(WB,2018 年 1 月)				
世 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6	2.3	2.2	1.9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 年 4 月)				
世 界	2.5	3.2	3.3	3.2
美 国	1.5	2.3	2.8	2.6
欧元区	1.8	2.5	2.4	1.9
日 本	0.9	1.7	1.4	1.1
印 度	7.1	6.7	7.4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世 界	2.3	4.9	5.1	4.7
进口				
发达国家	2.7	4.0	5.1	4.5
发展中国家	1.8	6.4	6.0	5.6
出口				
发达国家	2.0	4.2	4.5	3.9
发展中国家	2.6	6.4	5.1	5.3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 估计值	2018 年 预测值	2019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4 月)				
世界	2.8	3.1	3.3	3.3
发达国家	0.8	1.7	2.0	1.9
发展中国家	4.3	4.0	4.6	4.3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 年 5 月)				
世 界	2.5	2.5	2.7	2.6
美 国	1.3	2.1	2.5	2.2
欧元区	0.2	1.5	1.5	1.5
日 本	-0.1	0.5	1.0	1.1
印 度	4.5	3.6	4.9	4.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7 年		2.1	1.4	3.4	
	4 月	2.3	1.9	3.9	
	5 月	2.1	1.6	3.5	
	6 月	1.9	1.4	3.3	
	7 月	2.2	1.5	3.1	
	8 月	2.2	1.6	3.4	
	9 月	2.2	1.6	3.5	
	10 月	2.3	1.5	3.5	
	11 月	2.2	1.6	3.2	
	12 月	2.1	1.6	3.3	
	2018 年	1 月	2.1	1.5	3.0
		2 月	2.2	1.4	3.2
3 月		2.3	1.4	2.8	
4 月		2.1	1.6	2.8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7 年		4.2	3.0	5.4				
	4 月	3.8	2.6	4.9	52.7	53.6	53.6	
	5 月	4.5	3.4	5.4	52.6	53.4	53.5	
	6 月	3.8	3.1	5.0	52.6	53.2	53.3	
	7 月	3.8	3.1	5.4	52.7	53.1	53.6	
	8 月	3.8	3.3	5.4	53.1	53.7	54.2	
	9 月	3.8	3.0	5.6	53.2	53.9	53.7	
	10 月	4.4	3.1	5.1	53.4	53.7	54.1	
	11 月	4.4	3.5	5.3	54.0	54.9	55.1	
	12 月	4.3	3.6	5.5	54.5	55.5	55.8	
	2018 年	1 月	5.0	2.6	6.8	54.4	55.6	55.4
		2 月	5.0	3.1	6.4	54.1	54.8	55.0
3 月		3.7	3.2	5.1	53.3	53.4	53.7	
4 月					53.5	53.9	53.9	

二、美国经济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2.2	3.8	-0.9
	3 季度	2.8	2.8	0.5
	4 季度	1.8	2.9	0.2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1.2	1.9	-0.6
	2 季度	3.1	3.3	-0.2
	3 季度	3.2	2.2	0.7
2018 年		2.9	4.0	3.0
	1 季度	2.3	1.1	1.2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0.7	-0.3	1.3
	2 季度	1.4	2.8	0.4
	3 季度	1.5	6.4	2.7
	4 季度	1.7	-3.8	8.1
2017 年		4.0	3.4	4.0
	1 季度	8.1	7.3	4.3
	2 季度	3.2	3.5	1.5
	3 季度	2.4	2.1	-0.7
2018 年		8.2	7.0	14.1
	1 季度	4.6	4.8	2.6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1.2	2.8	0.6
	3 季度	1.5	2.8	0.4
	4 季度	1.8	2.8	0.4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2.0	2.9	-0.2
	2 季度	2.2	2.7	0.0
	3 季度	2.3	2.6	0.0
2018 年		2.6	2.8	0.7
	1 季度	2.9	2.6	1.2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2.2	3.8	-0.9
	3 季度	2.8	2.8	0.5
	4 季度	1.8	2.9	0.2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1.2	1.9	-0.6
	2 季度	3.1	3.3	-0.2
	3 季度	3.2	2.2	0.7
2018 年		2.9	4.0	3.0
	4 季度			
	1 季度	2.3	1.1	1.2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0.7	-0.3	1.3
	2 季度	1.4	2.8	0.4
	3 季度	1.5	6.4	2.7
	4 季度	1.7	-3.8	8.1
2017 年		4.0	3.4	4.0
	1 季度	8.1	7.3	4.3
	2 季度	3.2	3.5	1.5
	3 季度	2.4	2.1	-0.7
2018 年		8.2	7.0	14.1
	4 季度			
	1 季度	4.6	4.8	2.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5	2.7	0.8
	2 季度	1.2	2.8	0.6
	3 季度	1.5	2.8	0.4
	4 季度	1.8	2.8	0.4
2017 年		2.3	2.8	0.1
	1 季度	2.0	2.9	-0.2
	2 季度	2.2	2.7	0.0
	3 季度	2.3	2.6	0.0
2018 年		2.6	2.8	0.7
	4 季度			
	1 季度	2.9	2.6	1.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0.7	−0.3	1.3
	2 季度	0.5	−1.6	0.5
	3 季度	0.1	1.0	0.7
	4 季度	1.1	0.6	2.7
2017 年		4.0	3.4	4.0
	1 季度	3.2	3.1	3.8
	2 季度	3.6	3.2	4.1
	3 季度	3.8	2.2	3.2
2018 年		5.4	5.0	4.7
	1 季度	4.6	4.3	4.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7 年		1.2		4.4	227.5
	4 月			4.4	17.5
	5 月			4.3	15.5
	6 月	1.7	1.4	4.3	23.9
	7 月			4.3	19.0
	8 月			4.4	22.1
	9 月	2.6	1.4	4.2	1.4
	10 月			4.1	27.1
2018 年	11 月			4.1	21.6
	12 月	0.3	1.2	4.1	17.5
	1 月			4.1	23.9
	2 月			4.1	32.4
	3 月	0.7	1.3	4.1	13.5
	4 月			3.9	16.4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7 年	21913		3.4	28128		3.9	−6215
	3 月	1917	0.0	6.6	2364	0.1	8.8
	4 月	1906	−0.6	4.7	2386	0.9	8.3
	5 月	1908	0.2	4.8	2386	0.0	6.7
	6 月	1931	1.2	5.1	2386	0.0	4.9
	7 月	1933	−0.1	4.3	2387	0.0	5.3
	8 月	1937	0.2	3.4	2383	−0.2	4.3
	9 月	1959	1.1	4.1	2412	1.2	6.5
2018 年	10 月	1957	−0.1	5.4	2448	1.5	7.1
	11 月	2002	2.3	8.3	2511	2.6	8.6
	12 月	2036	1.7	7.4	2575	2.6	10.0
	1 月	2009	−1.3	5.1	2576	0.0	7.4
	2 月	2044	1.7	6.6	2621	1.7	11.0
	3 月	2085	2.0	8.8	2575	−1.8	8.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 季度	1414	777	637
	2 季度	1617	762	855
	3 季度	1091	889	203
	4 季度	448	379	69
	2017 年	2754	3423	−669
	1 季度	770	1102	−332
	2 季度	816	838	−22
	3 季度	640	676	−36
	4 季度	528	806	−27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4	0.3	0.2
	4 季度	0.6	0.6	0.3
2017 年		2.4	1.7	1.2
	1 季度	0.6	0.5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3	0.4
	4 季度	0.7	0.2	0.3
2018 年				
	1 季度	0.4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6	3.4	4.8
	1 季度	0.4	0.5	0.4
	2 季度	2.6	1.4	2.0
	3 季度	0.6	0.4	0.6
	4 季度	0.7	1.5	1.7
2017 年		2.9	5.1	4.3
	1 季度	0.1	1.4	0.3
	2 季度	2.0	1.2	1.8
	3 季度	-0.3	1.7	0.7
	4 季度	1.2	2.2	1.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7	244.3	9.1
	3 月	0.1	1.1	78.9	9.4
	4 月				9.2
	5 月				9.2
	6 月	0.3	0.2	64.0	9.0
	7 月				9.0
	8 月				9.0
	9 月	0.3	0.7	59.9	8.9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4	0.9	41.5	8.6
2018 年					
	1 月				8.6
	2 月				8.5
	3 月				8.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2 季度	1.7	2.0	1.9
	3 季度	1.7	1.8	1.7
	4 季度	1.9	1.9	1.6
2017 年		2.4	1.7	1.2
	1 季度	2.1	1.7	1.0
	2 季度	2.4	1.9	1.1
	3 季度	2.7	1.9	1.4
	4 季度	2.8	1.5	1.4
2018 年				
	1 季度	2.5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4.6	3.4	4.8
	1 季度	3.1	3.2	4.2
	2 季度	5.5	3.2	5.3
	3 季度	5.1	3.3	4.9
	4 季度	4.4	3.8	4.8
2017 年		2.9	5.1	4.3
	1 季度	4.1	4.8	4.7
	2 季度	3.5	4.5	4.5
	3 季度	2.5	5.8	4.5
	4 季度	3.0	6.6	4.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口 额
2017 年	21953		7.1	19617		10.0	2336
	3 月	1843	2.3	14.9	1631	0.3	17.3
	4 月	1802	-2.2	-1.5	1628	-0.2	5.1
	5 月	1846	2.4	13.8	1661	2.0	18.7
	6 月	1807	-2.1	4.2	1601	-3.6	6.9
	7 月	1787	-1.2	5.9	1617	1.0	9.1
	8 月	1836	2.7	7.0	1630	0.8	9.2
	9 月	1850	0.8	5.2	1614	-1.0	5.6
	10 月	1811	-2.1	9.0	1635	1.3	10.8
	11 月	1889	4.3	8.6	1682	2.9	9.3
	12 月	1920	1.6	0.9	1686	0.2	2.6
2018 年							
	1 月	1902	-0.9	9.0	1702	0.9	5.9
	2 月	1854	-2.5	2.8	1644	-3.4	1.1
	3 月	1869	0.8	-2.9	1657	0.7	-2.5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847	1355	- 508
	3 月	474	560	- 86
	4 月	60	308	- 248
	5 月	60	262	- 202
	6 月	34	- 246	280
	7 月	- 1626	- 1645	19
	8 月	118	26	92
	9 月	45	140	- 95
	10 月	423	745	- 322
	11 月	76	127	- 51
	12 月	- 264	- 128	- 136
2018 年				
	1 月	110	357	- 247
	2 月	206	250	- 43
	3 月	- 326	305	- 631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2 季度	0.3	- 0.3	- 1.2
	3 季度	0.2	0.4	0.4
	4 季度	0.2	0.0	- 0.2
2017 年		1.7	1.0	0.2
	1 季度	0.7	0.5	0.2
	2 季度	0.5	0.7	0.2
	3 季度	0.5	- 0.7	0.0
2018 年				
	1 季度	- 0.2	0.0	0.0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2 季度	1.0	- 0.6	- 0.9
	3 季度	0.1	2.2	0.1
	4 季度	0.7	2.7	0.8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0.5	2.1	1.6
	2 季度	1.7	- 0.1	1.8
	3 季度	- 0.1	2.0	- 1.3
2018 年				
	1 季度	0.0	2.2	3.1
2018 年				
	1 季度	- 0.3	0.6	0.3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2 季度	0.8	- 0.2	1.2
	3 季度	0.9	- 0.1	1.3
	4 季度	1.5	0.5	0.2
2017 年		1.7	1.0	0.2
	1 季度	1.4	0.7	- 0.6
	2 季度	1.5	1.8	0.6
	3 季度	1.9	0.6	0.3
2018 年				
	4 季度	1.8	0.8	0.5
2018 年				
	1 季度	0.9	0.2	0.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 1.6
	2 季度	2.0	1.2	- 0.5
	3 季度	1.1	1.3	- 3.1
	4 季度	1.9	5.4	- 1.2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2.0	6.6	1.5
	2 季度	3.3	6.8	4.3
	3 季度	2.8	6.9	2.7
2018 年				
	4 季度	2.0	6.5	5.3
2018 年				
	1 季度	1.1	4.8	3.7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 年				2.8
	3 月	4.7	2.14	2.8
	4 月	5.1	2.17	2.8
	5 月	3.7	2.28	3.1
	6 月	3.9	2.24	2.8
	7 月	3.9	2.26	2.8
	8 月	5.1	2.22	2.8
	9 月	1.3	2.27	2.8
	10 月	3.6	2.35	2.8
	11 月	1.5	2.34	2.7
	12 月	2.1	2.38	2.7
2018 年				
	1 月	0.6	2.34	2.4
	2 月	1.8	2.30	2.5
2018 年				
	3 月	1.3	2.41	2.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7 年	782865		11. 8	753792		14. 1	29073
4 月	63198	- 0. 9	7. 5	62297	- 0. 1	15. 2	901
5 月	64071	1. 4	14. 9	62536	0. 4	17. 8	1535
6 月	63572	- 0. 8	9. 7	62561	0. 0	15. 7	1011
7 月	65392	2. 9	13. 4	62131	- 0. 7	16. 5	3261
8 月	65901	0. 8	18. 1	62683	0. 9	15. 5	3218
9 月	65956	0. 1	14. 1	63478	1. 3	12. 3	2478
10 月	67218	1. 9	14. 0	63753	0. 4	19. 0	3465
11 月	67988	1. 1	16. 2	64954	1. 9	17. 3	3034
12 月	68462	0. 7	9. 4	68150	4. 9	15. 0	312
2018 年							
1 月	67743	- 1. 1	12. 3	63853	- 6. 3	7. 9	3890
2 月	67067	- 1. 0	1. 8	69189	8. 4	16. 5	- 2122
3 月	65574	- 2. 2	2. 1	64383	- 6. 9	- 0. 6	1191
4 月	58716	4. 6	7. 8	63216	- 1. 2	5. 9	- 4500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0615	184905	- 164290
	3 月	2497	26252	- 23755
	4 月	3305	7937	- 4632
	5 月	1441	17915	- 16474
	6 月	635	15487	- 14852
	7 月	679	12664	- 11985
	8 月	2376	8345	- 5969
	9 月	- 1128	15413	- 16541
	10 月	1878	9789	- 7911
	11 月	1949	8432	- 6483
	12 月	4883	27546	- 22663
2018 年				
	1 月	- 1430	16712	- 18142
	2 月	1869	10072	- 8203
	3 月	4651	13934	- 928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 5	1. 8	0. 6	- 3. 5	7. 1	- 0. 2
	2 季度	1. 0	1. 8	0. 6	- 3. 4	7. 9	- 0. 5
	3 季度	1. 5	2. 0	0. 9	- 2. 7	7. 5	- 0. 4
	4 季度	2. 0	2. 0	1. 0	- 2. 5	7. 0	0. 3
2017 年		3. 0	1. 8	1. 3	1. 0	6. 4	1. 6
	1 季度	2. 3	2. 1	1. 1	0. 0	6. 1	0. 6
	2 季度	3. 7	1. 9	1. 4	0. 4	5. 7	2. 5
	3 季度	3. 0	1. 8	1. 3	1. 4	6. 5	2. 2
	4 季度	2. 9	1. 4	1. 5	2. 1	7. 2	0. 9
2018 年							
	1 季度		1. 2				1. 3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4212	4325	-113	4410	6441	-2030
3 月	372.5	371.8	0.7	385.4	562.9	-177.5
4 月	337.8	346.6	-8.8	332.1	487.0	-154.9
5 月	368.7	373.3	-4.6	372.7	525.1	-152.4
6 月	362.1	383.5	-21.4	359.7	536.7	-177.0
7 月	323.4	347.6	-24.2	388.9	515.2	-126.4
8 月	346.1	381.3	-35.1	336.7	541.6	-204.9
9 月	350.3	374.1	-23.8	376.8	618.2	-241.4
10 月	362.0	368.9	-6.9	389.9	590.1	-200.1
11 月	366.0	382.1	-16.1	396.2	578.5	-182.3
12 月	361.1	354.0	7.1	385.3	525.3	-140.0
2018 年						
1 月	365.0	352.3	12.8	405.1	599.8	-194.7
2 月	332.4	351.4	-19.0	382.3	530.0	-147.7
3 月	380.9	405.8	-24.9	442.9	606.1	-163.2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891	830	61	2178	1524	654
4 月	66.9	63.7	3.2	176.8	111.8	65.0
5 月	77.9	71.9	6.0	197.6	126.4	71.2
6 月	77.7	70.8	6.9	197.7	131.5	66.2
7 月	70.3	63.7	6.5	187.7	130.5	57.2
8 月	78.7	73.6	5.1	194.8	145.2	49.6
9 月	78.5	74.3	4.2	186.7	141.1	45.6
10 月	75.8	72.7	3.1	188.8	142.8	46.0
11 月	82.8	73.4	9.4	166.9	137.3	29.6
12 月	77.6	67.0	10.6	176.1	131.6	44.5
2018 年						
1 月	66.0	88.5	-22.5	169.7	148.4	21.3
2 月	76.0	76.5	-0.5	173.1	129.7	43.4
3 月	83.1	75.1	8.0	200.9	144.3	56.6
4 月				199.3	144.1	55.2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997	4443	-1446	3531	2378	1153
4 月	246.4	380.7	-134.4	260.4	182.1	78.2
5 月	240.5	383.0	-142.6	282.0	195.9	86.1
6 月	231.0	369.7	-138.6	294.7	206.9	87.8
7 月	223.9	339.5	-115.6	246.2	208.3	37.9
8 月	233.0	360.5	-127.5	290.0	223.8	66.1
9 月	286.5	379.2	-92.7	307.0	205.4	101.6
10 月	228.5	374.6	-146.1	314.5	216.2	98.3
11 月	260.9	404.2	-143.3	332.4	217.2	115.2
12 月	276.8	419.1	-142.3	378.6	241.6	137.0
2018 年						
1 月	249.6	406.6	-157.1	334.0	164.1	169.9
2 月	258.3	378.1	-119.8	312.0	190.1	121.9
3 月	291.1	428.0	-136.9	369.0	219.0	150.0
4 月	259.1	396.3	-137.2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737	4785	952	4095	4322	-227
4 月	508.4	379.6	128.8	317.5	317.3	0.2
5 月	449.3	392.9	56.4	354.7	375.4	-20.7
6 月	512.7	405.5	107.2	356.1	365.1	-9.1
7 月	488.3	386.1	102.2	321.6	346.2	-24.6
8 月	471.1	405.5	65.6	357.8	396.2	-38.4
9 月	551.2	417.0	134.2	338.2	367.3	-29.1
10 月	447.9	378.6	69.3	367.2	389.7	-22.5
11 月	497.1	420.1	76.9	374.9	370.8	4.1
12 月	490.4	435.3	55.1	359.8	359.8	0.0
2018 年						
1 月	492.3	457.0	35.3	307.2	351.4	-44.2
2 月	445.8	417.1	28.7	350.8	341.5	9.3
3 月	515.8	448.5	67.3	394.5	377.3	17.1
4 月	500.6	434.5	66.1	371.8	374.7	-2.9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4 月	447.8	456.7	-8.9	243.1	215.3	27.7
5 月	430.3	471.1	-40.8	255.1	220.6	34.5
6 月	491.8	525.2	-33.4	258.1	200.0	58.1
7 月	468.8	485.7	-16.9	271.1	217.4	53.7
8 月	463.7	491.8	-28.1	277.7	220.6	57.1
9 月	496.3	526.2	-30.0	289.0	222.8	66.2
10 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1 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1	59.7
12 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7	61.4
2018 年						
1 月	483.9	521.4	-37.6	273.8	247.0	26.9
2 月	337.0	387.5	-50.5	223.7	194.5	29.2
3 月	486.7	546.1	-59.4	299.9	239.9	60.0
4 月				267.3	225.8	41.5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7 年	2178	1951	227	1686	1569	117
4 月	167.6	148.0	19.7	132.8	119.5	13.3
5 月	184.1	171.3	12.7	143.5	137.7	5.8
6 月	170.9	147.8	23.1	116.6	99.9	16.6
7 月	183.3	164.5	18.7	136.1	138.9	-2.7
8 月	192.1	168.7	23.4	152.3	135.1	17.2
9 月	185.9	165.5	20.5	145.6	127.8	17.8
10 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 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 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 年						
1 月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 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 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 月				144.7	161.0	-16.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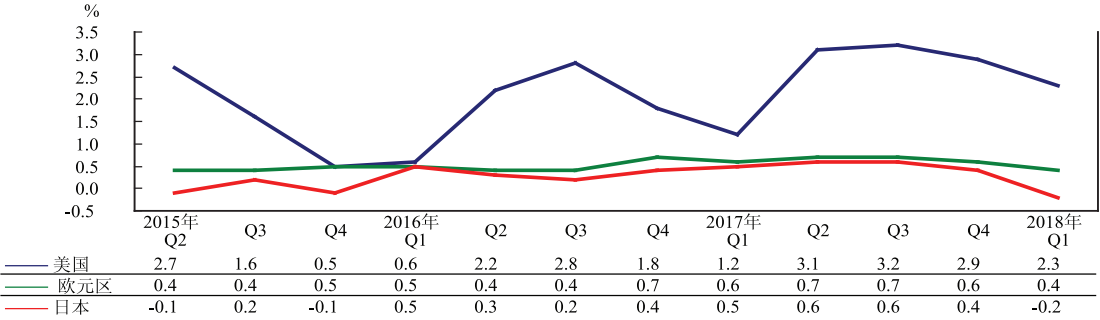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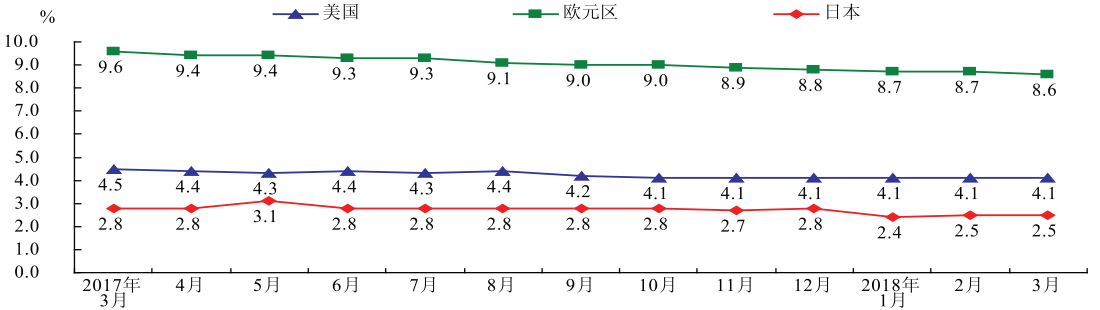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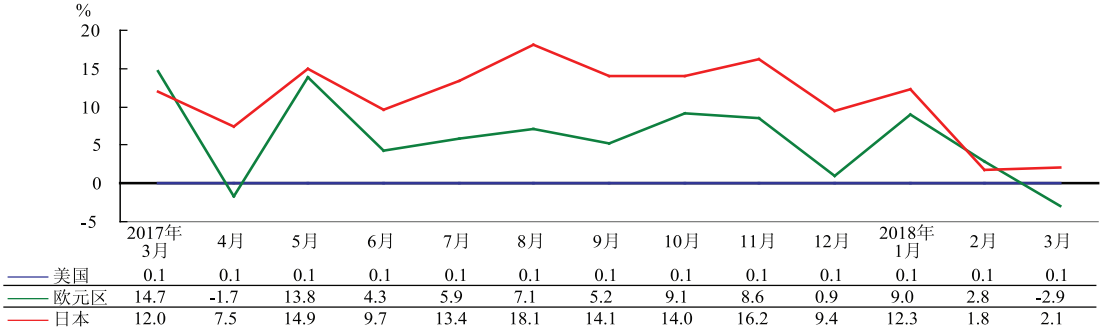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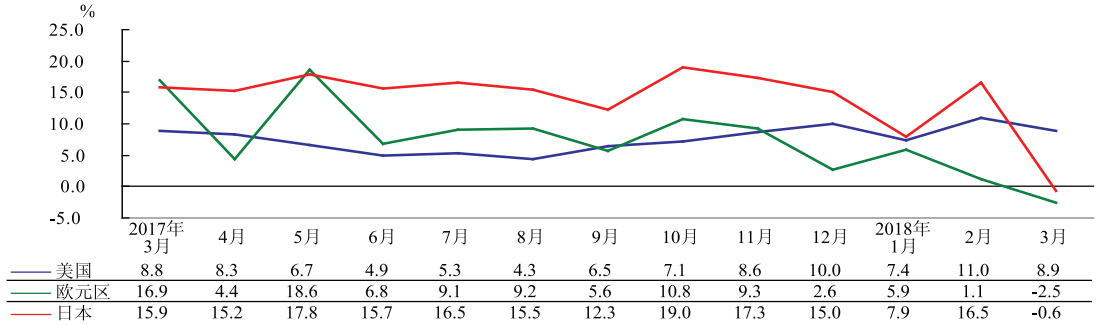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changes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s building an innovation power

Lu Yongxiang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gress has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end of industrial changes of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advanta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s build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t argu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s the real econom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both the pillar and the core,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and the industrial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power of the manufacturing power. The Chinese education must inherit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e spirit of creation,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cultivate the dream, confidence,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cooperate and 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herit th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bsorb the excellent civilization of all mankind.

(2)On Sino—US relations,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Zhang Xiaoqiang

At present, Sino – US relations and Sino – 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faced with great challenge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ward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pect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US side. China’s promises when joining the WTO have been fully fulfilled. China’s basic policy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periences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ti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done a lot of wor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been improved. The most challenges enterprises are facing lie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nagement and so on, so “fair” opening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foundation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ut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that could constructively resolve contradictions.

(3)earn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amous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Dawei and Yuan Lixing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accelerated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low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scientific decision – making, main body singularity of think tanks industry, lack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unclear positioning of think tanks, irrational structure of personnel, rigid system and nonstandard management.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famous think tanks, we find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think tanks and differ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bu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think tanks. Drawing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we suggest that China’s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layout and planning,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market of think tanks, establish a multi – type, multi – level and multi – functional modern think tanks system adapting to the direc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further improve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think tank,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vitality of think tanks.

(4)China’s overseas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Mao Zhonggen and Wu Youmeng

China’s overseas consump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scale, obvious purchasing consumption, imitation wave consumption and Japan and Korea becoming the new hot spots of destination. Overseas consumption is affected by not only the general reason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local currency, the relaxation of the outbound policy and the convenience of foreign payment, but also some China’s specific reasons such as the dislocation of the domestic commodity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the lack of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products, the immature consumer and the high prices of some high – end goods in the country. Overseas consumption has brought many negative impacts while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Responding to overseas consumpt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attract inbound tourism, promote the rational pricing of high – end products at home,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 supply structure, guide the rational consumption of the residents, encourage domestic tourism companies to go out and so on, so as to actively guide the return of overseas consumption.

(5) Establishing free trade port and promoting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Zhu Fulin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is a major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mote the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free trade port,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modes of the world free trade port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free port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free trade port development, we put forwar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6) Theory, polic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Wu Weihai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it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ramework, theor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continu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building a national level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of our country, promoting upgrading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credit are major issues that think tanks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should follow and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forward-looking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world credit organization (WCO) and the "credit global".

(7)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in India

Du Zhenghua

At present,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dia continues to maintain and adhere to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edge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throug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the remolding of staff training skills, the innovation of new fields and new areas, and the support of incubators and accelerators to the start-ups, which als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India. China, as a big software country, has been struggling with India in this field. Inspi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

have always been the dream of China's software industry to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8)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softwar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Xia Your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most advanced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world, with its software market being mature and huge.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American software industry has provided high contribution rates to economic growth, created more jobs, had a wide and balanced economic dividend coverage, effectively boosted the U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while maintaining high R & D input and strong momentum. In the future, softwar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ris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 tech software service tra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has set up the digital economic agenda and the digital Economic Advisory Committee in 2015 and 2016 to boost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have highlighted the synergy in the software trade.

(9)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tre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end of software industry and trade in Europe

Xiao Hanxiong and Yang Danhui

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to boost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enhanc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employment. At present,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booming, accelerating the reshap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as a result the increasingly active innovation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w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global software trade, the European software trade has formed a unique outsourcing model, which has promo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software industry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software tra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uropean software industry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ftware trad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uperposi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mild recovery of European economy, the expansion of the value fields brought by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ransfer effect caused by the Brexit and the policy direction of break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will provid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rade mode of the European software industry.

Editor: Huang Yongfu

问物——物流与供应链线上资讯平台

问物网是由中国物流学会规划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一家物流与供应链新闻资讯播报与知识分享的线上媒体，致力于发布行业内最新最全的数据、资讯，探讨时下最热的行业话题，为物流与供应链学习者、关注者、从业者和业内专家提供互动互助的线上社区平台。

问物网开发方和主办方将通过多年的物流研究、管理、咨询经验整合多方资源为问物网提供专家人才库、原创数据资源，并通过互联网使数据逐步发展扩大，最终形成让用户之间相互学习相互服务的生态圈，将问物打造成国内唯一即时、专业、全面的物流类垂直型知识服务平台。



版权所有：中国物流学会规划与咨询专业委员会



APP下载



服务号



订阅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院物资机关服务局1号楼1204

合作/咨询电话：400-166-0399

邮箱：support@wenwu100.com

010-68392730